



GU DIAN SHI CI MAN HUA

古典诗词漫话

周 劭 著

清诗的春夏



中 华 书 局

清诗的春夏

GU DIAN SHI CI MAN HUA

清诗是承元、明两代颓风之后，重振唐、宋盛音的中国文学珍品。作者把清诗象征性地分为春、夏、秋、冬四个时期，其中春、夏两季尤为清诗的鼎盛期。顺、康两朝为清诗之春，雍、乾两朝为清诗之夏。这一个半世纪中诗人辈出，诗坛极度繁荣，给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学遗产。本书着重介绍清诗春、夏两季的面貌，举凡诗人轶事，诗作析赏，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描绘出一个清前期诗的简明轮廓。

ISBN 7-101-03995-2



9 787101 039955 > 定价：12.00 元



GU DIAN SHI CI MAN HUA

古典诗词漫话

周 劭 著

清诗的春夏

—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诗的春夏/周劭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古典诗词漫话)

ISBN 7-101-03995-2

I. 清… II. 周… III. 古典诗歌—文学欣赏—中国—清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195 号

责任编辑:张 耕

古典诗话漫话

清诗的春夏

周 劭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6 1/4 印张·117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2.00 元

ISBN 7-101-03995-2/I·521

出版说明

《古典诗词漫话》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 15 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

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著、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

诗词也是如此。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荡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复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

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

称为“鉴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历程、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原名“诗词坊”，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既而引入台湾地区，也大受欢迎，在学林颇获好评。现在，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并保留了部分插图，重新出版。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能在两岸三地出版，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

最后，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古典的现代化”工作做得更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3年6月

目 录

清诗的四季(代序).....	1
明耕清获.....	6
四十年中四百诗.....	10
顾门高弟傅山.....	16
亭林弟子潘耒.....	21
江左三大家.....	26
两截诗人钱谦益.....	30
昆山归奇.....	35
秀水朱彝尊.....	41
吴伟业的梅村体.....	45
白发填词吴祭酒.....	50
秦淮三名妓.....	56
柳如是的诗才与志气.....	61
宋派三诗人.....	66
烟波钓徒查慎行.....	71

烟草诗人厉鹗.....	76
宣城南施.....	81
莱阳北宋.....	85
盐筴出诗人.....	89
流放诗人吴兆騫.....	93
满族诗人.....	99
捉刀诗人高士奇.....	104
捉刀诗人续谈.....	109
断送功名到白头.....	114
世变沧桑拙政园.....	118
冒襄与董小宛.....	123
陈维崧与水绘园.....	128
莱阳两姜.....	131
虞山两冯.....	135
谈狐说鬼的诗人.....	139
清诗异葩金圣叹.....	144
岭南义士屈大均.....	148
《南山》诗狱.....	153
王士禛的神韵诗说.....	158
《秋柳》诗.....	162
袁枚的性灵诗说.....	167
沈德潜的格调诗说.....	172
翁方纲的肌理诗说.....	176
清诗夏季三大家.....	180
掌心雷诗人王昙.....	183

古典诗词漫话

黄景仁的盛世悲歌.....	186
糊涂诗人郑燮.....	192

清诗的四季(代序)

话说 30 年代中期,在上海刊行过一本英文月刊,叫作《天下》(这是《庄子》一书中的篇名,语意双关),是用英文写作的,但写的都是有关中国文化的篇章。该刊的其中一位编辑是吴经熊,他曾是第一任的上海临时地方法院院长。吴氏不但精通法律,对中西文学亦造诣很深,在《天下》月刊中,他和林语堂可称双璧。《天下》刊行至多不过二年,到八·一三事变停刊,其鼎盛时期是 1935 年冬及 1936 年,林语堂英译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中英对照,按期连载,轰传一时,他自己也为芸娘的柔情发了魔。吴经熊则写了《唐诗之四季》(或称《唐诗的四季》)。

吴经熊从小受过深湛的古典文学训练,对诗词爱好甚笃,他别出心裁地把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特色的唐诗,巧妙地分成春、夏、秋、冬四个时期,用自然界气候的变化和人们对它的变化所产生的感受,来说明唐代诗人和作品的类别和异点。

时至今日,我所藏的《天下》月刊早已荡然无存,无法在半个世纪后取出来重读一遍,所以也不能引征原文,只是就记忆所及,略述它的一些概况罢了。

唐诗的春季,即是唐的前期诗。今体诗经过一个时期的孕育,到此时已成就了一定的体裁和格局,为此后唐诗的发扬光大奠下坚实的基础,可说是唐诗的孕育期;也合乎春天孕育万物的自然规律。它的代表人物当然是陈子昂、张九龄、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和“初唐四杰”的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杨炯等。

唐诗的夏季,是唐诗的鼎盛时期,如一般所说春播、夏耕、秋收、冬藏,其实夏天也包有一些收获在内。经过唐代初期的一番播种、孕育,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713),便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灿烂时期,众香国里,繁花如锦,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岑参、李颀、孟浩然、高适、王昌龄、常建、王之涣等等,无不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造成一部最动人听闻的鼓吹。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不,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但是到了秋天,便是经过安史乱离,从唐肃宗至德年间开始,唐诗虽然因春、夏两季的播种耕耘而收获到丰硕的成果,但到了那时,究竟已是金风萧瑟,叶落气凉,不如盛世的景象了。虽然这个秋季的中唐,也有过刘长卿、韦应物、钱起、卢纶、韩愈、刘禹锡、孟郊、贾岛、张继、白居易、李贺、姚合等杰出的诗人,究竟是蝉曳残声,景象已迥不同于往时了。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郊寒岛瘦,以及诘屈聱牙的樊宗师,那是明朗的夏季所决不会产生的;连最重要的诗人

韩愈,也难免有以文为诗之诮,他们的作品,就不能读了令人回肠荡气,心境愉快。

到了晚唐,那自然更不必说了。虽然日本诗人大沼枕山说“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那当是指李商隐、温庭筠和杜牧而言,但李商隐《无题》诗写得那么晦涩,典故用得那么堆砌,那岂是盛世之音所宜有,何况那些作品,正合着后人“獭祭”之诮,无论是天、地、人,总缺少一个“籁”字。

以上所述,是吴经熊对唐诗评判和赏析的基本论点,然后分成四个不同的时期和季节详尽地予以介绍和描述。主要的当然是翻译他们的作品,因为读者的对象是懂英语的异国人士,而《天下》月刊的使命和宗旨,正是在沟通中西文化。

吴经熊的《唐诗之四季》曾否在《天下》月刊刊登完毕,我已记不起来,可能是冬季部分尚未登毕而八·一三战事已在上海爆发了,《天下》就此废刊。吴经熊也就避地香港,而且兴趣和信仰也大有改变,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致力重新翻译《新约》和《旧约》的工作。

在这里还要介绍一位天才人物徐诚斌,此人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位知名的人物,他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香港教区主教的华人。他于40年代末毕业于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以三年的时间念完四年的学分而毕业,这在该大学是罕见的。那时上海已成为“孤岛”,却仍能托租界的庇护执行政府的命令。我在那时正编辑和林语堂、陶亢德合作的《宇宙风》半月刊,得以广交那时聚集在孤岛上的各方人士,大概是通过柳存仁教授的介绍,和他相识。

说句老实话,圣约翰大学当然是教会大学中的著名大

学,但对中国文学却并不注重。徐诚斌的中文程度那时并不很高明,但他却有志要在中文上用功夫,自告奋勇地要翻译吴经熊的《唐诗之四季》,我当然鼓励他,允许他在《宇宙风》半月刊上连载,并答应替他作文字上的润色。聪明的人真是无所不能,不久便文通理顺,天才横溢,好像佛家了悟一般。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到牛津去面壁四年,不但莎士比亚研究的造诣连英国学人都钦服,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使我心折。这样一个天才,竟天不假年,恐怕连“中寿”都没有,便歿在香港区主教的任上,准确的逝世年月我都不知道,他曾否结过婚,是否遗有子女,都无从获悉。只有他翻译过的《唐诗之四季》,在半个世纪后,还深深印在我脑中,作为我与徐诚斌友谊的纪念。

中国是一个诗之国,方块字固然有很多的缺点,但写诗填词,以至做楹联做四六,却是拼音文字所无可比拟的。不过诗经过唐代的二百多年,实在已被唐人做尽做光了,后人要继续做下去,当有望尘莫及之叹。所以宋诗虽然别树一帜,究无法与唐人抗衡,以后元、明两代,虽代有杰出诗人,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灿烂光辉贡献的代表作品,并不是诗,而是(宋)词、(元)曲、(明)小说了。

依我个人的爱好而言,在诗的领域中,只有清人的诗,尚能继承唐人的衣钵,不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可上摩唐人之垒;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不逮远甚。”

吴经熊英文著作和徐诚斌中译的《唐诗之四季》,给我一些灵感和启发,清诗是否也可以和唐诗那样,用一年中四个季节来加以分期研究呢?我越想越觉得可能,于是我把

清诗也加以依样葫芦。

我把清诗也分成春、夏、秋、冬四个时期：

春季：顺治元年(1644)——康熙六十一年(1722)。

夏季：雍正元年(1723)——乾隆六十年(1795)。

秋季：嘉庆元年(1796)——道光二十年(1840)。

冬季：道光二十一年(1841)——宣统三年(1911)。

在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国的二百六十八年中，在诗的领域中，春季占七十八年，夏季占七十三年，秋季占四十五年，冬季占七十二年。其中春季是顺治和康熙两朝。夏季是雍正和乾隆两朝。秋季最短，是嘉庆一朝和道光朝的三分之二，为什么把道光朝分割为两个季节呢，因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时期，在政治史上是中国从那时起开始进入近代史的阶段，在文学史上则从那时起迄1919年五四运动时止，被称是近代文学史时期。从道光二十一年开始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止，便是清诗的冬季了。

清诗的春季与夏季，是清诗的鼎盛时期，共达一个半世纪，占整个清代二分之一以上，所有杰出的诗人和作品大部分荟集在这个时期中。在这本小书中所要写的，便是这个时期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包括理论)，因之，我命名这本小书为《清诗的春夏》，即是清诗的上半期诗的意思。当然，“春、夏”这两字好拗口，不及“春秋”两字那样响亮。不过，意义确实不同，我叙述的清诗的季节，不能把1840年后的清诗作为清前期诗来写；而且“春”、“秋”两字，历来是用作另一种意义来解释，并不如“春”、“夏”是确定不移地说明季节，因此也便确定下来，作为本书的书名了。

明 耕 清 获

清诗的四季中的春天,是清诗中丰收的季节,它等于唐诗四季中的夏天,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都产生在这个时期。清诗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却产生在春天,顾炎武、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都属于由明入清的清初诗人。

为什么清和唐有这些不同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是近体诗到唐初才形成完备的体裁和格律,它还属于奠基的阶段,要过了一个时期才能发扬光大。清诗则不然,自从晚唐即唐诗的冬季以来,诗经过七个半世纪的落寞,到了17世纪的中叶,已有了回潮的趋势。尤其是明代三百年中前两个世纪的拟古摹仿的败笔,虽经公安、竟陵救之以空灵疏放而莫能挽回。到了万历年间,政治和军事虽已腐败到了极点,而文学尤其是诗,却从薪烬中爆发出了新的火花。大批凌驾于明人之上的杰出诗人,都是诞生在万历末期以至明亡的四朝之中。

中国历史易代之际人物的断代隶属问题,素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史学上如此,文学上亦如此。以明代诗人而言,高启为朱明一代诗人的冠冕,但是他生于1336年,死于1374年,充其量在明代只活了六、七年,怎能把他算为明人呢?但对他的隶属似乎从来不曾有过争论,皆说高启应该是元人而不是明人。对于顾炎武却有不同的看法,说他应该属于明人而不是清人,这是和权威的史学著作《清史稿》意见相反的。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也没有收顾炎武的诗,近人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则采取完全不同的看法。

其实顾炎武一共活了七十岁,1644年明朝亡国时他只三十岁,除了幼年和少年时代,假定他十五岁开始能做诗的话,他在明代不过生活了十五年,而在清代却活了四十年,主要的诗作和其他学术著述都完成于后四十年中,似乎不能不算他是清人。说他和陈子龙一样是明人,似乎于理未充。

但对易代之际人的断代隶属问题,历来好像有了一个框框或尺寸,是要看他是否曾入仕新朝或应科举为依据。高启受了明太祖的招致,年月虽不长,和杨维桢(铁崖)不同,也只好说是明人;侯方域仅仅中了个副榜,便只好入于清人了。顾炎武在清代统治四十年中,始终以明诸生自居,从未向清廷称臣,且避地西北,逃避秀才的岁试,因之,说他是明人也很有理由。

本书不拟在这些问题上多加探讨,只是从诗的内容上着眼。现存的顾氏遗诗,差不多全是入清后所作,那么,把

顾氏作为清诗的开山鼻祖,似乎也并非没有理由了。

除了顾炎武之外,其他清诗春天的重要诗人,差不多都生长于明末,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江左三大家不必说,其他名家如王夫之、黄宗羲、施闰章、宋琬、屈大均、朱彝尊、王士禛等等都是如此;只有查慎行生于顺治七年(1650),可以算为地地道道的食毛践土的清诗人。

上面所说的一些诗人,都孕育、成长在明代季年,明末万历以来政治的腐败、军事的失利,都对诗人的作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们面对着国势的衰弱,民乱的蜂起,灾异的连绵,更重要的是帝王殉国,小朝廷覆灭,清人入主,这和过去两个半世纪雍容华贵的三杨台阁、拟古摹仿的前后七子,以及空灵疏放的公安、竟陵有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他们的作品自然不期而然地符合现实手法,这和天宝安史之乱产生出杜甫等伟大诗人有前后相似之处,不可不谓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这是清诗的繁盛在春季而不同于唐诗在夏季的另一原因。

艰苦困难环境中孕育成长起来的诗人,其丰硕的成果,却随着政治上的易代落入清朝。自然,这种收获只是抽象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实物;而且这些诗人,虽然入仕清朝或应新朝的科举,但他们故国之思未泯,民族的隔阂未除,所咏的诗作,往往流露出对故国故君的怀念,或借古迹以凭吊,或假往事而伤感,很少有对新朝事物有所描写与歌颂。甚至指名直斥,不稍隐晦,不但不为自己的头颅,也不为他们的九族着想,孤忠直节,虽九死其犹未悔,真不愧为诗国中的精英,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像顾炎武、屈大均等人

都是如此。

春季的清诗如此繁荣,是不是政治气候的温暖孕育他们的生长呢?当然不是。事实上是政治对这个刚走出游牧帐幕不久的民族来说,还不曾成熟;他们不能单靠强矢长戟来定天下,对外行的东西还得借重于汉人;这样就会造成较为宽容的政治气候,即使诗人们有些“狂悖”的句章,他们也不闻不问,事实上也无法闻问。要是把春季诗人的作品放在清诗的夏季,碰到政治上已完全成熟的雍、乾两朝,那残酷到了极点的文字狱,一定要提早数十年了。

明代季世的艰苦耕耘,给从游牧帐幕中刚走出来的清朝展开了自唐以来所未有的诗国盛世,从而摘取明代耕耘所产生的丰硕果实,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最后的一个时代,也就是仅仅次于唐诗的时代。即使到了清诗的秋季和冬季,军事和政治上受到西方列强炮舰的猛烈冲击,思想文化上也饱受欧风美雨的强有力的影响,但是这些时期的诗人还是多得不胜枚举;其作品之多,也是历代所罕有的。到了黄遵宪、丘逢甲、梁启超等作品一出现,诗的正统便要禅让给白话诗了。

四十年中四百诗

清诗的春季,首先要提到顾炎武(亭林)。不但其人之气节和学术,是三百年来第一流人物,即以诗而论,也不愧为清诗的冠冕。后人给他概括起来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华民族屡经患难而终能复兴的象征,所以首先推崇的应该是亭林先生的道德气节。次之,则是他的学术论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肇域志》等等,都是掷地有声的大著作。再次之,方才提到他的诗文,所谓诗文乃其余事而已。《清史稿》把他列入《儒林》而不是《文苑》传中人物,当也是持这个理由。

像这样一个坚持反清,四十年中从未忘却恢复故国之念的孤臣孽子,应该是清朝统治者所深恶痛疾的人了。然而,二百多年之后,于光绪季年,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出于张之洞等的建议,把他和另两位行事相似的大儒黄宗羲和王夫之,明诏从祀文庙。清代从祀两庑的典礼,比前代要严格得多,连同上述三位,也只有汤斌、陆陇其、张伯行等七八

人,诗人中有这样一位享受殊遇的大儒,这在历代是罕见的事。当然,除了他,船山先生王夫之也是清诗春季中的一位知名诗人,他不但写诗,还是诗论家,清人的第一部诗话《姜斋诗话》便是他的作品。

顾诗数量并不多,现存的不过四百多首,以四十年中写下四百首,每年平均不过十首,或许有许多作品湮灭不传。不过从他的传世之作来看,实在是精练到了极点,从来不曾有过像其他诗人一样的应酬唱和之作,而且他天性庄重严谨,所以更没有旖旎的风怀。他的作品,不论是拟古、咏史、即景、吊祭等等,都是环绕着抗拒清朝、恢复朱明这个大主题开展着笔的,内容可歌可泣,笔端字挟风霜,硬语盘空,悲壮苍凉,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这与他在《日知录》中所说“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一语是言行一致的。清人汪端《明三十家诗钞》论顾炎武诗云:“其诗凭吊沧桑,论多激楚,茹芝采蕨之志,黍离麦秀之悲,渊深朴素,真合靖节、浣花为一手。”可谓确论。

顾炎武天性方严,不苟言笑,据说面貌丑陋古怪,且眇一目,和同邑归庄(玄恭)有“归奇顾怪”之称。但是据那时写真名手禹之鼎所画顾氏六十造像看,倒还并不见什么异人之处,并且造像照例不画人的残缺,所以双目仍然炯炯有神。他有三个嫡亲的外甥,都出仕清廷掇巍科做大官,大外甥徐乾学(健庵)对人说,他最怕舅舅的眼光,所以总是低着头避开。顾炎武老是瞧不上这个奔走声势、招权纳贿的亲戚,但也没法断绝这门至亲,只是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切莫与之来往。他自己则不得已,每至京师,只好屡住其家。至于



顾炎武诗如其人，严谨方正。

其他人呢,钱谦益是他的同社同郡,他在明代就瞧不起这个“东林浪子”,甚至他陷狱之时,若能得钱氏片纸便可出狱,他都不屑为之。而负东南重望的复社领袖吴伟业更只字未见提及。朱彝尊本来是他志同道合的好友,曾追随他在西北共图恢复中原,及朱氏一应博学鸿词而任翰林院检讨后,即与之交绝,再不提起这个好友了。他最得意而且最亲密的弟子潘耒(次耕)也和朱彝尊同时被荐,而且势要波及他,他凛然在《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一诗中写道:“为言顾彦先^①,惟办刀与绳!”这是何等的决绝,简直没有给人进一句话的余地!

他在明亡以后清朝统治之下所写的诗,简直是“昌言无忌”,毫无畏惧的直书,像《感事》七首中的:

传闻阿骨打,今已入燕山。毳幕诸陵下,狼烟六郡间。边军严不发,驿使去空还。一上江楼望,黄河是玉关。

“阿骨打”是金太祖的名字,清人入关前一度自称“后金”,这里当是泛指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毳幕”、“狼烟”是历来指斥外来入侵异族的贬词,他信笔拈来,别无隐讳,若置诸雍、乾朝文字狱大兴时代,这是不堪设想的祸事。

他为了逃避昆山土豪劣绅的逼害,更重要的是不愿参与秀才例应参与的岁试,明亡之后,便问道北上,在山东勾留一个时期之后,便转向西北,从此便不再履故土一步。这当然含有重要的用意,江南民风柔弱,虽有郑成功、张煌言经营闽浙海隅,但他觉得西北土地淳厚,民风强悍,完全可

作为匡复的根据地,所以一去四十年,到死后才得骸骨还葬故土。他不但是学术家、诗文家,而且还是军事家、经济家,传说他每到一处,必然置地产妻室,不久又舍而他去,这种如陶朱公三致千金的故事,显然和他深思远虑图谋恢复的计划有关。

章炳麟在《太炎文录续编·顾亭林遗事》中,说他创办票号,为山西人垄断一代钱汇业务的创始人,他的主要助手便是著名医家、书家又是诗人的山西阳曲人傅山(青主),又说他还是会党的创始人,不知有何根据。太炎先生在倡言革命排满时代,他当然引顾炎武为同调。

他在清廷统治下的四十年中,不知多少次拜谒南京的明孝陵和京师附近昌平州的明代诸陵,如《再谒天寿山十三陵》一诗,作于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那时他已是四十八



顾炎武屡次拜谒南京明孝陵,追忆前朝遗思。

岁了。永历虽尚流落于西南，恢复大业的希望渺茫，清廷的统治也日益严密，他所作的诗也只好暗晦一些，居然想出一种“韵目代字”的办法来掩蔽清吏的耳目，其作用有似现代的密码。当然这种原始的密码，只要识破它的规律，立刻可以破译无遗，但在那时究竟还能起一些作用，甚至后来的亭林诗笺校者也不知诗句的用字是什么意思。

-
- ① 晋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有“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语，意思是京城中的肮脏空气把人的清白之躯都沾污了，顾氏借此语表达自己的志节。

顾门高弟傅山

潘耒固然是顾炎武(亭林)的弟子,傅山则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年龄要长亭林七岁,自然不会属籍为亭林门人。不过,傅山对亭林倾倒备至,而且与亭林合作多年,是他的得力助手;所以称傅山为顾门高弟,也并不为过。当然,和潘耒是有区别的。

顾炎武在昆山受土豪劣绅的逼害,且要逃避著籍诸生的清朝岁试功令,不得不离乡北行,从山东转向西北,终身未再履故里一步;直到身后方万里归榑,葬在昆山。他的西北之行,以居住山西为时较久。他的目的是考察西北形势,物色人才,徐图恢复故国。当然这等大事,他一个人孤掌难鸣,必须有人合作,在当地人士中,主要的便是傅山、王弘撰等,而尤以傅山为最亲密。此外,也有志同道合的人,间关万里到西北和他会合,共商大计,其中就有屈大均、朱彝尊、潘耒等。属于清诗春季的诗人。但可惜的是朱、潘两人后来去应博学鸿词制科,任清廷翰林院检讨,这使得顾炎武异



傅山

常痛心,从此他再不起朱彝尊的名字;但对潘耒因为关系特别亲密,且原谅他处境的艰危,只好容忍下来。

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少年受知于袁继咸,袁是明末内外力战以身殉国的忠臣,崇祯中遭诬被劾系诏狱,傅山伏阙上书颂冤,义声震天下,世称为义士。甲申之变,他变服作道士装,隐居不出,顾炎武到晋,两人志同道合,自然很容易走在一起。

傅山不但是清诗春季的一位重要遗民诗人,而且对书画、医药等技艺也非常精通,书画评论家把他列入“逸品”,他还精通小学,阎若璩《潜丘札记》说亭林极称其识字,能给小学大师顾炎武称道“识字”两个字,正是极为不易的事。顾炎武在《广师篇》中评他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

傅青主。”可说是称誉备至。

傅山最知名的还是他的书法,而且还有一些神奇的传说。据说有一天他正在挥毫作书,偶有客来,辍而离去接待,他的幼子善效父书,便把笔将全幅写成。傅山回来忘记自己不曾写完,竟辨不出下半幅并非自己所书,不觉失声惊叹,长吁道:“吾书中气已绝,我其不久于人世矣!”后来他的儿子告诉说是他续成的,傅山更是潸然泪下;这个儿子不久竟然夭折了。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说,傅山著有《霜红龕集》十二卷,“子眉诗附焉”,这个傅眉是否那个写字的儿子,当然已无从考证了。

《霜红龕集》流传尚多,傅山的书画却极为珍罕难见,得之者奉如拱璧。据说太原傅山所设的药肆名“卫生堂”,其市招即为傅山亲自所书“卫生堂药饵”五个大字(见阮葵生《茶余客话》),这块招牌几乎和北京严嵩所书的“六必居”同样著名;但现在是否尚存,则不得而知了。

章太炎《书顾亭林轶事》一文中说:“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始明时票号规则不善,亭林与青主更立新制,天下信从,以是饶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在海通之前宁波、绍兴人所开的钱庄还未崛起时,中国的整个金融业便操纵在山西人手里,即使到了19世纪最后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京师时,北京由山西人开设的“四大恒”票号还是最响亮的票号牌子。谁知道在清代首创此业的人,竟是顾炎武和傅山!

这里抄录傅山的诗两首:

直到采乾北
逢君夜不眠
上樓腰
膝連懷土
腿明穿斗
板寒玉地
黃河凍徹
天西行總
泣相向何
事有詩篇

松齋老人傅山書

傅山书诗轴

好音无一字，文采会赅岩。正选高松坐，全忘小草钱。天涯之子对，真气不吾减。秘读《朝陵记》，臣躬汗浹衫。

河山文物卷胡笳，落落黄尘载五车。方外不娴新世界，眼中偏认旧年家。乍惊白羽丹扬策，徐颌雕胡玉树花。诗咏十朋江万里，搁吾侬笔似枯槎。

这两诗都是赠顾炎武的，是念念不忘君国，地道的遗民之诗。但是康熙十八年荐开的博学鸿词制科，也放不过这位遗民，而且西北的官吏荐贤的手法实在很不高明，简直闹得不愿与荐应试的遗民死去活来。傅山朝夕受顾炎武熏陶，当然不肯应试，清廷还是不放过他，未应试即授以中书舍人官职。他不受而归，这总算对得起他的老朋友。

他的遗民生活真是够苦的，全祖望《鲒埼亭集·傅先生事略》说：“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为不如速死之为愈。而其仰视天俯画地者，未尝一日止。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又自叹曰：‘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可见得他并不自安于诗人生涯，他想的是跃马横戈、效命疆场，可惜壮志无法实现。

最后的日子，他起了一个极不平常的别号，叫作“公之它”，确实很难理解他命名的意义何在，但总有深意存在是一定的。

亭林弟子潘耒

在顾门弟子中，潘耒特别受到亭林青睐，这有好几重原因，首先是潘耒的天分高，从少便有神童之誉；次之他在从亭林之前，曾师事徐枋（俟斋），徐是亭林所钦佩的节义之士。再则潘耒是从迢远的山阳到西北来受业的，使得亭林更为刮目相看。但更主要的因为潘耒是潘柟章的胞弟，亭林最悲痛吴炎、潘柟章的被难，对潘耒自有爱屋及乌之意。所以谈潘耒不得不首先叙述潘柟章的事迹。

清朝的文字狱，是中国文网史上最为残酷的，但开国之初，满人不通汉文，且方以力征奠定宇内，更无余力及于文事，所以遗民怀贰之士，还可以写作诗文，畅所欲言。及定鼎二十年之后，即康熙二年，方才注意到文字之反侧，并不比武力差弱，遂开始大加压制。以后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时达一百三十多年，惨酷的文字狱，把汉族读书士子，压得万马齐喑透不过气来；这样才算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其中最早最惨酷的一起大狱，便是湖州庄氏的明史案。

莊氏史案本末卷下

吳興朱國禎號平涵明朝熹宗時輔臣撰明史幾百
卷藏於家至順治時其家已落子孫不能守以其稿
本質之莊姓者莊故富豪能文墨廣聘諸名士續成
之而更布之板其所續烈皇帝朝諸傳於我朝龍
興事有犯諸人不察也盛行之坊間聞吳興有縣令
挾其書與其為難而莊不即答於是肯之朝天子
震怒逮繫若干人如查繼佐陸圻范驥皆浙中名宿
其他姻黨親戚一字之連一詞之及無不就捕每逮
一人則其家男女百口皆銀鐐同縛杭州獄中至二

清初的“庄氏史案”株连惨烈，受殃者不计其数。

庄氏名廷铎，目盲而负富名，其实是一个妄人，很想著书立说以自见，乃购得乡人故明朝大学士朱国桢《明书稿》改为己有，并延请当时知名之士与修订之列。潘恂章和吴炎都是吴江人，年虽仅二十馀，已负史学高名；其实潘、吴两人并未见到庄廷铎的原稿，只是在刻本上列有他们的姓名。案发之后，庄氏当然阖族受殃，与参订之列的名士死者七十馀人，而且还要牵累妻儿远戍极边。潘耒的胞兄潘恂章便这样蒙冤而死，一妻两子充军到辽宁开原东的尚阳堡。潘耒其时年方弱冠，虽未牵连定罪，但一家如此遭遇，旦夕都在恐怖忧惧中。

湖州史狱发生时，亭林远在西北，非常注意这件大狱，对潘、吴两节士之冤死，义愤填膺，毫无忌讳地高唱：

永嘉一蒙尘，中原遽翻覆。名胡石勒咏，触眇苻生戮。哀哉周汉人，罹此干戈毒。去年王子年，独向深岩宿。

石勒与苻坚都是乱华的胡人，忌讳甚多，苻坚眇一目，凡臣下有“残”、“缺”、“偏”、“少”、“无”、“不具”等字样，都遭杀戮，这和朱元璋因为做过和尚，凡是“光”、“秃”等字，都要避讳一样，统治者之残酷，前后如出一辙。但庄廷铎是一个妄人，他满以为盲人都是左丘明，所以立志要修史，殊不知朱国桢著书时在建州是敌国，自可畅所欲言，而庄廷铎则已处在建州的统治之下，实在也太大胆和糊涂。《榴龕随笔》云：“如书中所云王某孙婿，即清之德祖，所云建州都督，即清之太祖也，而直书名。又云‘长山衄而锐士饮恨于沙湍，大将

还而劲卒销亡于左衽’。如此之言，散见于李如柏、李化龙、熊明遇传中，又指孔(有德)、耿(仲明)为叛。又自丙辰迄癸未，俱不书清年号，而于隆武、永历之即位正朔，必大书特书，其取祸之端有如此。”

庄氏之祸，累及潘氏一门，潘耒自十八岁逢此变故后，间关万里到西北去找寻顾炎武问学，便是希望于学业之外，还可以得到一些同情与安慰。据同时人归庄《观梅日记》：“吴生开奇者，亡友潘力田(怪章之字)之弟，吴赤溟(吴炎之字)之门人也。二君以国史事被杀，家徙塞外，故生改姓，窜于山中，改姓吴，盖从母。”但徐枋《潘母吴太君寿序》则言潘耒改姓名吴琦，大概琦是名而字开奇。潘耒这样的变姓易服，草间偷活，怀着国仇家恨，投着亭林这样名师，当然倾身相事，眷恋师门，不敢忘德了。他的《遂初堂集》有《己酉冬自淮阴抵平原呈亭林先生六十韵》五古长诗有云：“素弦哀绝调，枯树惨同株。戢影依慈母，含辛对阿奴。向人言慷慨，伏枕泪模糊。三冬曼倩惜，一榻幼安俱。汲古惭修绠，攻文愧小巫。孤生原谫劣，曲学况牵拘。窥豹非全目，雕虫岂壮夫！夙怀期负笈，雅志有悬弧。硕德惟刘董，儒宗有郑卢。龙门虽自峻，蠹测肯辞愚。问字侯芭去，传经服虔呼。羸粮非早暮，命驾敢踟蹰。汶野黄云冻，沂山白草枯。只身经雨雪，远道涉崎岖。捧杖微诚遂，横经鄙愿输。駉骀还赖策，蓬草或堪扶。斧削资良匠，陶熔付大炉。垂恩无以报，感激一微躯。”师徒之情，灼然可见。亭林有诗答之云：

生平不拟托诸侯，吾道仍须历九州。落落关河蓬转后，萧萧行李雁飞秋。为秦百姓皆黔首，待汉儒林已

白头。何意故人来负笈，艰难千里愧从游。

丧乱之余，更是融合无间。但多年之后，到了康熙皇帝有了成熟的政治手腕时候，他改变对汉族士人只采高压的政策，不再挥舞刀斧，于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词科，要心怀反侧的汉族士人投入他的彀中，潘耒也不能免于应荐赴试，开首亭林当然恺切劝阻，但后来了解到潘耒的处境艰险，不像他人尚可以推托，也只好由他。这样潘耒便以布衣中试授为翰林院检讨，与朱彝尊、李因笃、严绳孙合称四大布衣。在职数年中，朝廷制诰版碑文字，无不出诸其手。但国仇家恨，始终盘桓在他的心头，所以不久即辞官还乡。他的诗集叫《遂初堂集》，便是遂我初服的意思。

江左三大家

清诗人中有两个“江左三大家”的称号，清诗的春季和夏季各有一个。夏季的远不逮春季，因之知名度亦不如春季三大家远甚。春季的便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而夏季则是乾隆朝的诗人袁枚、蒋士铨、赵翼三位。这里说的只是春季的三个诗人。

所谓“江左”，便是在地理上靠长江下游左面一些区域，在那时的政治地理属江南省，即南直隶，自从司马氏东晋南渡时开始便名为江左，一直沿用迄今。钱谦益是江南常熟人，吴伟业是江南太仓人，龚鼎孳则为合肥人。大家不要以为合肥是在安徽，地处江北，不应该称江左；实则明代迄清康熙中叶，并未有安徽、江苏两省的名称，两省实际都属于江南省，康熙中分割为两省建置，但还有许多地方相沿未改，如两江总督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清亡，尚是主管江南、江西两省的政务而不称“三江总督”。

这三个人牵连在一起，确实很有见地，首先，他们都是

掇高第的诗文家,按次序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八年一甲三名进士,吴伟业是崇祯四年会元和榜眼,龚鼎孳也是崇祯七年进士。

他们三人有很多相同点,首先都是著名的诗人,在政治上说来,又都是身事两朝的贰臣,还有并不太重要的相同点,便是各拥有一位红粉知己。但更重要的一点,便是这三大家在清诗的春季中的地位和对其他三季清诗的影响。

钱谦益是明清两代诗文承先启后的枢纽人物,他在这个时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容轻易抹煞的。吴伟业则自创一格,人称“梅村体”,影响后人极大。龚鼎孳与他们两位相比,不免相形见绌,把他称为三大家之一,恐怕不大相称;只是因为他素来广通声气,颇负爱士之名,所以大家都捧捧他罢了。龚鼎孳著有《定山堂集》,诗、词、文也都臻上乘,但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自不太大,对于钱谦益和吴伟业,将会另列专章来谈论,所以在本文中主要是论述此公。

龚鼎孳在三大家中,不独年辈较后,才学亦有所不逮,但是他的命运却是最好的。投降了李自成后,又投降了多尔衮,以后一帆风顺,终于做到一品尚书的高官,死后且得“端毅”的美谥,比钱、吴要优越得多。

他是崇祯七年的进士,连庶吉士都选不上,只是个榜下知县,到湖北黄州去当一个县令,在张献忠攻楚的时候,倒能以书生知兵,登陴守备,和张敬轩打了一仗,“诗成横槊指黄巾,战定摩崖看赤壁”,少年气概,颇为不凡。他和吴伟业结识,便在那时。吴伟业以翰林主试湖北,龚鼎孳以甲科知县调帘为同考官。主考与同考虽非上下属,但地位相去很

远。过了十八年，吴伟业在家隐居了十年又出仕清廷，龚鼎孳已官居极品，尚是黑头。吴伟业相形见绌，不得不趋奉结托，鼎孳当然不会亏待这位前朝老名士，两人诗酒唱酬，极友朋之乐；当然也不免感慨往事，追念往昔。诗人在这种场合中，往往是借歌伎、伶人或乐师之事来发泄他们的慨怀，这也是受到杜甫赠李龟年一首著名七绝的影响。明末有一个著名伶人王紫稼，崇祯末季他正当盛年，已名动公卿，吴伟业有一首《王郎曲》七古，很为他增加不少声价。国亡后三人重逢京师，王紫稼年已老大，却仍操故业，龚鼎孳在筵席上口占云：

薊台霜高舞柘枝，当年杨柳尚如丝。不堪重唱梅村曲，肠断王郎十五时。

那时重逢的三个，王紫稼已年近三十了，尚不得不作花落江南的李龟年，流落湖湘的李师师，卖饼为生的李和儿，正衬托出江左三大家中两大家的身世感慨，真堪和杜工部的名句并传。这位王紫稼后来在吴门竟被巡按御史李琳先杖毙狱中，此是后话。

龚鼎孳虽然是两朝的贰臣，但总算有点良心，而且天真得很，认为满汉一体，应该无分畛域，在三百年前还不曾有“五族共和”之说时，实在是无知得可笑。他屡次在满洲大人和异族统治者面前为汉人争取权利，当然不会讨好，还算是他运气，仅仅得到降职的处分，从一品大员连降十几级为上林苑监。倘若不巧，与他同样愚蠢的陈名夏和陈之遴，便得一个杀头一个充军。而且上林苑监秩虽低卑，却可以钦

使的身份出使广东,不久又官复原职。在三大家之中,他是在新朝中最享荣华富贵的一个。

江左三大家虽然成就不同,后人对他们的批评各有高下,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对于诗,他们都是崇尚唐人,对于宋诗及元、明以来的剽古拟古的萎靡诗风都取反对的态度,他们和顾炎武及明代遗民一起,共同上扫王、李、前后七子、竟陵、公安这些流派的颓风,下启有清一代三百年间重振诗风的盛局。龚鼎孳得附钱、吴两大家之骥尾而入江左三大家之列,也是他的幸事。

龚鼎孳的最可取和脍炙人口之处,是他爱士,真所谓爱才若渴,所以他在当时为众望所归,淹没了他两次投降的坏名声。他死后有人以诗吊唁,说是“寄声缝掖贱^①,休作帝京游”,便是说此人死后,天下寒士,再无以受嘘吹,可不必再去京师了。

~~~~~

① 缝掖(腋),宽袖单衣,古代儒生所服,后因以作儒生的代称。

## 两截诗人钱谦益

“两截诗人”是笔者替钱谦益(牧斋)取的称号。他不但人是两截人,诗也是两截诗,所以称之为“两截诗人”,既论其人,也论其诗。

人是两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乾隆皇帝在《国史列传》中特辟《贰臣传》,主要是为他这样的人而设。诗何以也成了两截诗?这却是好像天公有意替他安排的,而实际上是偶然巧合的事。

钱谦益(1582—1664)活了八十三岁,他的主要诗文集,是《牧斋初学集》和《牧斋有学集》。《牧斋初学集》刻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秋,由他大名鼎鼎的弟子瞿式耜梓印。《牧斋初学集》刻成仅仅半年功夫,明代就覆灭了;以后入清的二十年中所写的诗文则名《牧斋有学集》,这不是天生地设的巧为安排吗?所以他的人,上半截是明人,下半截是清人;诗也是如此,写成完全不同的两截诗。

他在《牧斋初学集》中所写的诗,主要突出三个内容,首

先是对建州边患的关切,他以书生自诩知兵,甚至要慷慨请缨,募兵北上和满洲决一死战;次之则是对宦官和权奸的痛恨和对抗击张(献忠)、李(自成)及外寇将帅的歌颂,完全是一个忠君爱国的正面人物形象。不料甲申三月,天崩地裂,他虽幸而先遭革职南归闲居,不曾参与大顺入京迎降之列;但南渡的小朝廷也只支撑了一年,当那“荒唐王爷”豫通亲王多铎攻下南京之时,他竟是迎降的文臣班首。以后,便要过他的下半截人和下半截诗的生涯。

不过他的下半截人和诗都做得并不彻底,有些首鼠两端,即是他虽然归顺清朝,做了清廷的官,暗底里却还在和南明的残馀势力交通往来,这是他身后政治上已很成熟的乾隆皇帝所最痛恨和不能容忍的。所以在乾隆四十年乾隆施展橄榄枝和大棒两面手法时,把橄榄枝插在陈子龙等一些为朱明殉葬的孤臣孽子身上,而大棒却在钱谦益的头上飞舞,把他贬到十八层地狱,永远不能翻身。《牧斋初学集》和《牧斋有学集》从此沉沦了一百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前夕的上海租界上,才有书贾敢把这两部著作重印出来。乾隆还明诏任何著述,凡是有钱谦益作序文的,须一律抽毁,否则,连这些本集也要列为禁书。

写了钱谦益这么多贬词,话说回来,他的诗文总究是明、清之际主要的大家,他在当时文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未容轻易抹煞的。诗在朱明三百年中是一个低谷期,始终在前后七子拟古的桎梏中徘徊,虽经公安三袁、竟陵钟、谭予以排击,但他们本身的力量实在也很脆弱,未能荡尽那股积垢多年的浊流,以致直到末季,复社、几社等文学团体,依

然抱着七子的旗帜不放,直到钱谦益出而主持东南文坛,大加廓清,才使当时诗坛面目一新,给后来清代的诗文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他主张诗须本性情,导意志,又须从动荡的时代、连蹇的遭遇中迸发而出,反对摹仿,反对幽眇凄冷、脱离现实的写作倾向,强调铺张排比的大家格局的手法,并且别具慧眼地提倡向健康的民歌学习,这些主张和理论,都在他的诗文中得到实践。整个《牧斋初学集》中的诗文,大都是有现实内容的作品,迥异于朱明一代枯僵的诗。入清以后,便在清诗的春季中大放异彩,而且管领群芳,在春季的百花园中,独占鳌头。

钱谦益是万历庚戌(1610)一甲三名进士(俗称探花),三十岁即登朝列,但仕途坎坷,屡蹶屡起,总算仕至卿贰(侍郎),但为了枚卜(推举入阁)遭到严谴。南渡召用,升任礼部尚书。后为降清的文臣班首,并在招抚东南诸郡立了功勋,照例至少要给他一个尚书的原官,像福王的大学士王铎,声名才具不如他远甚的人,在新朝依旧当相国,可钱谦益却只得一个崇祯朝的原官礼部侍郎,这是使他耿耿于怀的。所以任职不久,便辞官还乡闲居。

在常熟拂水山庄绛云楼幽居的岁月中,既不甘寂寞,又心怀怨恨,不免勾起了故国之思,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心情。他有两个极其著名的弟子,都是值得后人景仰的民族英雄,一个是瞿式耜,那时正在西南辅佐南明督师;另一即名垂宇宙的郑成功,也正在金门、台湾结合浙东的抗清力量张煌言、张名振等窥伺东南,力图匡复。尤其是瞿式耜,是他的同乡,而且共过患难,一起监禁在诏狱;那时虽远在桂林,还

时常有信使往还。对郑成功虽然师生之谊为时甚短,但因地域较近,不但时相联系,而且还想去亲自入伍;甚至以河东夫人的首饰,准备为郑、张装备一支五百人的师旅,即所谓“五百罗汉”。这些都见于他的诗集中。他所以这样幡然变计,恐怕和河东夫人的态度很有关系,这里姑且不谈,到有关柳如是的章节中再说。

甲申之变,他已是望六之年,据说关帝圣君在扶乩下坛时曾告诉他,他的寿命只有五十七岁。到了老而未死,不免责问圣君为何并不灵验,圣君乩笔答曰:“尔自不死,吾其奈何?”这样的讥讽嘲谑当然是出诸苏松一带士人之口,实在使钱谦益难以承受,他心理上的矛盾与痛苦真是难以表达的。

到了晚年,生计也捉襟见肘,连视为第二性命的宋槧《汉书》也不得不忍痛以贱值让给谢三宾。虽有红粉知己为伴,终于在绛云一炬,平生珍藏的宋梓元刻都化为云烟,这位凄惶的半截老人便伴着两截诗卷走尽了人生的历程。

这里抄录钱谦益最负盛名的三首七言律诗《和盛集陶落叶诗》:

秋老钟山万木稀,凋伤总属劫尘飞。不知玉露凉风急,只道金陵王气非。倚月素娥徒有露,履霜青女正无衣。华林惨淡如沙漠,万里寒空一雁归。

《金陵秋兴之一次草堂韵》:

杂虏横戈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京华。金银旧识秦淮气,云汉新通博望槎。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新鬼哭

胡笳。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

《后秋兴十三之一》云：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  
躯地，没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  
胡笳。恒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 昆山归奇

清诗的春季诗人中，有两位明遗民都是江南昆山籍，他们是顾炎武和归庄，人称“归奇顾怪”，所谓“奇”、“怪”，便是不正常、与人不同的意思。他们不但诗文奇怪，行事奇怪，而且相貌也很奇怪。秉体受之父母，相貌奇怪并不足奇，其诗文行事之奇，其实也并不奇，只是他们身感易代之痛，沧桑变革，欲图恢复不能，处世自多特行，而影响诗文，当然是硬语盘空，慷慨淋漓，不屑作一般语。

归庄(1613—1673)字玄恭，是明代大古文家归有光的曾孙，他的名号也非常奇特，明亡后改名祚明，或自称归藏、归妹、归乎来、元功、园公、悬弓、尔礼、普明头陀、麀鳌钜山人，这些奇怪名号和后来的龚自珍很相似，两人的诗文和行事也颇有相仿之处。

顾炎武虽被称为“顾怪”，其实并不怪，他的生性非常严肃，相貌的确古怪。归庄则奇而且狂，行事与诗文都没有顾炎武那么严肃，在复明活动失败暨绝望之余，他便佯狂遁



归庄诗奇、行奇、貌奇，故有“归奇”之称。

世,心中必然是非常痛苦的。

归庄于诗文外,尤善草书,酒醉泼墨,兴酣淋漓,得张旭遗意,往往在其所居大书联语,骇世人耳目,有一联云:

入其室,空空如也;

问其人,囁囁然曰。

世传尚有脍炙人口的一联:

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

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

归庄的复明运动,是身体力行,并非徒托空言,在江南起事不成,则北走徐海,与万寿祺(年少)、阎尔梅(古古)等相结合,并和顾炎武取得联络,图谋在西北起事推翻清朝的统治。这当然也不能取得成功,就此僧服佯狂以终世。他的诗文充满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对清兵南下奸盗杀掠的暴行以及降清的汉臣,他都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讥讽,但对迎降清兵的钱谦益则婉予劝讥,希望他能幡然悔悟。对其他降清汉臣则骂之为狗,尝与万年少唱和作《狗诗》六章,其四云:

相惊有国狗,岌岌冠方山。足识京都路,声闻茅舍间。张牙终遇敌,摇尾亦何颜。好逐刘安去,仙家列上班。

他在“刘安”下自注比摄政王多尔袞,可谓大胆之极。

顺治中,流诵一篇长达数千字的《万古愁》曲子,相传曾流入宫禁,清世祖福临很激赏此曲,每膳常命乐工歌以侑

隆武集一起隆武元年乙酉秋七月盡是年

明崑山歸社明天興父著

玉璽行

崑山有良璧○連城不足酬○大玉夷玉未為貴○黃琮白  
琥非其儔○在楚屢斯市○和璧入秦○綫碎相如○頭拳世  
臨渭不祥物○一朝擲棄田中溝○田父爭嘆吃○相視不  
敢收○帝命神工作○大寶○紅素排拭加雕鏤○雕成天子  
璽○字畫如銀鈎○天子猶在草莽中○忽夢上帝告○紹

食。当时不知道作者是谁,后来经过魏禧和全祖望等的考证,确定为归庄的作品,文章的风格和作者为人完全和归庄符合,大致不会错。此曲用屈原的笔法,从盘古开辟天地直叙到明清之际,魂环恣肆,于古之圣贤君相,无不诋诃,而独痛哭流涕于桑海之际,是与《离骚》、《天问》一类可以并传的文字。因文长不能尽录,只举其所谓痛哭于桑海之际的数阙:

〔蛟龙泣〕痛! 痛! 痛! 痛那十七年的圣天子掩面向煤山吊。痛! 痛! 痛! 痛那咏《关雎》嗣徽音的圣母,尸撇在后宫门没一个老宫娥私悲悼。痛! 痛! 痛! 痛那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剑向昭阳倒。痛! 痛! 痛! 痛那有令德的东宫,生砍作血虾蟆。痛! 痛! 痛! 痛那无罪过的二王,竟作了一对开刀料。痛! 痛! 痛! 痛那受宝册坐长信的只身儿,失陷在贼窝里。

这是朱明王朝亡国时宫中的一副惨状,然后是清兵入关,占据了北京:

〔变调〕宫庭瓦砾抛,陵寝松揪倒。但听得忽刺刺一天胡哨,车儿上满载着琼瑶,马儿上斜搂着妖娆,打粮处处把脾儿燥。急得那些杀不尽的蛮子们一样的金线鼠绦,红缨狗帽,恨不得把都们便做个亲爷听。

这一阙是对清兵入关的控诉,忽刺刺的胡哨、脾儿燥、金线鼠绦、红缨狗帽,那时都是禁讳字眼,他毫无顾忌地大胆用了进去。清世祖也真是宽洪大量,把归庄对他及其同族的破口大骂竟用来命乐工歌以侑食,可见确是欣赏归庄的奇

才。曲子的结尾是说到归庄自己：

〔归山早〕俺再不向小朝廷拜献降胡表，再不向钱神国告纳通关钞，再不向众醉乡跪进精浑醪。拔尽鼠狼毫，椎碎陈元宝，万石君已绝交，楮先生告辞了。俺自向长林丰草，山坳水峤，一曲伴渔樵。

最后他唱：“恁便是银春作饵，金紫为纶，漫天匝地张罗钓，呸！呸！呸！俺老先生摆尾摇头再也不来了。”

归庄所作的诗文，身后散佚无存，道光以后，禁令稍宽，有多家为之辑佚重刊，最近又搜辑遗诗遗文刊为《归庄集》，据今刊本于《万古愁》曲子后存诗七绝一首云：

世事浮云变古今，当筵慷慨奏清音。宫槐落叶秋风起，凝碧池头共此心。

这首诗拟归庄于唐代诗人王维，但与全曲情意不洽，而又违背归庄原志，恐是后人听说清世祖命乐工歌以侑食的故事而作，是不应录入归庄的作品中去的。

## 秀水朱彝尊

清诗的春季，多用南北的地域来称呼诗人，如“南施北宋”、“南查北王”、“北王南朱”。施闰章（愚山）和朱琬（荔裳）究不足以领袖南北两大文坛；查慎行也只有赵翼独力推崇，未见得会令人信服，只有朱彝尊才足和王士禛铢铔悉称，分庭抗礼，不愧为清诗春季的南北两位大家，三百年来论诗者似乎没有什么异论。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浙江嘉兴（秀水）人，为明相国朱国祚曾孙。他既有宰辅的门第，又生在崇祯初元，甲申国破时，已是成丁之年，自然身切家国之痛，怀着抗清复明的志愿，所以他的少壮时代，是以遗民自居的。刘师培把朱彝尊的一生分成四个时期：“以故相之裔，值板荡之京。甲申以还，蛰居雒诵，高栗里之节，卜梅市之居，东发深宁，差可比迹。观于《马草》之外，仿伪满之苛残；《北部》之篇，吊皇陵而下泣，亡国之哀，形于言表。”这是指他少年的志节。“及其浪游岭峤，回车云朔，亭

林引为知音,翁山高其抗节。虽簪笔傭书,争食鸡鹜,然哀明妃于青冢,吊李陵于虏台,感慨身世,迹与心违。”这是说朱彝尊远游西北,与顾炎武、屈大均相结纳,其时朱彝尊年已及壮,鉴于恢复无望,壮志渐馁,顾炎武虽很器重他,引为同志,但他已经有些动摇了。

到了半百之年,适逢清廷对文士压制之外,又加上笼络的一手,于是朱彝尊“献赋承明,校书天禄,文避北山之移,径夸终南之捷。甚至輶车秉节,朵殿承恩,仕奔子云,岂甘寂寞;陷周庾信,聊赋悲哀”。这是说康熙十八年己未举行的博学鸿词大科,朱彝尊以布衣膺荐赴试,取在一等第十七名,和一等第七名的李因笃、二等第二名的潘耒及二等末名的严绳孙四人号称“四大布衣”,被授为翰林院检讨的官职。这是朱彝尊的第三时期,态度已完全改变过来,所谓“西山蕨薇已精光,一队夷齐下首阳”,他是连像吴伟业那般忸怩作态也索性不要了。

因为他老寿,活到八十一岁的高龄,所以还有第四个时间,则是“后先异轨,出处殊途。冷落青门,忆否故侯之宅;萧条白发,难沾处士之称。此则后凋松柏,莫傲岁寒;晚节黄花,顿改初度者矣”。原来己未鸿博人物,以布衣而跻身清华,翰林院编、检是一般读书人要几十年占毕寒窗,经过大小多少场考试才能获得的,而他们轻易得之于朝夕间,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妒忌,目之为“野翰林”。由妒忌而排挤,不数年而鸿博人物遂空于朝廷。故说他“后先异轨出处殊途”,朱彝尊虽未仕明代,难与钱谦益、吴伟业并论,不会写进《贰臣传》中去,但“后先异轨”之讥,总难免有疚于心了。

在清诗的春季诗人中,朱彝尊堪称是一位多面手。他不但工诗,且于词、文、学术,无所不通,而于词之一道,尤负盛名。正因他无所不通,致不能专精于一。同时负盛名的大家,如王士禛之诗及其创论神韵诗说,朱彝尊无之;查慎行之专宗宋诗,他则不名唐、宋,亦不能自成一格。好讥评人的赵执信,在《谈龙录》中虽不能不许评他为大家,但说:“或问于余曰:阮翁(王士禛)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于朱而学足济之;朱学博于王而才足举之,是真敌国矣。他人高自位置,强颜耳。曰:然则两先生殆无可议乎?余曰:朱贪多,王爱好。”

“贪多”,是赵执信对朱彝尊一针见血的两字的评,贪多务得,是他最大的病处。稍后的诗论家赵翼对他颇持奇论,认为“其诗初学盛唐,格律坚劲,不可动摇。中年以后,恃其奥博,尽弃格律,欲自成一家,如《玉带生歌》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则颓唐自恣,不加修饰,究非风雅正宗”(《瓯北诗话》)。这样,云松老人便要把他拉下“北王南朱”的宝座,而易云为“北王南查”。

清圣祖对鸿博人物中的朱彝尊是特别优遇的,入值南书房,朝夕随从,以从七品翰林院检讨而蒙京师赐第,是清代三百年中的旷典,后来的一二品大员也难有此殊荣。出典江南大省乡试,是朱彝尊一生最得意之秋,但不久即以携带抄胥入大内抄录进呈秘籍,被掌院学士牛钮所劾,降一级出内廷。降一级是薄谴,然检讨是翰林中最低一级,若真的降级,便是翰林院中的佐杂官了,所以不久虽即复官,终至意兴阑珊,官场梦断,只好还乡去做小长芦钓鱼师。

朱彝尊的集子总名《曝书亭集》，他在嘉兴建有曝书亭。其在任职清廷之后，于康熙二十五年所刊诗集八卷，自题为《腾笑集》，削除自己过去“布衣”之称，取孔稚圭《北山移文》中“南岳献嘲，北垄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之句以自嘲。

朱彝尊虽亦是经师，但尚没有道学家架子，他婚于冯氏，为冯镇鼎长女，但对冯的幼女颇有恋情，写过不少发魔的情诗，恐怕就是集中的风怀诗了。袁枚有《题竹垞〈风怀〉诗后》一诗，其序云：“竹垞晚年自订诗集，不删《风怀》一首，曰：‘宁不食两庀特豚耳’。此遽言也。按元、明崇祀之典颇滥，盖有名无考，附会性理数言，遽与程朱并列。竹垞耻之，托词自免，意盖有在也。不然，使竹垞删此诗，其果可厕两庀乎？亦未必然也。”诗云：

尼山道大与天侔，两庀人宜绝顶收。争奈升堂寮也在，楚狂行矣不回头。

朱彝尊不作假道学态，当然获得袁枚的好感而引为同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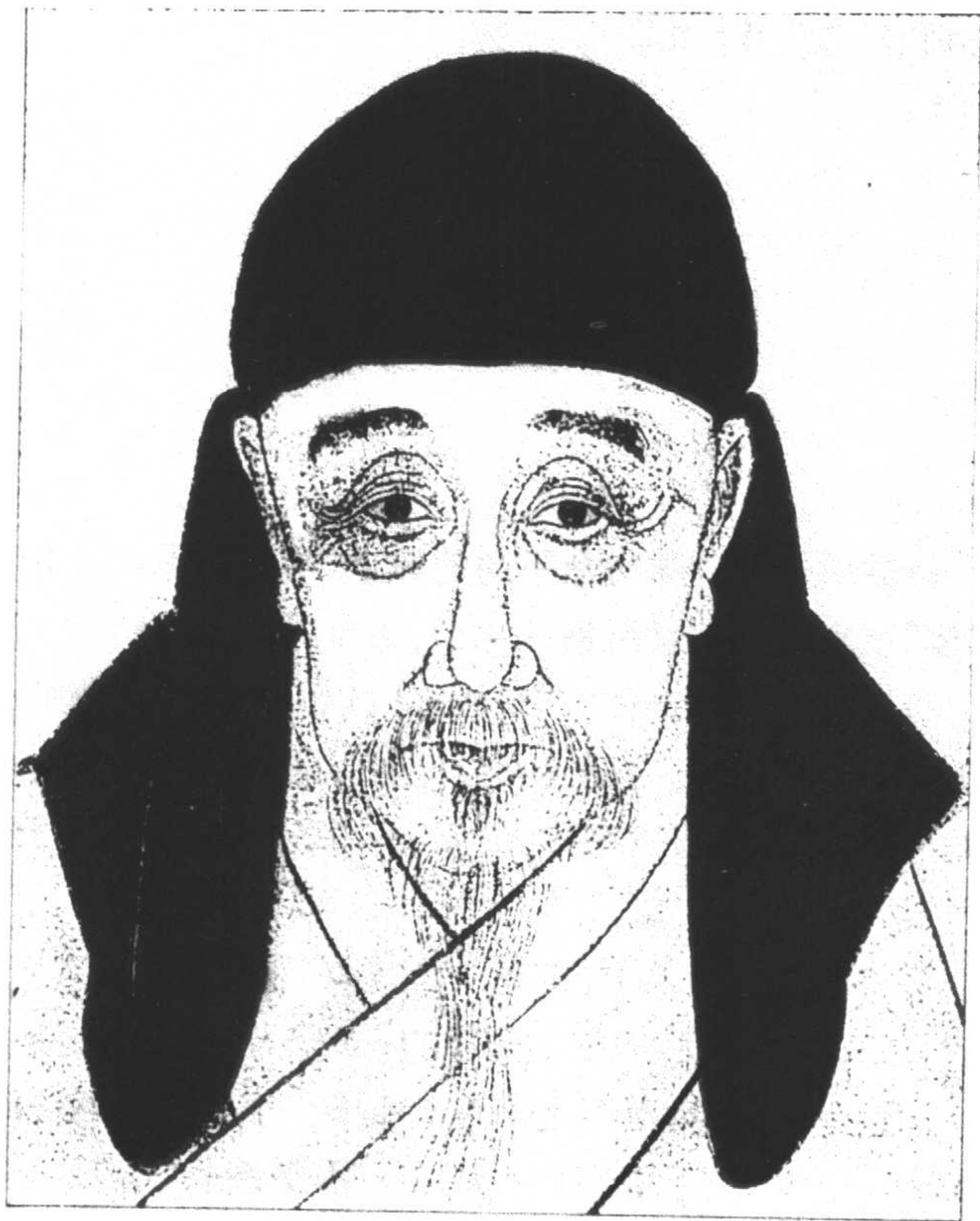
朱彝尊晚年还有一桩有趣的故事，他性喜食鸭，梦见满池都是鸭子，鸭馆告诉他都是供他食用的，于是恣意食啖，到了晚年又梦，则池中仅馀两只鸭子，自知天禄已尽，乃戒家人不再食鸭。不料病中其女来探视，深知老人食性，携饷烧鸭两只为献，他一见，遂此谢世。此一故事与唐代李德裕梦羊如出一辙，附述于此，以供谈助。

## 吴伟业的梅村体

诗歌中一种特殊与众不同的风格，名之曰“体”。用一个“体”字来表示别具风格的称谓，由来甚久，唐代的“元和体”、“长庆体”、“香奁体”、“长吉体”，以及后来的“铁崖体”之类，都显示“体”的主要诗人自行创造别具一格的诗风；到了明代，就不大叫“体”而称为“派”了，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事情。

清诗的春季诗人中，也有一位重要诗人的作品被称为“梅村体”的，那便是江左三大家之一吴伟业（梅村）的诗。

所谓“体”，大都是指七言歌行而言，七言古风，最容易写也最不容易工，所谓“易学难工”。本来诗与音乐是分不开的，但后来近体诗逐渐脱离音乐，只能读而不能唱，“旗亭赌唱”是唐诗的夏季诗人韵事，若是唐诗的秋季诗人韩愈、贾岛、孟郊以至樊宗师的诗，有谁能卡着喉咙去歌唱呢？像岛、郊、宗师等这样的人古往今来有的是，他们以古奥滞涩为工，生搬古典及烂用奇僻怪事以炫己长，如唐代李商隐被



吴伟业独创“梅村体”，诗风别具一格。

人讥为“獭祭鱼”；但李商隐究竟是李商隐，不能出很多的李商隐，语所谓“学我者病”。明代七子拟古复古的作品是这种涩体的表表者，尤其是李攀龙的诗文，简直令人无法卒读；王世贞虽略好一些，究难逃后人的诟病。

吴伟业的“梅村体”便是站在王、李对立面写出来的诗体。他或许并没有什么主观意图来创造一个体裁，而是很自然地使读者有一种特殊的印象，他的作品有与人迥然不同的风格，后世诗人有仿效之者，便名之曰“梅村体”。

“梅村体”的主要渊源来自唐代的元、白，尤其是白居易的歌行。白居易的诗，自称老妪儿童都能解诵，这是白居易最大的优点和成功。他在唐诗中的地位，可以和李、杜并举而毫无愧色。千载而下，吴伟业是他最成功的传人。

“梅村体”最重要的条件是音乐之美，宫商抗坠，音节浏亮，读来铿锵有声，如珠落玉盘，滴溜溜转；如铁骑突出，刀枪齐鸣，一气呵成。这主要是他的选韵，选韵是吴伟业最拿手的杰作，他从不用奇涩拗口的险韵，如“十三元”之类，他用的都是掷地有声的字眼。更有一绝是换韵，古诗由仄换平的地方，他接连用两个响亮的平韵如“十五删”，不但使音乐的节奏变成急管繁弦，联系着诗的内容也发生剧烈的顿挫变化，使人心随神往，跟着踏入另一个新异的诗境。

作诗用典，本来是诗人才尽不得不靠典故来救济的无可奈何之举，《诗》三百和早期如苏、李等诗，原没有什么典故好依靠，“池塘生春草”五字千古，无一字有来历。只有腹俭如明代七子，才不得不满纸俚仵来救才尽之穷。吴伟业当然还不及白居易那种能使姬孺皆解的白描本领，时而不

《梅村》

枳篱茅舍掩苍苔，  
乞竹分花手自栽。  
不好诣人贪客过，  
惯迟作答爱书来。  
闲窗听雨摊诗卷，  
独树看云上啸台。  
桑落酒香卢橘美，  
钓船斜系草堂开。

——  
吴伟业

免要使用典故，但是他决不死搬硬套，他的用典浑融切合，使人看了觉得很自然妥贴，没有生凑活吞的痕迹；有时且能化腐朽为神奇，把一个死典故用活了。当然，“梅村体”的又一长处是题材动人，这是明清之际的动荡环境天然赋予他的诗材，决不是承平时世的人所能凭空捏造的。

至于吴伟业的为人，是谨慎小心，少年登第时还有些朝气，敢于弹劾首辅张主发，以后便圆滑妥协，更无剑拔弩张之态了。按照他的诗所取题材，在清代大量禁书目录中，原不该让他可作漏网之鱼；可是幸运得很，高宗还在“潜邸”当宝亲王时已编成的《乐善堂诗集》中，有过一首赞扬吴伟业诗的七律，后来登了大宝，便成为御制诗了。所以不论何种吴诗版本，包括《梅村家藏稿》，历来总把这首御制诗冠诸集首，成为吴诗的护符，使任何罗织周纳的人也奈何他不得。即使是高宗本人也不好自食其言，把他与钱谦益一律看待。

高宗这首诗好就好在尚未成为“乾隆体”时的作品，而

且可以确信不会是出于捉刀诸臣之手，所以把它抄在下面，以作本文的结尾：

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

## 白发填词吴祭酒

吴伟业这位诗人，在清诗春季中的地位，并不输于钱谦益，也不逊于顾炎武。一方面他有卓越的天才，另一方面是丧乱的时代造就了他。他在文学上多才多艺，词也不弱于他的诗，其他如书画、戏曲、史学，也是一代能手，甚至于麻衣之术，亦有深湛研究，在清诗的春季诗人中，无人可以与之抗衡。

此人一生性格上充满着矛盾，他的心头上总有两种相反的思想在交战。要想讲忠烈气节，却又怕死贪生；要想风流放诞，却又矜矜自守；要想清贫恬淡，却又未甘寂寞；要想剑拔弩张，却又畏首畏尾。这样的矛盾心理，使他既不能如顾炎武之一往直前，虽九死其犹无悔；也不敢如钱谦益之一跌到底，受尽世人嘲骂。其结果是既不能靠他的圆滑处世而左右逢源，反而到处碰头撞壁，落得个自怨自艾，成为一个时代的牺牲品和可怜虫。

少年登第，会元榜眼，奉旨完婚，光宗耀祖，意气飞扬，

是读书人得意之秋，仗着东林遗风和复社门户，一登朝便弹劾首辅温体仁和张主发，风裁整峻，名动朝野；但一遭到蹉跌，深知守旧势力盘根错节，决不能轻易动摇，从此成为残枝寒蝉，再也不敢稍露锋芒。南都覆灭，他虽未在朝列，但东南忠臣义士，在草野的也并不少，很多奋起抗争，只有他是避兵逃难，狼狈如丧家之狗，诗集中只看到他如《罄清湖》等避乱之作，而没有一篇像陈子龙、夏允彝的作品。蛰居十年，静极思动，实际上是有了亲家的奥援，却把责任推给父母和有司的敦促，结果却时运不济，事与愿违，朝局既非，靠山忽倒，不得不铩羽而归。终老林泉，却又缺乏求田问舍之资，不得不以垂老之年，遍游江浙，下交地方官吏，为抽丰之谋，晚景颓唐，一何可悯！观其临终嘱咐及所赋绝笔，与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的名句，真不可以道里计；则其悲剧的一生，实有些咎由自取。

吴伟业以诗文来掩饰其出仕清朝，三百年来不知瞒过多少读他作品的人，如一向讲究史德的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梅村出处之际，固不无可议。然其顾惜身名，自惭自悔，究是本心不昧。以视夫身仕兴朝，弹冠相庆者固不同；比之自讳失节，反托于遗民故老者，更不可同年语矣。《遣闷》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至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至今读者犹为凄怆伤怀。”这是赵氏对人的最平恕议论。

吴伟业生平出处大节，实在还有两桩大事值得探讨：一是据邵懿辰说，他曾见到史可法奏报北都投降李自成诸臣的奏章，有吴伟业之名（当然还有可法之弟可程之名）。补

充的证据,是《梅林年谱》于甲申那年行事多有未详。据吴伟业身后的《墓表》及《行状》都说他是年“丁嗣父忧”和“甲申之变,先生里居”,这些事隔多年的谀墓文字,未必可信,而甲申三月迎降大顺政权者,并不是稀罕之事,如海宁、溧阳两陈、金之俊、龚鼎孳、周亮工等,都是吴伟业友好,丁嗣父之艰,是否必须回籍守制,还须查考;当时情况混乱,南北消息阻隔,大顺政权防备不严,投降后乘间南归者亦复不少。邵懿辰虽是著名学人,但所言仅是孤证,未足为据,述之聊广异闻而已。

另外一桩更是孤证,却较为可信:吴伟业于顺治十年(1653)膺荐北上,虽出于枢臣的疏荐,实在由于他的亲家大学士陈之遴(他的女儿嫁给陈的儿子陈直方)。有此奥援,遂违平生所守,而且所怀不小,有如钱谦益乙酉那时一样。他在到南京时呈荐他的督臣马国柱诗说“惭愧荐贤萧相国,召平只合守瓜丘”,他能如秦故东陵侯召平的种瓜吗?那全是掩饰之词,切不可被他瞒过。到北京之后,正值朝廷对汉臣开刀,陈名夏落得个身首异处,亲家翁陈之遴第二次遭戍辽阳,冰山忽倒,这个被荐的人,还会受什么重视?以会元、榜眼的巍科,弘光朝的少詹事,事隔十年,仅任为国子监祭酒,都是四品闲曹,这不是使他大失所望吗?这样,便使他不到一年,便匆匆辞职南归,这究竟何故?在他的诗文中当然有许多借口,还可以说是被有司、父母敦促,不得不敷衍一下,这又是遁词。

在众多的清人笔记中,有一则关于吴伟业北上的记载。吴伟业于诗文书画之外,还精子平、麻衣之术,他连举七女,



吴伟业不但诗好，书画也是一绝。

中年尚无子息，他自视以后一定可得子，于是趁郁夫人有不妒忌之德，广置姬妾，而且多江南佳丽，果然五十后生子暲等三人。暲充闾之会（弥月），东江唐孙华以老名士居上座，梅村抱暲谓孙华说：“此子当与公同举进士。”孙华当然大为不悻。到了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暲中二甲第十二名进士，孙华倒中了三甲第二十名，这是一件有名的故事。

吴伟业北上，时暲尚未生，当然要携姬妾同行，在北京虽然并不得意，但声名犹在，仍可广通声气，希图大用。因之宾客纷至，满汉都仰高名，其时入关未久，习俗未改，礼教与汉俗迥异，所谓“大人”者，一见江南佳丽，不为沙陀利之劫夺归邸，竟公然恣横，吴伟业自为不堪，然又不敢抗争声张，忍声吞气，不免抑郁成疾，这便是世传为“绝命词”《贺新郎》之所由作，题曰《病中有感》，词云：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陀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灾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若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八世事，几完缺。

一派自怨自艾之言。其实顺治十一年他并没有死，谈迁的《北迁录》亲眼看到他病愈的光景。他的真真绝命诗，是要在十多年之后，有《临终诗》四绝云：

一

忍死偷生廿载馀，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二

岂有才名比照邻，发狂恶疾总伤神。丈夫遭际须身受，留取轩渠付后生。

三

胸中恶气久漫漫，触事难凭任结蟠。块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泛澜。

四

奸党刊章谤告天，事成糜烂岂徒然。圣朝反坐无冤狱，纵死深恩荷保全。

可见《贺新郎》词并不是他的绝笔，只是那时受尽人间所不能忍受的污辱，去死无异，遂不觉其言之哀而词之绝了。

吴伟业经过这场奇耻大辱，也可以说是自取其辱，遂仓

皇南归,从此不再作出岫之云。

他死后的碑版传记都记载他临终时的一句话,便是要以僧服殓,墓碣上不要刻什么官衔,只题诗人吴梅村之墓数字,则其情也可哀已。

## 秦淮三名妓

有了才子，不可无佳人；有了江左三大家，便不可无秦淮三名妓。

明代的士风，不像清代那么严肃拘谨，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帝皇就是逛窑子、研究秘方的带头人，上行下效，风气自然狂放淫靡。加以明代士子居乡，气焰嚣张，地方官吏，对之莫可奈何。而江南一省，称为“南直隶”，省会南京，又称“留都”，每逢乡试之年，集清代改建为两省的江苏、安徽秀才，加上南雍的监生，数以万计的士子聚集在南京应试。他们寓居在南京时间并不短，八月乡试，春末便已到临，谓之“过夏”。寓居的地方，最高级的叫作“河房”，便在秦淮河的两旁，是妓院的荟集地。士子寓居于此，便于广通声气，相互酬酢往来。

明代的高级妓女，可不像后来那样专以卖淫为业，她们必须懂得多种技艺，才能高张艳帜，招引王孙公子，抬高身价。除了貌美之外，主要是能谙晓琴棋书画。尤其是诗，至



秦淮河畔，凝满了历朝名妓的金粉和歌声。

少要能够吟成两首小诗，并能背诵多首名家的名作，方可称为秦淮名妓。

30年代王书奴所著的《中国娼妓史》，叙及明末不少可歌可泣、婉转缠绵的故事，其中归德才子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故事，更被衍为《桃花扇》一书。再上溯一个时期，则身关一代兴亡的陈圆圆，也正是从秦淮而到北京的。当然，她所交结的是武夫吴三桂，自不在文人学士之列，在此可以不论。至于一代名姬董白（小宛）和冒辟疆的故事，亦当另列专章，暂且勿提。这里要谈的是和江左三大家有关的三位秦淮名妓。

这三对伴侣是：钱谦益与柳如是，吴伟业与卞玉京，龚鼎孳与顾媚。

不论才貌与品德，柳如是公推此中翘楚，她的诗词，从

遗留到今天的看来,就压倒群芳,为他人所望尘莫及。虽然诗或许经过钱谦益润色,但词之一道,钱谦益是十足门外汉,可以说完全是她自己的作品。尤其是怂恿钱谦益反清复明,不惜“毁衾纾难”,及最后还以身殉钱氏,早年在风尘中流转的坠溷弱质,后来竟有这样的作为,可称难能可贵。关于她,会另列专章来叙述。

其次是龚鼎孳与顾媚,媚字眉生,居室叫“媚楼”,世所称“横波夫人”是也。这个人跌宕风流,豪爽任侠,虽然只是龚鼎孳的侧室,因为龚是当时广大教主,素负爱士之名,一般奔走于尚书之门的士子,对横波夫人伏地称觞,以师母相称,顾媚也居之泰然。这个人出生秦淮,其风流放诞,恐怕也无人可以比拟。相传有一个故事:明末著名的理学家和孤忠大节的黄道周,平生讲学尚气节,以宋儒“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自诩。有一次友人们要试一试他道学的真伪,趁他酒醉酣卧之际,就请顾媚“白身”与他同卧一榻。“白身”即是全裸的意思。夜半黄道周酒醒看到这般情形,既不惊慌失措,也不作任何举动,只是翻一个身,依旧酣睡如故。第二天顾媚把这情况告知大家说:“漳浦真神人也。”后来黄道周以唐王大学士督师江西殉节,而顾媚却下嫁给做了大顺和大清两朝贰臣的龚鼎孳。

善于投降的龚鼎孳,在那讲究从一而终的臣节时代,纵然高官厚禄,日子毕竟不大好过,他只好逢人解嘲,说甲申那年李自成和多尔衮进入北京时,他本来是要攀鼎湖之龙髯以殉君国的,但“其如贱内苦挽不许何”!这个“贱内”便是指顾媚而言。是不是顾媚曾有过此言,抑是龚鼎孳把她

作为挡箭牌,那便不得而知了。柳如是则与顾媚恰恰相反,乙酉南都之破,柳如是和钱谦益相约一起赴水殉国,钱却踌躇而不能决,结果只好投降多铎。

顾媚也很能诗,小诗楚楚可观,但流传不多,只记得在归龚鼎孳之夕所吟的二十字:

省识无家苦,而今始有家。灯媒知妾喜,特着两头花。

这样的诗,出诸流转风尘者之口,的确是有真挚感情的作品。

最后谈到吴伟业和卞玉京这一对。柳如是虽以悲剧收场,和钱谦益总算成就姻缘;顾媚也算从良得所,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只有吴、卞这一对情侣,却是缠绵悱恻,说不尽的幽怨,诉不尽的愁怀,只有这一对情侣并不曾得到结合,却造就出吴伟业许多比李商隐明朗得多的《无题》诗。

吴伟业为人比较拘谨小心,不像钱谦益和龚鼎孳能够放纵佻达,其妻子郁夫人不是一个泼辣善妒的妇人,他敢于借口子嗣而广置姬妾,但独独不敢把一个秦淮名妓置诸于后房,这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玉京名赛,晚年入道,便号玉京道人。在秦淮时和吴伟业相识多年,初见时遂欲以身相许,吴伟业报以假痴假呆,伪作不解,怅然别去。钱谦益为吴氏挚友,欲为两人作撮合,在拂水山庄设盛宴招玉京,已至其家,忽托病不出,又成泡影。这也不知是什么原故,或许是明代功令,严禁官吏在治下纳民妇为妾。吴伟业和钱、龚等不一样,他们是京官,

不受功令束缚；而吴伟业却是南国子监的司业，官署正在南京，纳秦淮妓女为妾，或许有干功令吧。

吴伟业畏缩不前，玉京只好琵琶别抱，委身于一郑姓医士。这样却造就了吴伟业几首好诗，《琴河感旧·并序》云：“余本恨人，伤心往事。江头燕子，旧垒都非；山上蘼芜，故人安在。久绝铅华之梦，况当摇落之辰。相遇则惟看杨柳，我亦何堪；为别已屡见樱桃，君还未嫁。听琵琶而不响，隔团扇以犹怜，能无杜秋之感，江州之泣也。”诗云：

白门杨柳好藏鸦，谁道扁舟荡桨斜。金屋云深吾谷树，玉杯春暖尚湖花。见来学避低团扇，近处疑嗔响钿车。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骢容易别卢家。

油壁迎来是旧游，尊前不出背花愁。缘知薄幸逢应恨，恰便多情唤却羞。故向闲人偷玉笋，浪传好语到银钩。五陵年少催归去，隔断红墙十二楼。

休将消息恨层城，犹有罗敷未嫁情。车过卷帘劳怅望，梦来携袖费逢迎。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

长向东风问画兰，玉人微叹倚阑干。乍抛锦瑟描难就，小叠琼笺墨未干。弱叶懒舒添午倦，嫩芽娇染怯春寒。书成粉笺凭谁寄，多恐萧郎不忍看。

过了若干年后，玉京下郑医之堂，持课诵戒律，自称玉京道人而终，葬无锡惠山祇陀庵锦树林，吴伟业晚年有《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七言长句吊之。据余怀《板桥杂记》，玉京亦能诗，但未见流传。

## 柳如是的诗才与志气

清诗春季诗人中，百分之九十九是男性，妇女而有惊人的诗才足以领袖群芳者，只有柳如是和徐灿两人；而侠骨柔肠、志操节烈，则尤以柳如是为不可及。

陈寅恪先生对柳如是倾倒备至，他在失明之后，竟然为她写下近百万字的《柳如是别传》。

先得抄录两首散原老人的哲嗣兼传人有关柳如是的诗：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咏红豆》

早岁偷窥禁錮编，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草要离冢，东海南山下溪田。谁使英雄休入彀，转悲遗逸得加年。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

《题〈牧斋初学集〉》

陈寅恪先生《咏红豆》诗中第三联中的“杨爱”便是柳如是的本来姓名。对句《万古愁》则是归庄的著名的《万古愁曲子》。此句的本事是归庄曾送钱谦益一副寿联：“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诗人阮葵生（吾山）《茶馀客话》，谓归庄此联，无耻丧心，必蒙叟自为。殊未考归庄和钱谦益的交情，虽心迹异途而交情未泯，联语取义庾信《哀江南赋》“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食周粟。”“秦庭”、“周粟”，暗寓惋惜之深旨，与钱谦益之降清欲以修史自赎等情事极相切合，非如阮葵生所指以为两人情事南辕北辙，致不可有此祝嘏之语。这是一种误解。

柳如是之下嫁钱谦益，首先是钱氏的声望赫奕，官至侍郎，且为文坛盟主，次则钱氏输诚相爱，绸缪备至，再则钱氏的正室毫无妒意，但两人年龄究竟差了一大截，这也不是能求全之事，况且柳如是流转风尘，阅人多矣，能从此从良，不为非策。

明末的高级妓女，以诗赋及琴棋书画为卖笑的本钱，幼年即须习此，一般的当然不能和男子媲美，但亦有聪慧突出如柳如是者，则十五六之年，其诗赋已楚楚可观。柳如是在稚年即作有《男洛神赋》，王士禛曾说她“其殆自矜八斗，欲作女中陈思耶”？因为她嫁了鼎鼎大名的诗人钱谦益，人遂疑柳如是的作品都经钱谦益的润色或代作，殊不知钱谦益虽以诗名，却不善填词，《牧斋初学集》中只保留着少得可怜的词；而河东君却善于填词，钱谦益的几首词倒还经过她的润色哩。

江左三大家都是经过亡国之变的，龚鼎孳更投降过大

顺政权，国破殉节是士大夫传统的美德，语不由衷的也要做作一番，龚鼎孳遭甲申三月之变不死，事后对人家昌言：我本要殉难，其如小妾不许何！这个小妾便是秦淮名妓“横波夫人”顾媚，把责任推到女人头上，原是男人的惯技。柳如是则和顾媚相反，乙酉五月南都之破，如是约钱谦益一起殉节，钱谦益却逡巡不能决。可见柳如是确不同于一般青楼女子。



柳如是

钱谦益不死而降清，柳如是并不因此而死了心，她运用和钱谦益亲昵的关系，一直劝说钱氏反清复明。钱谦益听了闺闼进言，加以清廷不加重用，便对清廷持首鼠两端的态度，若干年中，钱谦益的两个弟子瞿式耜在西南，郑成功在金门、台湾，以及浙东的残明势力张煌言等都有信使往还。在拂水山庄中，柳如是是参与机密的。

其中最惊人的一次豪举是：浙东的残明势力姚志卓奉命组织反清行动，曾亲到常熟与钱谦益筹划，柳如是脱卸首饰供给姚志卓作为装备五百名军士的经费，钱谦益《投笔集·小舟惜别》云：

北斗垣墙暗赤晖，谁占朱岛一星微。破除服珥装罗汉，减损盐豢餉伙飞。娘子绣旗营垒倒，将军铁稍鼓音违。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

钱谦益自注云：“姚神武（鲁王封姚志卓为仁武伯）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囊以资之，始成一军。”“娘子”句注云：“张定西（名振）谓阮姑娘：‘吾当派汝捉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殒，惜哉！”“将军”句则谓姚志卓战死于崇明城下。阮姑娘当是女子，捉刀入侍，可见柳如是不但在经济上策划资助反清力量，而且要亲自参与战斗。柳如是的文武双全，恐怕要凌驾梁红玉之上，只是朱明败局已定，未能完成她的志愿。

柳如是所结交的均一时苏、松两郡名士，和陈子龙交情尤著，还有宋辕文、李待问，都曾同居一时，但都不能相结合，最后不得不归于钱谦益。当然钱谦益答应她的条件，不



柳如是画迹

以小星相待,而且正式到松江迎娶,在舟中行结婚之礼,谦益幡然白发,冠带合卺。但是这种违背礼教的行动,惹怒了松江士绅,群起声讨,致满船载所掷瓦砾狼狈逃回常熟,这也是钱柳结合的一段有趣插曲。

钱谦益死后,其嫡嗣子孙懦弱无能,备受族人欺凌,柳如是终于自尽以报钱谦益知己之遇,以一风尘女子而有这样的节操,真是难能可贵。

抄录柳如是诗一首,以见一斑:

年光诗思竞鲜新,忽漫韶华逗晚春。止为花开停十日,已怜腰缓足三旬。枝枝媚柳含香粉,面面夭桃拂软尘。回首东皇飞辔促,安歌吾欲撰良辰。

## 宋派三诗人

到了北宋初叶，唐人白居易、李商隐的诗，还被王禹偁、杨亿等所宗尚；西昆诸公，均未出唐人之藩篱。到了庆历年间，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崛起，尤其是黄庭坚，始有宋人面目的诗。黄庭坚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成为宋诗的开山。后来的追随者衍为“江西诗派”，写成什么宗派图，奉杜甫为“名誉”宗师，主要以黄庭坚为鼻祖，宋诗因以形成，流衍数百年，与唐诗并称。

宋诗虽然自成派系，究竟还是学唐而来，因为好诗都被唐人做尽了，若不别辟蹊境，不图变化，只知模拟唐人，则如明代前后七子之学唐，虽声色格调，有时或能相似，然神气弗存，终是赝品而少本色。

宋诗当然不逮唐诗，但是伪唐诗却远不及真宋诗；明代前后七子之遭人诟病，正因为他们只是邯郸学步、优孟衣冠。直到清诗的春季，诗人虽仍是学唐，却大异七子之故

辙,这是难能可贵之处。

在清诗春季的百花园中,所有著名诗人,无不以宗唐为标榜,贬落宋诗,因之以宋诗自立门户者,实在凤毛麟角。尤其是一些诗论家及稍后的四库馆臣,更是对宋诗不屑一顾,这当然也是应有的现象。

但是,在清诗春季中,却有一位杰出的诗人,毫不讳言自己是宋派诗人,而且大张旗鼓地为宋诗树碑立传。因为他们确是货真价实,宗唐的一些诗论家,倒也不敢妄加菲薄。

这三位春季宋派诗人,按年代的先后,是宋荦(牧仲)、查慎行(初白)、厉鹗(樊榭)。

三位宋派诗人中,论成就应该是查慎行的《敬业堂诗集》为最高,其次厉鹗也堪伯仲;而宋荦的《西陂类稿》,不逮查、厉远甚,却因他是大中丞且仕至尚书,查、厉可不逮他远甚,所以也把他附查、厉之骥尾了。查慎行和厉鹗是清诗春季中的重要诗人,自当另列专章,这里只是有关宋荦的一些论述。

宋荦在康熙朝仕途的顺达,在清初汉臣中是极为罕见的,其原因可能在于康熙帝的念旧。原来宋荦的父亲宋权,以明朝大吏,率先投降多尔衮,顺治朝对他始终恩礼不衰。康熙帝嗣位以后,宋荦即以大臣子弟入备宿卫,即和康熙成为同学年少的伙伴。有一件清初很重要的故事:康熙嗣位的时候,只有八岁,由四大臣(当然都是满人)辅政,其中最跋扈飞扬的是鳌拜。这位中国历史上堪与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相媲美的康熙皇帝,在少年时代便已不凡,定下了除



黄庭坚为清代宋派诗人所宗奉

去鳌拜的秘密计划,即是利用他的一批小伙伴,练习武艺,类似摔跤、相扑一类的把戏,趁鳌拜不防之时,一下子把他擒拿杀掉,然后亲自执政,开有清二百多年的盛局。

宋荦在那时便是这批“童子军”的一员,康熙当然不会忘记他,因而加以重用。所以宋荦一直仕途亨通,从未挫折,康熙对他的优礼,也为其他臣下所未有。传说在宋荦任江南巡抚时,正值康熙南巡,于办理接驾差使时,康熙特别关照他的御厨,把一味御用的豆腐烹调方法传授给宋荦的厨子,说这个烹调方法可给老臣下辈子受用云云。

宋荦自我标榜宋诗,当然要替宋代诗人做些工作,他曾注苏轼诗,并为之校讎补缀。但并不高明,而且沿明人之旧习,率多臆改窜乱,实在未能差强人意,连同样以宋诗标榜的查慎行也不能不认为遗憾。所以查慎行竟花了数十年的功力,另行补注苏诗五十卷,补同路人之过,成为东坡的功臣。

宋荦和江左三大家的龚鼎孳相似,以爵位取得高名,他的好友王士禛是当时诗坛盟主,得渔洋山人一字之褒,便荣于登龙门,在晚年时候,王士禛有一绝句寄宋荦云:

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谁识当时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

这是一首互相标榜并为宋荦吹嘘的七绝。王士禛曾任扬州司理(清初沿明末制度,在府下置推官一职,专理司法,又称司李,清康熙中废),而宋荦初仕则在湖北黄州通判。他在未仕时,曾绘东坡居士像,以己侍其侧,后筮仕竟得黄州通

守,这是他瓣香宋诗的起点。

当时名士邵长蘅选宋、王两人诗为《王宋二家集》,两人都是一品大员的尚书,时人颇以邵长蘅献媚大吏为言。王士禛的论敌赵执信更拿到一个好题目,对他大肆攻讦。有人说,王士禛龙门高峻,对去己太甚的宋荦未必肯降心相就,上面这首七绝,王士禛集中未载,传是宋荦以千金为寿乞得的,这是不是事实,便无法证实了。

但以宋派诗人而论,宋荦诗虽不如查、厉远甚,但也楚楚可观,如《即事六首》其五云:

雨过山光翠且重,一轮新月挂长松。吏人散尽家  
僮睡,坐听寒溪古寺钟。

这也可见到他的宋人风致。

## 烟波钓徒查慎行

专制时代，帝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任何人都毫不客气，直呼其名，倘使偶然一呼其字或号，那便认为是莫大的荣耀，称为“异数”。何况还不只是称其字号，竟用其人最出名的诗句来称呼，那更是千古盛传的佳话，为历史上所罕见。

千载上下，就有这样两位诗人，一位是唐代诗人韩翃，韩翃的著名七绝：“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同时朝列中还有一位同姓名的韩翃，皇帝要召见韩翃，为了区别起见，指定要宣召“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韩翃，当时传为佳话。千载之后，清代康熙年间，又发生一件无独有偶的玉堂佳话。当时查慎行在翰林作文学侍从，有首康熙或是皇太子允礽赐他钓鱼的诗，曾有“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的名句。那时查慎行的侄子查升（声山）也在翰林，为了要区别两个查翰林起见，康熙关照内侍，指名要传宣“烟波钓徒查翰林”。在

古代,这种荣遇是千古难逢的,查慎行身价顿时百倍,他的诗名,简直要取代朱彝尊而与王士禛并称“南查北王”了。

查慎行出生于顺治七年(1650),算是个食毛践土的清朝臣民,不在遗民之列,所以他的生平较为平凡,他既不能如陈子龙、顾炎武、夏完淳那样厕身于火热的抗清斗争,也不会像钱谦益、吴伟业等虽出仕清廷而仍有缅怀故国的低徊情绪。他的少年和晚年都在政治压迫中度过,而没有反抗的念头。两次所受政治压迫都是文字狱:少年时是南浔庄氏的明史之狱,他的族人查继佐死里逃生,不知所终,这是要夷九族的大逆罪,岂有不惧恐之理?但总算仗着“大力将军”吴六奇的庇护,查继佐幸免一死,他的族人查慎行当然也没有受到牵连。

晚年的一次政治压迫还是文字狱,那已经到了雍正初年了。为了胞弟查嗣庭的文字狱,他以长兄疏于授教,责无旁贷,也被卷了进去,古稀老翁还要解京受牢狱之灾。虽然独独对他宽大处理,这场惊吓终于使他少活几年,提早离开人世。

少、晚之间,中间还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长生殿》风波,也总算只受了一点薄谴,无妨于他之东山再起。他最得意的时候,便是代康熙做捉刀诗人这几年,便是写那首赐钓鱼的七绝和康熙仿韩翃的宣召时候,谁不要讨好整天随从皇帝身旁代天立言的诗人!

他的诗中正和平,他的处世也是谨慎小心,这是他后来得以善终的保证。其实他少年时候也是意气飞扬、不可一世的。二十岁左右,便已跟着同乡杨雍建到尚未平靖的贵

《度仙霞关题天雨庵壁》

虎啸猿啼万壑哀，  
北风吹雨过山来。  
人从井底盘旋上，  
天向关门豁达开。  
地险昔曾资剧贼，  
时平谁敢说雄才。  
煎茶好领闲僧意，  
知是芒鞋到几回。

查慎行

烟波钓徒查慎行

73

州跃马横戈。这种戎幕生活，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到了充当捉刀诗人时，又扈从康熙亲征漠北，这又是一般诗人所不能亲历的地方，生长江南而能遍历天下山水之奇，这正如太史公所称道的要使文章有奇气，非阅历天下名山大川不可。

查慎行并不是什么奇才，他只是勤于学习，他的《敬业堂诗集》，竟有四十八卷之多。陆游的《剑南诗稿》之外，言数量之多，是屈指可数的了。他简直以诗为日课，没有一天不做一首诗，所以只能说他是诗人之诗了。当时南北两大诗宗，朱彝尊是他的表兄，不必说了，王士禛对他也称誉备至，士禛说：“以巨体论，剑南奇创之才，夏重（慎行字）或逊其雄；夏重绵至之思，剑南亦未之过，当与古人争胜毫厘。若五七言古体，剑南不甚留意，而夏重丽藻络绎，宫商抗坠，往往有陈后山、元遗山风。后山凌厉峭直，力追绝险；遗山

矜丽顿挫，雅极波澜。吾未敢谓夏重所诣，便驾前贤，然使起放翁、后山、遗山诸公于今日，夏重操螯孤以陪敦槃，亦未肯自安鲁、郑之赋也。”王士禛对人如此颂扬，这是不多见的。

此外，《四库全书》总编辑纪昀本是宗唐贬宋的诗评家，却也一反常态，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为他大唱赞歌，说查慎行之诗“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敝，数十年来，因当为慎行屈一指也”。实则查慎行之为宋派诗人，在北宋宗苏轼，在南宋宗陆游，就不能用“江湖”、“九灵”那些宋派末流去衡量他了。

但真真是查慎行的知己且为他奠下崇高地位的，却是清诗夏季诗人兼诗论家赵翼。赵翼所著的《瓯北诗话》，是清诗夏季的诗论中的权威之作，它一共有九卷论古今诗人的专章，除了唐、宋六位大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之外，金代的元好问和明代的高启只能并起来作为一卷，清诗的春季诗人，只有吴伟业和查慎行各占一卷，而王士禛、朱彝尊这样大家则名落孙山，不曾列入。

赵翼和查慎行不是并存于世的人，一个方去世一个才出世，是以不会有什么党附之见。赵翼评论春季诗人的优劣时说：“清初诗人，施愚山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气，宋荔裳全学晚唐，无深厚之力，吴汉槎有高调，无馀味，王渔洋专以神韵为主，酝藉含蓄，实是千古绝调。然专以神韵胜，但可作绝句，朱竹垞则不专以诗传，究非风雅正宗。”然后说：“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这是独排众议的评论，为当时一般人所未能接受，但是他别具慧

眼,坚持推崇查慎行的立场,阐述他倾倒查诗的理由:“不知诗有真本领,未可以荣古虚今之见,轻为訾议也……,角逐名场,奔走衣食,阅历益久,锻炼益深,气足则调自振,意深则味有馀,得心应手,几于无一字不稳惬。其他摹写景物,脱口浑成,犹其余技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

查慎行在自己的诗论著作《初白庵诗评十二种》中说明对诗的主要观点:“诗之厚,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须辨毫发于疑似之间。”“气”、“空”、“脱”三个字,便是他作诗与论诗的“关键”,完全可以窥见他宋派诗人的面目。

## 烟草诗人厉鹗

士农工商，列为四民，商人的地位最低，所以诗人和商贾向无缘分。但清诗的春季诗人中，傅山卖药且佐顾炎武开设票号，可说是亦诗亦商，是个例外。卖药犹属雅道，而开设钱肆，则未免铜臭，不过傅山是心存济人济世和筹措反清复明军饷，自应当作别论。另外一位诗人，他做的是烟草买卖，在那个时候，可说是别开生面。

这位清代的诗人兼烟商，便是厉鹗。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因为家境贫困，便从小跟着胞兄做烟草买卖，一方面拼命读书。烟草的传入和种植，大概始于明末万历年间，距离厉鹗经营此业不过百年，吸烟的人远不及现在那么普遍，但种植的地方已很多，从西北的兰州到东南的福建，都盛产名烟，浙江的桐乡也有佳品，厉鹗所经营的大概便是桐乡烟草。传说康熙帝最恶此物，虽然并不曾下旨禁止，却时常告诫臣下不要染此恶习。



纪昀嗜烟如命，竟弄至脚底生烟。

最与烟草有缘的文人,总要推绰号“纪大烟锅”的《四库全书》总编辑、清诗的夏季诗人纪昀了。他的烟斗可装上烟草二两之多,可以整天不离口,从圆明园乘骡车到京城,不需要加烟。有一天不慎把烟斗丢失了,家人大为着慌,他却镇定如恒,告诉仆人到天桥旧货摊找寻;果然一找便着。因为人家捡到那么大的烟斗,无法使用,只好以贱值卖给地摊。这是纪昀出名的故事。

另一故事为纪昀虽在直庐,也烟斗不离口,有一次忽然乾隆召见,见皇帝当然不能吸烟,匆匆地把烟斗在靴页中一插,便去觐见,不料余烬未息,死灰复燃,烧得他愁眉苦脸痛苦难忍;为了仪态,又不便扑灭,真是尴尬万状。乾隆见他这种窘态,问他何故,答云:“臣靴页走水。”“走水”者失火也,一时传为笑谈。纪昀的趣事,知道的人很多,而厉鹗做烟草生意,则一般人不甚知道了。

厉鹗是宋派诗人。清诗春季的宋派诗人,除了宋荦是河南商丘人外,杭州府属便占了两位,便是他和查慎行。查慎行虽为宋诗,但还不如厉鹗之专,他全副精力和著述,都花在两宋,天水一代的朝章国故,无不精熟通晓,所著《宋诗纪事》卷帙浩繁,网罗宋人诗作和故事,与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堪称双璧。所著《樊榭山房诗集》,无体不工,在浙西诗派中别树一帜,在当时的浙派诗人中,可和朱彝尊、查慎行鼎足而三。

厉鹗只中过举人,以后多次会试及被荐举博学鸿词大科,都不曾入彀。他似乎对科第得失并不在意。有一次北上赴试,在天津遇到了几位好友,志同道合,诗酒流连,竟然

连试期已过都未察觉,只好翩然铩羽南归。

他的好友是扬州马日璐、马日琯昆仲,两马是扬州的巨富,筑有小玲珑山馆,藏有宋元佳槧,延揽四方名士,啸咏其中。厉鹗尤被奉为上客,每被邀至扬州,盘桓几忘岁月。在天津交查为仁,有别业曰水西庄,贮书万卷,也雅好接京名士,厉鹗流连津沽,大概便在查为仁的水西庄忘了试期,两人合作撰的《绝妙好词笺》,传诵一时。

厉鹗因为未出仕,除了有时到扬州作马氏昆仲座上客之外,居住杭州的时间很久,这就使他在浙派诗人中占有卓越的地位,但是宋诗幽渺孤僻,学我者病,甚至学我者死,所以从学者虽多,却没有出色的诗人出其门下,反落得一个铎钉捋撻的贬评,这也是宋派诗在清诗春夏中没有地位的缘故。

北宋时代大文豪苏轼,他除了在政治、文学、书画方面有出色成就之外,还有一桩生活方面的脍炙人口的故事,有关他的侍妾朝云。这位王朝云虽然生活在女子被压迫的古代社会中,但她与苏轼的确是真诚相爱,不避种种艰难,跟随着苏轼南谪海南荒蛮瘴雾的流放之地,后来不幸短命夭亡,苏轼写下很多情感动人的诗篇来悼念她,为后人所称道。在悼亡诗中,只有晋潘岳和唐元稹差堪与之媲美,但潘、元两人的人品,就不能和苏轼相提并论。

自从苏轼以后,写这种诗篇的人,六七百年来,公推厉鹗和月上的故事最著于人口。(现代作家郁达夫对厉鹗和月上是非常倾倒的,他的早期以历史人物为主角的小说,有过两篇名作,一篇是以清诗夏季诗人黄仲则为主角的《采石

砚》，另一篇便是以厉鹗和月上作题材的《碧浪湖的秋夜》。前者广为人知，后者则日就湮没，其实也是郁达夫小说中一篇代表之作。）

月上姓朱，是湖州乌程人，十七岁归厉鹗，二十四岁夭亡，和厉鹗相处了七年。厉鹗说她“鍼管之外，喜近笔砚，影拓书格，略有楷法。从余授唐人绝句二百馀首，背诵皆上口，颇识其意。每当幽忧无俚，命姬人缓声循讽，未尝不如吹竹弹丝之悦耳也。”但是罡风吹折，汨然而化，年仅二十有四。“悲逝者之不作，伤老境之无惊”，厉鹗写了六首哀惋的律诗来悼亡，这是传诵人口的名作，兹录下二首，以作结束：

无端风信到梅边，谁道蛾眉不复全。双桨来时人似玉，一奁空去月如烟。第三自比青溪姝，最小相逢白石仙。十二碧栏重倚遍，那堪肠断数华年。

旧隐南湖渌水旁，双栖稳处转思量。收灯门巷炊微雨，汲井帘栊泥早凉。故扇也应尘漠漠，遗钿何在月苍苍。当时见惯惊鸿影，才隔重泉便渺茫。

厉鹗和月上双栖之地在杭郊西溪，其地多芦荻，晚秋时节，偏多野趣，百馀年后，尚有荒庵一处，中供冯具区木主，而附以厉鹗和月上，好事者更新其庙貌，仍处三木主于其中。

## 宣城南施

清诗的春季中,诗人被加以流派称号的,最知名的当然是“江左三大家”,其次是“南朱北王”,也有人用浙江海宁籍的查慎行来代替嘉兴籍的朱彝尊,称为“北王南查”;再次一等的便是所谓“南施北宋”了。南施是指著籍江南宣城的施闰章(愚山)(1624—1689),北宋则是指隶籍山东莱阳的宋琬(荔裳)(1614—1673)。

中国南北之分,古已有之,在晋、宋分割局势下,南自南,北自北,倒也问题不大。自蒙古人入主中原,以西北方民族统治全国,把全民分为四等,南人斯为最下。朱明是以南人北定中原的,倒能畛域不分。到了清人以东北民族入关,又恢复蒙元的南北之见,不过究竟已迈进了一大步,只是口头上蔑视南人为“蛮子”,制度上倒是不分畛域的。

不过满汉之争和南北之见是清代开国至亡国始终存在的,南党与北党之争,贯穿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朝政。到了清代末季,军机大臣六个名额中,南北无形中各据三位,不容混

淆。这也影响到诗的领域来,诗人的南北,也不无这种成见存在。

所谓南北,似乎是以长江为界限,因为明代的江南省,清代因之,直到康熙中叶才划分为江苏、安徽两省,而苏、皖两省都有领域在大江以北。因此,大概以江淮区域的徐州为南北界限比较合理一些,所以现今隶属华东区的山东,在那时便属于北方了。

施闰章是今安徽省宣城人,诗仙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可见这个以生产宣纸闻名于世的名城确是诗之王国,施闰章生长在这块土地,当然生来与诗有缘。

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还是一个非凡的循吏,自从中了进士之后,在江西等地做了几任地方官,给大乱之后的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更令人敬仰的是他还是一个明察秋毫的推理专家,看过蒲松龄著名小说《聊斋志异》的人,一定惊叹平反一起山东冤狱的好官,那便是《志异》的名篇《胭脂》中的山东学使施闰章。蒲松龄这部《志异》大都是谈狐说鬼的作品,但在《胭脂》中却破例全用推理的方法来平反这件冤狱。施闰章是蒲松龄的老师,自然为老师出力描写,具绘声绘形之妙。

施闰章在顺治年间便中了进士,做了廿多年内外官吏,到康熙十八年召开博学鸿词大科时,又被荐举参加考试,取中在一等,改授翰林院侍讲,这使他的诗名更为轰动一时。

明代覆亡时,他不过二十岁,未曾出仕,所以谈不到是遗老遗少,对清朝倒是食毛践土,是一个顺民顺臣。到了他蜚声诗坛时,那种慷慨激昂、凄凉激楚之音,已经逐渐让位

给歌颂升平、风华典雅的盛世雅奏，全祖望最爱施闰章的诗，说他“至性深情，化才藻于无有，而孤行一往，无风调之可寻，所谓酸咸之外，别有领会”。施闰章诗中虽然不再缅怀故国，但对当时人民罹战乱之苦，时刻寄与无限的怜悯与同情，所以他的诗是最富有人民性的。除了像《湖西行》、《火坑叹》、《临江悯旱》等关心民生的诗篇外，他的五言诗，不但追踪盛唐，王士禛还说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如《送梅子翔》云：

朔风一夕起，庭树叶皆飞。孤宦百忧集，故人千里归。岳云寒不散，江雁去还稀。迟暮兼离别，愁君雪满衣。

置之古诗十九首中，也毫无逊色。

施闰章的诗，还在于学力，温柔敦厚，则其性情所寄，非可强致。《长生殿》作者也是诗人的洪昇（昉思）尝问作诗之道于施闰章，洪昇是王士禛的入室弟子，在当时为诗坛盟主，施闰章拿自己和王士禛作了一个比较说：“令师（王士禛）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我诗则譬筑室者，瓴甃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筑起。”这是对王士禛神韵诗论的曲折批评，洪昇当然领会他微旨所在，只好答以禅语曰：“此禅宗顿、渐义也。”这是不置可否的答话。

施闰章的诗虽温柔委婉，然亦有雄壮激烈，如千军万马奔腾之势者，贤者多能，固不可拘以一格。如《钱塘观潮》云：

海色两中开，涛飞江上台。声驱千骑疾，气卷万山来。绝岸愁倾覆，轻舟故溯洄。鸱夷有遗恨，终古使人哀。

“气卷万山来”，五字未为人道，真足千古。

施闰章做了几十年的官，终是两袖清风，不名一文，至文士遗业，家属不能为之刊槧行世。后来，他的孙子施璲在湖广总督府，请于府主毕沅（秋帆），才捐资为闰章刊刻遗集，得以行世。

所谓捐资者，这位由状元出身仕至大吏的毕沅，实是一个贪官污吏，但他既负爱才之名，又肯把一部分赃款用之于救济寒士，足以杜塞言者之口，所以很少有人把“贪官污吏”四字加之于这位《续资治通鉴》编者的头上。赠黄仲则白银五百两和刻印施闰章遗集，正是他高明的手法。

## 莱阳北宋

自汉、魏以降,对诗人文士加以集体称号的,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前后七子”以及“江左三大家”之类。或以地域的关系,或以作品风格的相似,人们把几个作家联在一起,作为一个派系来看待。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便据此来叙述或批评某一个作家的作品。

不过,最使人奇怪的是把江南的施闰章和山东的宋琬联在一起,称为“南施北宋”。他们两人地既分南北,作品的风格又迥不相似,虽然生在同一个时代,也相互认识,但没有共同的创作思想和目标;朋友的关系也不是很亲密,把他俩联在一起,总觉得有些勉强。

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他年龄比施闰章要长十岁。要说南施是一个温柔敦厚合乎诗教的诗人,则北宋适与之相反,他是一个噍杀郁屈的苦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苦恼和压抑,从少到老,总是受到逼害,大而至国仇家难,小而至仕宦京友,到处碰到痛苦和屈辱的不

如意之事,好像四面八方都在窥伺着他,冷不防就会大祸临头似的。久而久之,他的精神受到创伤,恐惧和愤慨时刻萦缠在他的胸臆。

造成宋琬这种心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初是他所遭遇的国仇家难。明代自万历末年起,新崛起于东北方的后金便成为边患,多次侵入掳掠焚杀,有两次越过京畿,深入腹地山东胶州。还有降清的叛将孔有德等也多次蹂躏登、莱。

宋氏是莱阳的大族,清军围城时候,阖族登城帮助官吏守御,城破之时,男子当然牺牲,阖门老少也均遭杀戮。宋琬的父兄,包括他的族人著名文士宋玖(九青)一齐殉难。其时宋琬幸而到浙江探望亲戚,得幸免于难。

接下来便是甲申三月之变,像这样的国仇家难,天崩地裂,压迫得宋琬透不过气来。在江南那时幸而结识了王崇简和王熙父子,在一起读书,成为深交。宋琬的生活较好,时予王氏父子帮助。后来王氏父子在清朝发了迹,王熙且官至大学士,宋琬也得到他们的助力。所以宋琬和其他明遗民不一样,忘记了阖门遭难的深仇大恨,于清朝第二次开科,即顺治四年(加科),便中了进士,这大概和王崇简的怂恿有关。做了官,却又宦途多磨,被人诬告与山东于七事件有牵连,这是大逆的罪名,被系在狱三年,后来也因王氏父子的援手,得以无恙,且能复为四川按察使。

在川臬任内到京入觐,家眷留在成都,适逢吴三桂反清起事,川滇邻近,闻警竟然一吓而死。这是他饱经忧患,经不起惊吓之故,存年尚不到六十岁。

宋琬以诗名,他还是个文学上的多面手,词也是擅场,《二乡亭词》和《安雅堂诗》号称双绝。他的诗如前面所说,充满噍杀之音,差不多全是感伤忧患之作,很少欢乐的气氛。只要看他的诗题,都含有“悲”、“哀”等字样,但也不乏豪放跌宕的刚劲之作。名句如“九曲流从星宿海,五陵烟锁帝王都”,“少华西来朝白帝,太行东望起黄河”,极为王士禛所激赏。

他于诗词之外,还工南北曲,今传有《祭皋陶》杂剧,用想像的手法,替东汉末季遭党锢的清流翻案,捧出一个古代刑官皋陶来扶正压邪。这剧的用意还是在为自己鸣不平,希望有一个皋陶这样的刑官。当然,这种作品不能使他跻身于戏剧家之林,远不能与他诗词的造诣相比。

这里录《安雅堂诗集》中较少噍杀之音的诗三首作结:

塞鸿就末到芜城,载酒登楼雨乍晴。山色浅深随夕照,江流日夜变秋声。上方钟磬疏林满,十里笙歌画舫明。空负黄花羞短发,寒衣三浣客心惊。

《九日同姜如农王西樵

程穆倩诸君登慧光阁》

银花烂漫委筠筐,锦带吴钩总擅长。千载专诸留侠骨,至今匕箸尚飞霜。

《刀鱼》

秋水芦花一片明,难同鹰隼共功名。樯边饱饭垂头睡,也似英雄髀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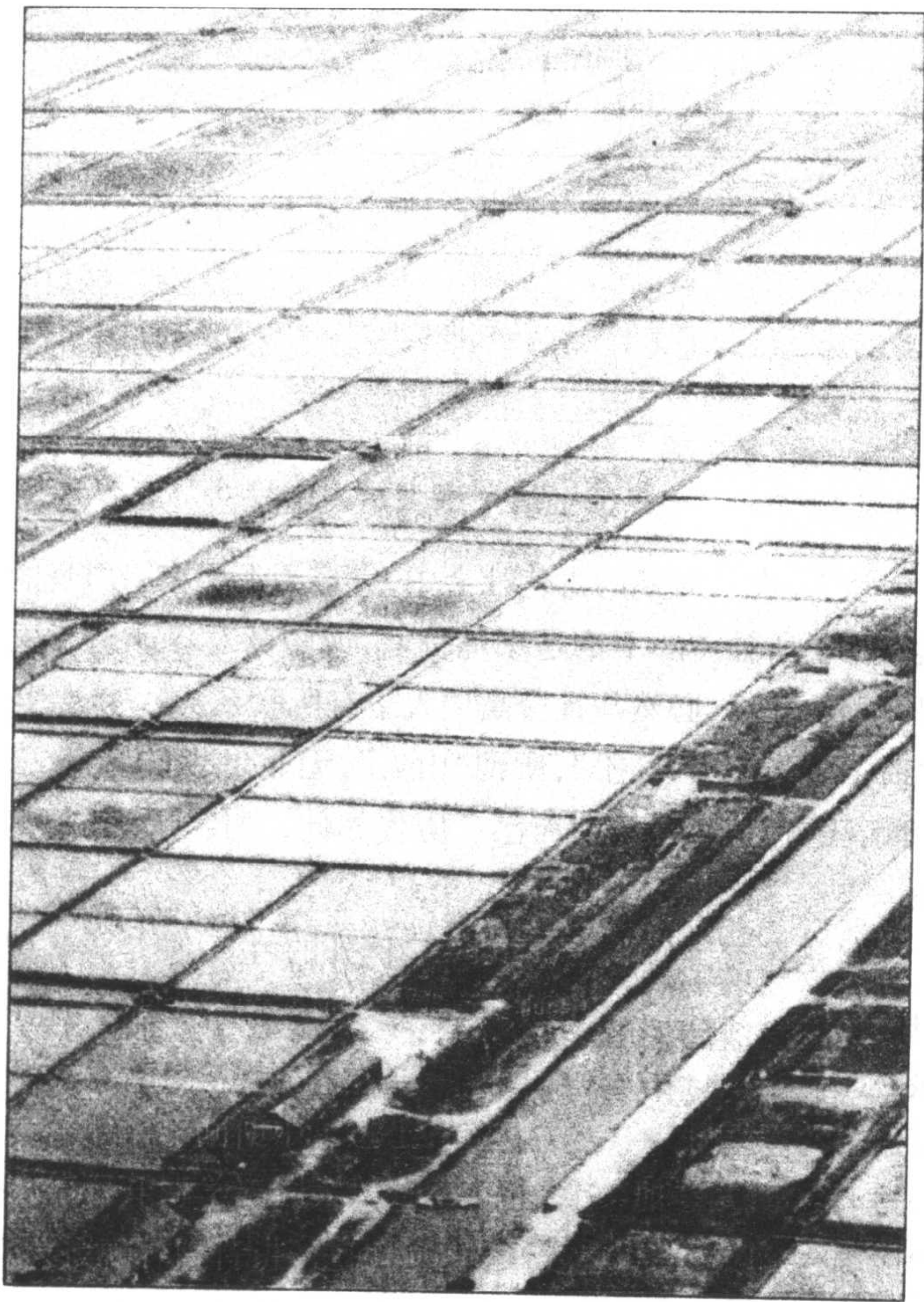
《舟中见猎犬有感》

《安雅堂集》是宋琬的集名,但明代一代诗人之尾间的陈子龙的诗集也叫《安雅堂集》,不过陈子龙的诗集后来刊刻时用了另外一个名称,所以其名不彰,而一般人对宋琬的集名倒是很熟悉的。论诗和论人,陈子龙要比宋琬高出许多。

## 盐笑出诗人

诗人，在长时期的古代社会中，大多为上层家庭出身的读书士子所独占。不论是家境贫寒，或吟咏对象取材于农民及田园生活，必然与社会高层人士有所联系，借以为晋身之阶。历来所谓“隐士”，所谓“山人”，无非是“可怜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而已。历代如此，清代当然并不例外。

但是在清诗的春季，却有一位例外的诗人，便是吴嘉纪（1618—1684），此人偁处苏北海滨，其地风气闭塞，文风不振，他日日和煮盐为生的穷灶户为伍，既无声气可通，又足不出苏北泰州东淘一步，过的是极端贫困的生活，却能日以吟诗为事，唱出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真实生活的诗篇，成为一代的强音。他的一生虽大部分时间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但到了晚年，由于一二著名诗界权威的赏识和延誉，竟得以出人头地，成为清诗的春季花圃中一枝独秀花朵。他的名字在《清史稿》中有传，不可不谓清诗中一个罕有的特



吴嘉纪的诗多写于苏北的盐田上

例了。

吴嘉纪所以成名,得力于两方面,首先是他所处的环境是为任何诗人所未有的,这便是他长期生活在苏北泰州的东淘,这个地方是两淮盐区的主要盐场,居民都是靠煮盐为生的穷灶户,他们毕生受尽官吏和盐商的层层剥削,除了尚不会像一般文家所说的“食淡”之外,简直是穷到体无衣、饥无食、居无屋的地步;可是靠盐为职掌和贸迁的官及盐商,却是那时社会的显宦巨商。在淮扬一带靠盐致富的官商,其骄奢淫佚的生活,和灶户的穷苦艰窘正成了一个显明的对比。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士,为扬州的繁华唱出了无数的赞歌,却从没有一个对盐的生产地和生产者有过什么描绘。有之,则自吴嘉纪始。

吴嘉纪不但在贫困艰难的盐区生活中生长,而且他所遭逢的时代,正是明、清易代之际。苏北扬州属县一带不但穷苦,而且还是兵家必争之地。清兵入关之后,史可法以督师身份驻扎扬州,所属州县都分配给他所部的骄兵悍将,所谓“四镇”。为了争夺扬州,四个总兵还来了一次火并。泰州东淘正处在这个漩涡中;而清兵由豫亲王多铎率领的大军又正在这里和明兵接冲,不论是明兵和清兵,其为祸患于百姓都是并无二致的。吴嘉纪在《扬州十日》的纪事诗说道:

城中山白死生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几人活!

我昔兵过独还家,畦上髑髅多似瓜。鸭毛满蹊旧狗死,篱菊自放霜中花。

在这样贫穷与兵灾双重压迫之下，吴嘉纪凭着他亲身的见闻和遭遇写出现实的诗篇，为他的同乡伙伴呼喊悲惨的境遇，这是在清诗的春季中任何一位卓越诗人的诗集中所不能见到的，如《赠张蔚先生》一诗云：

早夜煎盐卤井中，形容黧黑发蓬蓬。百年绝少生人乐，万族无如灶户穷。

不但有人为的祸患，而且天时的灾侵也时常给饥寒的盐民带来不能抗拒的灾难：

悲哉东海煮盐人，尔辈家家足苦辛。频年多雨盐难煮，寒宿草中饥食土。壮者流离去故乡。灰场蒿满池无卤。诏徕初蒙长官恩，稍有遗民归旧樊。海波忽促余生去，几千万人归九原。极目黯淡烟火绝，啾啾妖鸟叫黄昏。

像这样的诗，在众多的清代诗人中是仅见的。有人说他是“诗史”，甚确，但决不同于描绘军国大事、帝王将相的诗史，他是真真为社会最低层的老百姓而歌唱，使人们读了透不过气来，然而却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能够赏识吴嘉纪于盐筴之中并多方为之延誉的，是清诗春季中的诗坛盟主王士禛和周亮工，没有这两位知名人士为之提携奖掖，吴嘉纪这个名字恐怕到后世也不会有人知道。

## 流放诗人吴兆骞

流刑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刑名一种，俗称充军。唐、宋时期，南方还未开发，是瘴烟蛮荒之区，所以流刑都是充军南方。到了清朝，东北、西北都入版图，便改了相反的方向。南方苦热苦瘴；北方则苦寒，冰天雪地，味道实在不好受。流刑也有轻重，最重的是发往极边，“给披甲人为奴”。披甲人大概是边防军士，给他们做奴隶，情况可想而知。流放的地点主要是在东北三省和西北新疆。在辽宁的是尚阳堡，在吉林的是宁古塔。那时新疆省还没有建置，其地叫作回部，戍地是伊犁。宁古塔和尚阳堡，便是所谓“极边”了。

犯流刑的也要看犯者的身份和地位，《水浒传》中的林冲和武松属于下层阶级，由薛超、董霸之流押着，还要带着枷铐上路，当然苦不堪言。但倘有钱或者是官吏，情况便大不相同，尤其是高级官吏。高级官员受处分，最怕是降职。一个堂堂的封疆大吏，革职不怕，遣戍也不怕，即使斩监候也还有救药。若是降职，从一二品的总督巡抚，一下子成为

道、府班子,若要升迁到原来地位,需要爬多少年!更难堪的是平时的属吏,现在反要脚镣手版,称大人、卑职。遣戍充军为什么不可怕,天怒一霁,立刻召回,还不是官复原职。因此遣戍路上的地方官,决不敢有所得罪,生怕一旦赐还召回,又是大员。所以一路赴戍,还是四人大轿,只是人的顶子摘去了,轿子上面的一颗顶子也同样摘去,一路迤逦行去,其实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清末参与新政的广东南海人张荫桓,虽从佐杂小吏出身,却是天生异才,诗文比翰林、举人还要高明,也可加入清诗冬季诗人的行列。戊戌变法流产,他的处分是流放伊犁。谁知他自恃慈禧太后对他还有好感,竟从戊戌(1898)起行,坐着没顶大轿走了二年,到了庚子(1900)八月还逗留在甘肃兰州,给顽固守旧派参了一本,就在兰州就地正法。要是他早到伊犁,一条命就不会丢掉,辛丑议和,肯定会大有作为。这是弄巧反拙的一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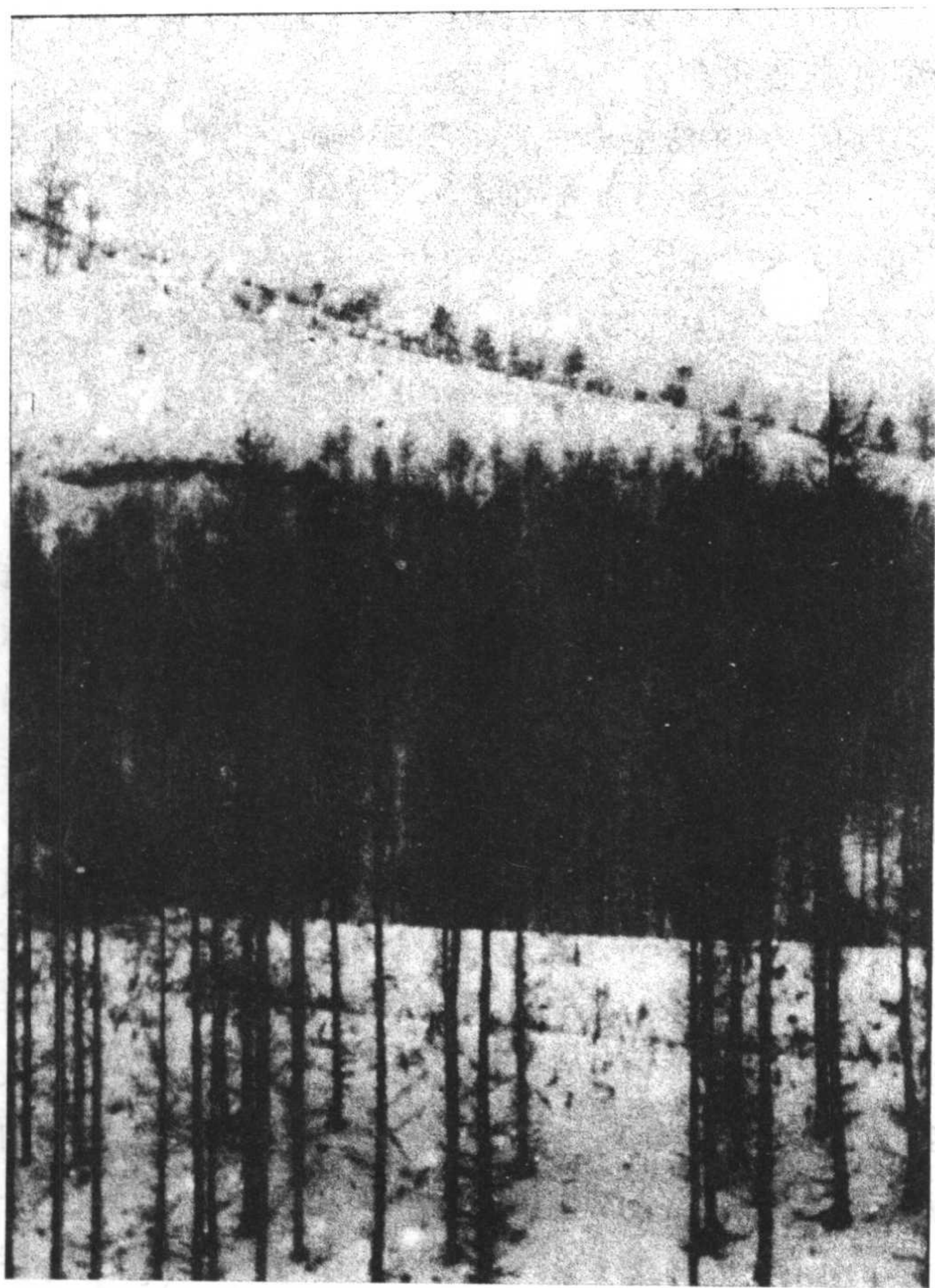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清诗的秋季重要诗人,便是鼎鼎大名的林则徐,他为了烧鸦片得罪了英国,又得罪了穆彰阿,也是遣戍伊犁。行到郑州,他的好友王鼎正以大学士在那里治河。王鼎深知林则徐治河的本领,自知不及远甚,便奏留在河工效力。经过林则徐的努力,黄河不久即告安澜合龙。王鼎在奏报劳绩时,当然以林则徐列名,以为虽不能开复原官,遣戍总可以将功赎罪的。不料道光皇帝实在颞预糊涂,竟然不理睬王鼎的奏请,仍着林则徐负戈伊犁。王鼎觉得实在对不起朋友,竟然为此自杀身死,遗疏严劾穆彰阿,也被人掉了包,无从上达,这是清中叶的一件大案。但一到太平

天国起义；朝中无人，只得又把林则徐从伊犁召回，官复原职，还加钦差大臣去镇压洪、杨。只是林则徐未曾视师即星堕军中，把盖世功名留给曾国藩了。

再有一个中法甲申之战在马尾丧师的张佩纶，遣戍黑龙江，他是光绪中清流党四谏之一，后来成为李鸿章的女婿，现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他在黑龙江戍所的日子实在舒适，黑龙江将军对他嘘寒送暖，赠煤馈物。不久便悄悄地回京，只可惜做了李鸿章的女婿，要避嫌不敢举贤不避亲，所以始终闲居家中。直到辛丑议和，才赏一个翰林院编修，襄助丈人和外国公使周旋。

以上所说的是高级官吏的流放，若是一般罪人，那就适与相反，苦况难言了。不过只要是骚人墨客，也决不同于林冲、武松那些粗人，冰天雪地之中，也不乏缔结诗社，诗酒倡和的雅举，而且对在不毛之地传布文化，确也起过不少的作用。

在清诗春季被流放到东北的诗人中，最著名的便是以《秋笳集》名世的吴江人吴兆骞。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自幼即有文名，顺治十四年中顺天乡试举人，这一科是清代文字狱第一起大狱，主考左必蕃、赵晋出卖关节被人举发，两主考判处死刑，所中举人一律在殿廷复试。复试的待遇是科举史上没有前例的，由两个兵士手持大刀挟持一个举子应试。大才磐磐的吴兆骞竟然吓破了胆，把笔不能成一字，交了白卷，结果遣戍宁古塔。兆骞的友人没有一个不为之冤屈，但因为交白卷是事实，无法为之解救，这样一去塞北便是二十年。



东北的林海雪原,吴兆骞流放之地。

顺治丁酉科场大狱,是清廷首次对汉族文士立威,在京的和远在江南的文士有狐死兔悲、物丧其类之感,纷纷为之营救解网,其中不乏政府重要官吏,但因为都是汉人,并无实权,只有创作诗词,以相慰藉并发泄自己的牢骚而已。其中最传诵一时的,是吴伟业的《悲歌行赠吴季子》,用想像的手法描写宁古塔的雪地冰窖,所谓白山黑水,在吴伟业笔下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这样的惨境。

更有名的是吴兆骞最好的朋友顾贞观两阕《金缕曲》: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万事无恙,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归日急缮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

当时当权的满臣中,只有纳兰明珠有办法营救吴兆骞,顾贞观的《弹指词》是和明珠之子性德《饮水词》齐名的,性德读了《金缕曲》泣曰:“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当以身任之。”性德愿意负担十年中吴兆骞家里的生活,但贞观认为人生有几个“十年”,他竟然为了朋友,长跪在明珠面前,逼使明珠不能不出力使吴兆骞生入玉关。及兆骞赐还,可惜老诗人吴伟业早已去世了,王士禛感慨道:“太息梅村今宿草,不将老眼待君还。”吴兆骞经过千辛万苦,生入玉门不多时便去世了。

吴兆骞的诗,在唐人近李颀、高适、岑参,在明人近七子,《秋笳》一集在清诗的春季中别树一帜,这是其遭遇所造成的。兹录其在戍中怀友一律:

岁晚霜清木叶愁，病馀蓬径愧淹留。紫台一别悲苏李，青草频年哭应刘。归梦关涉长伏枕，客心天地各惊秋。明朝谁是登高侣？零落黄垆岂再游。

和吴兆骞同郡同科同戍同还的清诗春季诗人，还有孙旻。孙旻，字赤崖，他的诗名虽不逮吴兆骞，却因为他的兄弟孙承恩是顺治十五年戊戌科的状元，仅后于孙旻遭戍的一年，传说是顺治对孙旻的处分内疚于心，因而对孙氏有所补偿之意，可孙承恩并不稀罕舍来的富贵，中了状元之后就闭门不出，这就令当时诗人有许多“南枝向暖北枝寒”的诗章可以吟咏了。

## 满族诗人

满族崛起黑水白山之间，从游牧到建成帝国，为时不久，强弓铁骑，固其所长，文化却非常落后，到了天命、天聪时期，才有图海其人创造文字，这便是入关后所谓“清书”或“国书”。书籍著述，当然更谈不上，据说为作战行军所必备的军书，也只依靠从汉文翻译过去的《三国演义》小说，只靠诸葛亮指挥战役而不知孙吴、司马为何物。

但是刚走出沙漠森林不久的民族，血液是新鲜的，不像古老民族的僵化。满族正和日耳曼民族一样，很快就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来壮大丰富自己，所以在入关不久之后，在文化方面，尤其在诗词方面，较之汉民族毫无逊色。

清廷在入关前后，除了厮杀之外，政治经济，一无所长，先依靠了一个范文程，后又收降了一个洪承畴，两个都是汉人，洪承畴事迹知道的人多了，范文程是杖策军门，从中原南方去见努尔哈赤的。范文程是留侯(张良)式的人物，对文化却似乎并没有什么贡献。

满族的文化赶上汉族,都是靠自己的善于学习,不到半个世纪,即已楚楚可观。到了康熙年间,出了一位大诗人兼大词人纳兰性德,性德的词,纵不能称清代第一,总也数一数二的了。到了清诗的夏季,又出了一位名震寰宇的大诗人、大小说家曹雪芹,有人说他是汉人是不对的,曹雪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满族作家,有人说曹雪芹的遗诗不过片言只字、断楮零笺,怎能说他是诗人。这又错了,一部《红楼梦》中有多少诗词,既然《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他那些代人立言的诗词能说不是曹雪芹的作品吗?

再下去满族的诗人愈来愈多,到了清诗的冬季,盛昱和宝廷两位满族诗人在同光体诗坛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不但一般满族士人如此,更令人惊奇的是冲龄登上大宝的小皇帝顺治帝,也竟是一位诗人。在清诗的春季百花园中管领群芳,效一句过去臣下讨好的话,真是“天纵圣明,睿知迈古”了。顺治不像他的儿子康熙和曾孙乾隆那样,编成汗牛充栋的诗集,倒是自己亲自动笔的。据翁同龢的《翁文恭日记》,北京西山天太山慈善寺,俗呼为魔王庙,有顺治题壁诗,诗是七古,很长,只能录开始一段: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朕乃山河大地主,忧国忧民事转繁。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来时糊涂去时迷,来去昏迷总不知。不如不来亦不去,亦无欢喜亦无悲。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

这种亦文亦白“语录”式和“偈”式的诗,恰像是这位开国皇



单以《红楼梦》的诗词而论，曹雪芹  
已不愧称为清代的大诗人。

帝的亲笔,而他的儿子和曾孙可以覆瓿的诗,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有“机要秘书”为之捉刀,那些捉刀人都是清诗春夏两季的重要诗人,将在其他章节中叙述。

乾隆是文事武功并重的十全老人,他比祖父康熙当然有机会多念了一些书,又能写一手字,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诗和字都另有一格,姑称之为“乾隆体”吧,实在读了令人发笑,但为之代笔捉刀的诗人书家则必须按着他的作风去代他吟诗写字,这也不是很容易当的差使。他当皇子的时候,已经编成一部卷帙可观的《乐善堂集》了,这里面的想都是他自己的大作。

人家说乾隆是海宁陈阁老(世倌)的儿子,实在是一个汉族血统的皇帝,这是汉人自我慰藉的想法而已;事实上乾隆很替同族人争地位,举一例足以说明。他的诗友兼捉刀人江南老诗翁沈德潜选了一部《国朝诗别裁集》,是清诗的春夏两季诗人作品的选集,起入关(1644)迄乾隆二十五年(1760)。沈德潜原已选过唐、宋两朝诗别裁集,可说是夏季诗人中诗评和诗论的权威。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皇帝对这位诗友忽然板了面孔(其原故在另文自有交代),指摘沈德潜不该把钱谦益、屈大均、吴炎等人选入而置满族诗人于卷末,吓得他连忙于该书再版时重行釐订更正,于是满族诗人允禧、弘曠、德普、恒仁、塞尔赫等作品便从卷末移置到卷首上来了。君相能造命,当然更能造诗人的地位,信有之!

平心而论,这几位诗人的诗,固然不能和钱谦益、屈大均相比,但的确也并不坏,如慎郡王允禧的《月夜台上听友

人弹琴》：

高台夜色深，月下闻清琴。能使座中客，俱生尘外心。石泉泻寒碧，霜竹折孤音。曲罢长天静，忘言一整襟。

这首诗堪与唐人常建五律媲美，难为这位宗室王子！这些满清贵族诗人，总有些贵介气，轻易不肯署名，凡是做诗写画，总是具名什么“红兰主人”、“紫琼主人”之类，使人不敢比肩仰视。

但曹雪芹虽说后来在满族中属于低层人物，连吃饭都困难，“举家食粥酒常赊”，而诗则是无愧于清诗的夏季大诗人之称，谁有本领能够替十二金钗及宝二爷捉刀写出各不相同风格的诗呢！

## 捉刀诗人高士奇

在谈满族诗人时，曾说到了清朝开国皇帝顺治，节录了他的西山魔王庙的题壁诗，并且肯定此诗确是出于他的亲作。顺治并没有什么卷帙浩繁的诗集留给《四库》，这是因为草创之主尚无“稽左右文”的闲暇。

到了康熙和乾隆时代，天下已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止戈为武，当然要摆出右文的架子，做皇帝的便要身先为天下创。翻开《四库全书》目录，康熙和乾隆诗文集的卷数，准会吓人一大跳，其卷帙之浩繁，实令一个穷年寒窗的终身著述的文人，也望尘莫及。难道做皇帝的果真是天生睿智，三头六臂，于日理万机之余，还有三宫六院，怎有功夫从事那么多的著述？

现代不论中外，凡是中级以上的官吏，总有一名机要秘书，代他撰拟一切讲稿、文件；但古代的君王，那可不行，尤其是诗文，决不能像制诰诏谕，可以由臣下代拟，因为诗文究竟是属于私人的著述，不能让别人知道是他人的代笔。

然而皇帝的诗文是由他人捉刀的,毕竟是公开的秘密;不过这个秘密,捉刀者、被捉刀者以及读者三方面,都心照不宣,不能说破,尤其是捉刀者,更要谨慎小心,切不能有丝毫泄漏,否则就会大祸临头。

康熙八岁登基,即使以后再有近十年在书房读书的机会,恐怕也不会高明到哪里去。这位皇帝雄才大略,酷喜学问,不过他爱好的是实用之学,尤其是数学,对诗文未必能多下功夫。在故宫文物中所存他的书法,近于小学生的孩儿体。然则到今天尚存那么多的诗文集和在镇江、杭州的石刻宸翰,岂是他的亲笔?

乾隆的情况要比他的祖父好一些,因为他做“阿哥”的日子很长,足有读书习字的机会。不过他的诗和字都别创一格,只好称之为“乾隆体”罢。字是肥硕多肉,好像杨玉环的身子,诗则之乎哉耶都可入诗,寒山、拾得和王梵志的诗,加上富有四海的帝王气,便可为“乾隆体”的诗下注脚。在他汗牛充栋的御制诗中,据说《乐善堂集》是他在做“阿哥”时便已编写的,想来还是他的亲笔,因此还有可读的篇章。

到了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由于西方文明的侵入,求实精神有了萌芽,帝皇诗文书画的神秘性略有些明朗化。跟乾隆一样被称为“老佛爷”的慈禧皇太后,她居然聘请一位云南女史缪素筠在宫中代她挥洒“宸翰”,宫监称为“缪先生”,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三方面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公开谈论,这不可不谓进了一大步。

康熙、乾隆两朝一百二十一年间,究竟有多少捉刀诗人,从没有人敢笔之于书,因之也无法知道和统计,只能从

《送孙恺似孝廉》

沁园词客旧知名，  
曾在杨花渡口行。  
佳句已传箕子国，  
归心又向阖闾城。  
白蘋风细扁舟稳，  
青桂香浓小苑清。  
吾亦有庐江上好，  
秋来鲈鲙不胜情。

——高士奇

蛛丝马迹中可以钩稽到三位捉刀诗人，因为他们都是清诗春夏季中重要的诗人，所以迹象不无可寻之处；其他捉刀人，则一如曹阿瞞侍立的人一样，莫知其为谁何了。

第一个是康熙朝的高士奇(1692—1752)，浙江平湖人，号江村。凡是雇用捉刀人，必须出于左右亲信的荐举，高士奇和查慎行都出于纳兰明珠的进荐，纳兰明珠是满族的能人，大词人纳兰性德的父亲。高士奇当初只是个落魄书生，连明珠太傅的门阶都踏不上，只好做做宰相家人七品官安仪周的门客，但有本领的人总有机会脱颖而出，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给明珠赏识了，大加宠幸，而且不久还推举给皇帝，作他诗文书画的捉刀人。这样高士奇一跤跌到青云里，不由科第途径而得到翰林院官职，死后还得到后来左宗棠百战功勋才取到的文恪美谥。

高士奇很有才学，但人很不安分，有了这样的优差，自



江苏镇江金山寺。  
康熙曾在此御笔亲题“江天一览”四个大字。

可在外出卖风雨雷霆,营利结党,广收货贿。当时明珠是北党领袖,他又和徐乾学勾结,成为南党主角。对旧府主明珠既勾结又斗争,闹得乌烟瘴气,不可开交。京师那时有谣谚云:“四方异宝归东海,万国奇珍贡澹人。”东海是徐的郡望而高士奇字澹人,一个穷书生不数年便富埒王侯。

高士奇真有一套,他扈从康熙巡幸江南时,登镇江金山寺眺览大江,帆樯林立,气象万千,康熙不免要附庸风雅,洒翰立碑以留纪念,但急切中想不出要写什么。高士奇辨貌观色,趋前伪作磨墨状,于手掌中写“江天一览”四个字,康熙一见大喜,下笔一挥而就。这块刻着康熙御笔“江天一览”四个大字的丰碑,至今还屹立在金山寺前长江岸侧,其实词和字都出于高士奇的捉刀。

另外,西湖十景如“平湖秋月”、“柳浪闻莺”等处,都盖有金碧辉煌的御碑亭,也树立着康熙的擘窠大字的石刻,碑阴还刻着刻碑官吏的名衔,三行名衔中最后一行便是高士奇。当然和金山寺那碑一样,都出于高士奇的捉刀。

康熙不失为英明之主,高士奇的胡作非为,难逃他的睿鉴,只好忍痛割爱,命他出京修书,以示保全。高士奇宦囊已丰,便侨寓西湖,建起一座精致的房宅,这便是至今犹存的“高庄”。

## 捉刀诗人续谈

康熙失去了高士奇,当然需人补缺,他有了高士奇的前车之鉴,以后延用的,必须是谨慎缜密、处处小心的人,既不能泄密,又不能借此招摇。这样的人才,还要命他的内大臣明珠找寻荐举。

明珠府邸有一位教他小儿子揆叙(大儿子性德已经去世)念书的西席老夫子,就是浙江海宁人查慎行。他既是清诗春季的一位重要诗人,又是宋派诗人的班头。此人为了饮酒观剧,无端惹来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被驱逐出京,隐匿了一个时期,才改掉原名和籍贯,重到京师。从嗣璫改为慎行,便是有怨于过去之放达,以后要慎言慎行之意。他的确已深自改过,明珠认为可靠,便荐给康熙。一试之后,觉得满意,从此便成为康熙第二个可考姓名的诗文捉刀人。屡试不第的举子,一下子便掇二甲高科进入了翰林院。

翰林院的编修、检讨等官,金马玉堂,位虽清华,俸给却微薄,无法给养家室,所以叫作“穷翰林”;又因为地处清华,

也叫作“清翰林”。当穷而又清的翰林，惟一的希望是放学差。学差分两种，一种是三年一任的学政，俗称学台，这个差使还落不到编、检头上，像江、浙等大省，往往由二品大员挂兵部侍郎衔的人才可放。所以编、检只有希望放各省的主考、副主考。据说凡是洁身自好爱惜羽毛的主考，放一次差，下半生的生计便可无忧，连求田问舍的资金都有了下落。编、检放学差须经过考试，考在高等的便可有望，但也不一定根据考试，有时“简在帝心”，随时朱笔可以划出。（笔者有一位当翰林院编修的祖辈，幼时常听他讲得放一任陕西乡试副主考的故事：那时光绪皇帝亲政，两宫垂帘，大事均取决于母后，小事则可由儿皇帝作主。那年陕西正主考放的是“管廷鹗”，副主考呈由光绪圈定，皇帝拿了长长一篇名单好一阵子，结果朱笔圈出的竟是笔者的祖辈，因为他的运气好好在名字取得好，大名叫作“杨家骥”，光绪认为和正主考是天生巧对，工整无与伦比。）

查慎行因为片刻不离皇帝左右，决不能长时期离开北京，所以始终挨不到学差，虽然赏赐频繁，恩礼有加，实在为数微薄，只够勉强补贴，所以始终是个穷翰林。到了放归田里之日，以垂白之年，还得奔走四方，到处打打抽丰，实在是做了一桩既荣耀又穷困的苦事。

当时全国十八省，江苏、安徽合为江南大闾，陕西、甘肃亦合一闾，每逢乡试之年，有三十多位主考待放。它是按路程远近分批发放的，一开年首先放贵州一省，因为八月乡试，路上便要走五六个月陆程，而顺天、山东则要迟至七月才放。差使的优劣，不问省份之大小富瘠，而是路程要愈远

愈好。好就好在一个远字，一路迤邐行来，遇尖打尖，逢驿宿驿，按照功令，凡是住宿的被衾帐席以及杯箸盆碗，用过之后，都应归主考所有。这些庞杂郎当的东西，当然不便席卷而去，惯例是结价折付现金。所以五六个月近二百天的行程，每天的折价便很可观；何况每到一处，必以扇面楹联赠送当地官吏绅士，所得的贐仪又大有可观，这便名为“抽丰”，又称“秋风”，言如秋风之扫落叶。

查慎行这位捉刀人，虽然小心谨慎，当差之外，不敢与问外事，但是康熙年间，诸皇子各立门户，培植党羽，准备争夺大宝。以查慎行日在帝侧的地位，自然是争相发展的对象，像他的胞弟查嗣庭，早已被皇子如允禧、允禩辈所罗致，成为人幕之宾。清代惟一的皇太子允礽，对慎行又时加青睞。幸而查慎行对此把握得很好，到处应酬却又没有滑到某一方太远，所以也没开罪后来夺得宝座的皇四子胤禛（雍正），这不得不归功于早年的蹉跌及以后的定力。所以胤禛即位之后，查嗣庭不免于刑戮，阖族遭戍。慎行虽亦遭牵连，却得保全一条老命，连充军都赦免了。

充当乾隆捉刀人要比康熙时困难得多，原因是乾隆本人也能舞文弄墨，不像代康熙捉刀只要任自己作风做去便可。乾隆的诗和书法都别有“乾隆体”的风格，捉刀人必须学会“乾隆体”才好替他捉刀，这非下一番苦功揣摩不可。

乾隆皇帝的捉刀人可考的，是清诗夏季的一位极重要诗人苏州沈德潜（1673—1769）。沈德潜，号归愚，他不但是诗人，而且还是诗论家、诗选家，他的诗论宣扬温柔敦厚的诗教，不为偏激之论，正配合着乾隆的盛世，因之大得乾隆



乾隆的御诗原来很多由沈德潜代笔

的激赏。在晚年一登进士之第,便和皇帝结成诗的鱼水之欢,皇帝竟然称他为江南大名士、朕之诗友、大诗翁,笼络无所不至,目的是有这样一位大诗人为他捉刀,使十全老人的文学一全更加完全。

沈德潜活到九十七岁,放归之日,待遇优渥,皇帝好像老朋友似的依依送别,死后恩恤有加,赐谥立碣。但是沈德潜毕竟老悖糊涂,他的子弟学生也是荒谬绝伦,在编印沈德潜的诗集时,竟然把他的捉刀诗文全都编了进去。这一下可泄漏天机,使皇帝露了馅,心中万丈怒火,却又不便正面发作,以免欲盖弥彰,只得忍受下来。过了一个时候捉到一个错处,立刻脸皮一翻,不认这位“诗友”的账,下诏历数其过失,予以刨墓扑碑的处分,方出此一口恶气。

## 断送功名到白头

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发生了一件国丧期内演《长生殿》传奇的案件,当时在北京参与观剧的名士,亦即属于清诗的春季诗人,多遭到褫革的处分,有的从此一蹶不振,有的过了一阵东山再起,是文士的一场浩劫。其时有人以诗嘲之曰:“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嘲弄的对象是指谁,恐怕对任何一个遭褫革的人都可以;但最为恰当的,自然是《长生殿》传奇的作者洪昇。

自古诗人多穷,韩愈、苏轼等都是命遭磨蝎;身名俱泰,克享遐寿的不是没有,为数毕竟不多。穷而薄命,自然更为可悯,然而诗卷长留天地间,争世间数年的富贵与岁数究竟没多大意义。唐代有一位薄命诗人李贺,久为千古薄命诗人的代表,千载而下,清代诗人黄仲则也脍炙人口,博得多少后人的怜惜与同情。然而薄命还比苦命略胜一筹,李贺还有母夫人的母爱,黄仲则尚有毕沅的一掷千金,而苦命的则无往而不运蹇,连死亡都不克善终,那真是苦命之至,这

便是洪昇的遭遇。

洪昇(1645—1704),号稗畦,浙江钱塘人,出身于富贵清华的家庭,他的太丈人黄机且为清朝的大学士。一生下来,便逢到清兵南下,过的是乱离逃难的生活,以后迄无宁岁。

到了廿多岁,因有人挑拨离间,致使家庭发生裂痕,不得不独立生活,进入了贫困的境遇。但凭着他的天资与好学,声名却蒸蒸日上。在京师之日,所与京游,都是一时名流。但是始终不利于科场,到了中年,还是一个国子监监生。他不但是个诗人,更令人倾倒的是妙谳词曲,是清代著名戏剧家之一,所谱《长生殿》传奇,是可演可唱的名剧。“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便是说梨园子弟为了演奏《长生殿》,得到好处不少。伶人们想报答他,于康熙二十八年八月聚资招请都中名士观演此剧为洪昇寿。时日不利,值康熙的孝懿皇后佟氏国恤未满期,被给事中黄六鸿疏劾洪昇等人于国恤张乐为大不敬。但康熙帝对此案并不想兴大狱,只是把洪昇革去国学生籍,驱逐回南以示薄惩。这样,便使一代才人蹉跎终身,永无进身的日子了,即所谓“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长生殿》一案虽未成为大狱,因为得罪的都是知名的文士,所以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其起因究竟为何,传说纷纭,大致有三种原因:第一是康熙朝南北党之倾轧,得罪都是南党中人;其二是参与观剧诸人中,以赵执信官位较高,他恃才傲物,开罪了一个由知县行取入京为给事中的黄六鸿。黄六鸿去谒赵执信时以土仪(土产)和著作为贽,而赵氏答

以“土仪拜登，大著奉璧”。这个黄六鸿也算科目入身，他的著作竟叫《福惠全书》，即是“做官秘诀”，其遭赵执信璧还，确是自取其辱。黄六鸿受此奇辱，有了机会，便进行报复。在赵执信固然咎由自取，洪昇则不免有池鱼之叹，这也是命苦。

至于第三，则别有奇想，说洪昇的《长生殿》是借古讽今，虽搬演唐明皇和杨玉环的故事，却影射清代开国皇帝顺治和董鄂氏的生死情缘，因而康熙帝和满洲大臣均深恶此剧，借故驱逐禁演。此说最为荒诞不经，洪昇出生之日，明朝已经覆亡，而他的家族和妻党，都是应举做官，倾心新朝，并无故国之思。洪昇本人也一意向上爬，决无胆量讽刺时政，显然出于附会。但同时诗人张奕光的《回文集》有《书洪昉思先生〈长生殿〉传奇后》一绝云：“《长恨》有歌悲国破，返魂无术少仙游。伤心最是《铃淋雨》，读罢常呼大白浮。”然此诗为回文体，倒读之则为“浮白大呼常罢读，《雨淋铃》是最心伤。游仙少术无魂返，破国悲歌有恨长。”这就很明显指出《长生殿》是隐寓破国亡家之恨。究竟如何，后人难以判断。

洪昇的知己友人李孚青曾有《偶忆洪昉思已已被斥事即题其集后》绝句足以概括《长生殿》一案的情况。

一

奉敕填词岁月多，飘零何处睹黄河。六朝乐府平生熟，不记元嘉读曲歌。

二

《长生殿》比《醉蓬莱》，桂子飘香是祸胎。即日杭

城得归去，保安十载事堪哀。

三

捶楚功名已放休，依然扣虱见王侯。网罗才脱蛟  
龙窟，岂忆西湖是浊流。

这位苦命诗人虽然也活到花甲之年，却蹈李谪仙的故踪，于中秋夜饮西湖大醉，失足堕水死，这是李孚青第三首诗末句的注脚。一说于六月初一乘船经乌镇酒醉失足坠水而死，因杨贵妃生日是六月初一，所以时人有“太真生共可怜宵”之句。

洪昇是王士禛的高足弟子，王士禛对他也是另眼看待，他的《稗畦集》诗是清诗春季诗人中的高唱，如五律《寒食》云：

七度逢寒食，何曾扫墓田。他乡长儿女，故国隔山川。  
明月飞鸟鹄，空山叫杜鹃。高堂添白发，朝夕泪如泉。

七绝《钓台》云：

逃却高名远俗尘，披裘泽畔独垂纶。千秋一个刘文叔，记得微时有故人。

诗虽写得好，总不免带些苦味。

## 世变沧桑拙政园

苏州的园林，甲于中国，而拙政园又甲于苏州。苏州其他名园，历史都不算悠久，差可与之媲美的留园，是盛宣怀父亲盛康的别业，创建不过百余年，而拙政园则有史可稽的已达五百年之久，其盛衰兴废，使人有阅尽沧桑之感。

拙政园在苏州娄门内，在明代为大宏寺，巡按王献臣罢官居吴，侵其基以为园，用潘岳“拙者之为政”句以为名，他的子孙一场豪赌，轻易地一掷输给他人，得主为徐姓。清初钱谦益和陈之遴先后得之。其后为驻防将军府邸，都并没有什么将作变动。

到了吴三桂以平西王开藩云南，为了表示输心清廷，将一个儿子留在京师，一个女儿和女婿住在苏州。女婿叫王永宁，仗着三桂的地位势焰熏天，炙手可热。他把拙政园彻底修建一新。建筑材料和规格，很多“逾制”，楠木厅中的柱础，皆刻升龙。撤藩事起，都遭籍没辇送京师。自此之后，一直作为官署，一度改成八旗会馆。太平天国占领苏州时，



拙政园景甲苏州

据说曾作为李秀成的忠王府。抗日战争时期,汪伪把江苏省会迁到苏州,这里又成为伪省政府所在地。近年始修葺一新,供旅游者玩赏。

谈拙政园故事,并不在那贵戚名豪、高官显宦,而是此园曾为清诗的两位大诗人拥有过,而两位诗人所携的眷属,又都是清诗春季中的主要女诗人,一个是秦淮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名园红粉,相得益彰,为拙政园生色不少。

钱谦益携柳如是僦居此园,为时不久,且谦益资力,也只有在此园之一隅,构曲房数椽以媚河东君,在这里可以置之不论;而陈之遴是以清廷大学士身份,当然远非钱谦益可及。但是可惜的是这位海宁相国,虽拥有这所名园,却从未一日自享林泉之乐,两次政治波澜,落得远戍辽东,第二次便客死戍所,只能化鹤归来。

不过他的妻子徐灿却在拙政园住过一阵子。徐灿,字明深,号湘蘋,杭州人,陈之遴的继室。陈之遴的诗名在清诗的春季中不逮其夫人远甚。在整个清诗诗坛上,徐灿的诗可说是压倒群芳,柳如是虽差堪比肩,但因有钱谦益这位大诗人为她润色,就不能和徐灿相提并论了。

吴伟业歌行中,有一首《咏拙政园山茶花》七古,是吴集中的高唱,堪与他的《圆圆曲》并传。这首诗写的是山茶花,但咏物起兴,实际上是咏陈之遴及其一家的遭遇,其中还包括对自己的影响。读之感慨伤怀,悲凉叹息,不能自己。吴伟业和陈之遴的关系,非常密切,既是政治上的汲引者,又结为儿女姻亲,他的女儿嫁给陈之遴的儿子陈直方。陈之遴在政治狂澜中没顶,吴伟业失去了奥援,女婿随父遭戍,

女儿的终身无依,种种失意汇集于写诗之时,而回顾昔日繁华,犹如一梦之中,感慨何极!

原来陈之遴和陈名夏同以明季的高官降清,仍得留任政地,不久即卷入满汉南北之争。陈名夏是江南溧阳人,状元出身,和之遴时称两陈。这些降臣,很不识相,以南人兼汉人的身份,事事要向满人和北人争地位、争权利,岂不是自讨苦吃。陈名夏竟落得身首异处,陈之遴则戍死辽东。

吴伟业隐居了十年之后,静极思动,趁两陈在政地,扭扭捏捏应召赴京,但一到京师便碰到两陈靠山已倒,奥援无人,原来的希望落空,只得到一个国子监祭酒的冷官闲曹。朝中无人莫做官,过了一年,只好襁被回南。

《咏拙政园山茶花》于历叙拙政园盛况后,说到陈之遴滞留政地,不能平泉独乐,而政治狂飚忽起:

灌花老人向前说,园中昨夜零霜雪。黄沙淅淅动人愁,碧树垂垂为谁发。可怜塞上燕支山,染花不就花枝殷。江城作花颜色好,杜鹃啼血何斑斑。花开连理古来少,并蒂同心不相保。名花珍异惜如珠,满地飘残胡不扫?杨柳丝丝二月天,玉门关外无芳草。纵费东君着意吹,忍经摧折春光老。

这里包括了陈之遴、徐灿、陈直方,他的女儿,再加上他自己。结语云:

看花不语泪沾衣,惆怅花间燕子飞。折取一枝还供佛,征人消息几时归?

写诗时陈之遴和他的女儿都还在世,此为女儿及女孙祈祷,

希望直方能早日回来,不知道这一切以后更成为泡影。

徐灿随同陈之遴的母亲阖家遭戍,陈母得先南还,徐灿有《送方太夫人西还》一律云:

旧游京国久相亲,三载同淹紫塞尘。玉佩忽携春色至,兰灯重映岁华新。多经坎坷增交谊,遂判云龙断夙因。料得鱼轩回首处,沙场犹有未归人。

愁云惨雾中,仍不失和平气象,此所以为清诗春季中女诗人压卷之作。

## 冒襄与董小宛

冒襄(巢民)为明季四公子之一。冒这个姓氏很稀少,在元明之前是没有此姓的。他们本是奇渥温氏,蒙古人;入明之后,便改了冒姓。冒襄的父亲冒起宗,明季做过外吏,归如皋筑水绘园,饶泉石之胜,成为一时名士雅集的胜地。

冒襄、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合称明季四公子,这四人都是名父之子,甲申南渡,又皆聚集在南京,桃叶渡头,秦淮灯火,挟妓饮酒,崇尚气节,《留都防乱公揭》之攻讦阮大铖,四人均与其役。大铖切齿痛恨这批名士,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陈贞慧不幸置之牢狱,冒襄逃而幸免。南都覆亡之后,归隐如皋,坚卧不出,屡被荐“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均不为之动。其他三位也相约不仕清朝。但云亭山人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要把侯朝宗留一条不干净的尾巴,致使小扇坠李香君成为一出悲剧的结局,却令人难以明白。其实侯朝宗在清朝不得已出去应河南乡试,只中了一个副榜,连举人都没有中式,以后也不曾做官,算他是失节的贰臣,

总说不大过去,云亭山人大概也过分了一些吧!何况侯朝宗曾劝过他的好友吴伟业不要出仕,吴伟业在北上再出时有《怀古兼吊侯生》一诗,结联云:“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襟。”吴伟业当时并无异词,何云亭山人之喋喋为!

四公子中学问最广博的是方以智,做了和尚又反初服,拳拳故国至于终身;侯方域的古文,在桐城成为宗派之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虽然科场论命不论文,也不致两中副车,当亦是迫于形势不得不聊以塞责而已。

四公子还有和明季士习相同之点,即是大家都在秦淮有一个红粉知己,《桃花扇》的故事无论矣,陈贞慧也有一个年华老去的李贞丽,是李香君的假母;冒襄的一位便是董小宛。

董小宛,名白,早年著籍秦淮,归冒襄为侧室,早死,冒襄著有《影梅庵忆语》,语意悱恻,为一时所传诵。据《忆语》所说,董小宛是在盛年夭亡了。但何以犹有与开国皇帝一段虚构的情史?此乃《忆语》中文字有些隐隐约约,模棱两可,使后人猜测董小宛未必真的夭死,冒襄以死者相忆,实迫于无可奈何而故弄玄虚。此说倒也有几分道理。

首先是甲申、乙酉之际,清兵南下,南明小朝廷划江而守,史可法以使相之任督师扬州,部下四个骑兵悍将的总兵分据淮扬一带为防地,苛征暴敛,奸淫掳掠,无所不至。如皋是扬州的属县,正处在漩涡之中,这位水绘园主人和他的眷属的艰苦生活就可想而知。

冒襄的好友吴伟业在集中有《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七绝八首,其七、八两首云:



《多铎入京图》

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仓皇过渡头。钿合金钗浑抛却，高家兵马在扬州。

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

这两诗问题都出在第四句。“高家兵马”指高杰的队伍，这个跟李自成起兵的无赖，为了争扬州的地盘和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等三总兵大动干戈，闹得史可法束手无策，不可开交，老百姓为躲避其凶焰，逃过奸淫掳掠的灾难，颠沛流离的痛苦，是可以想像的。董小宛是否能逃过这次浩劫，想来是颇难幸免的。

即使能侥幸免罹于难，到了翌年乙酉，“荒唐王爷”豫亲王多铎率大批清兵南下，他的军纪是可想而知的，而“子女玉帛”又是清军惯常的战利品，多铎与江南名孀刘三秀的故事，也决不止一桩。

这里不是把顺治和多铎两叔侄掉一个位置，而是说多铎的部将跟他们主帅同样荒唐的也实在不少，这便是吴诗第八首第四句的由来。既然说到“墓门”何必再提“侯门”？冒起宗和冒襄虽然做过中下级官吏，但还不能称为“侯门”，故侯门可能是指新朝的贝子、贝勒或牛录之类的亲贵邸第。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因为当时和冒巢民有深交的文士，如陈维崧、吴绮集中均有诗文载明小宛墓地所在，都说葬影梅庵之侧。兹更录清代诗人韩奕挽冒襄诗一首，以证明小宛未曾夭亡说的无稽：

载得佳人字莫愁，染香亭子木兰舟。茧丝待久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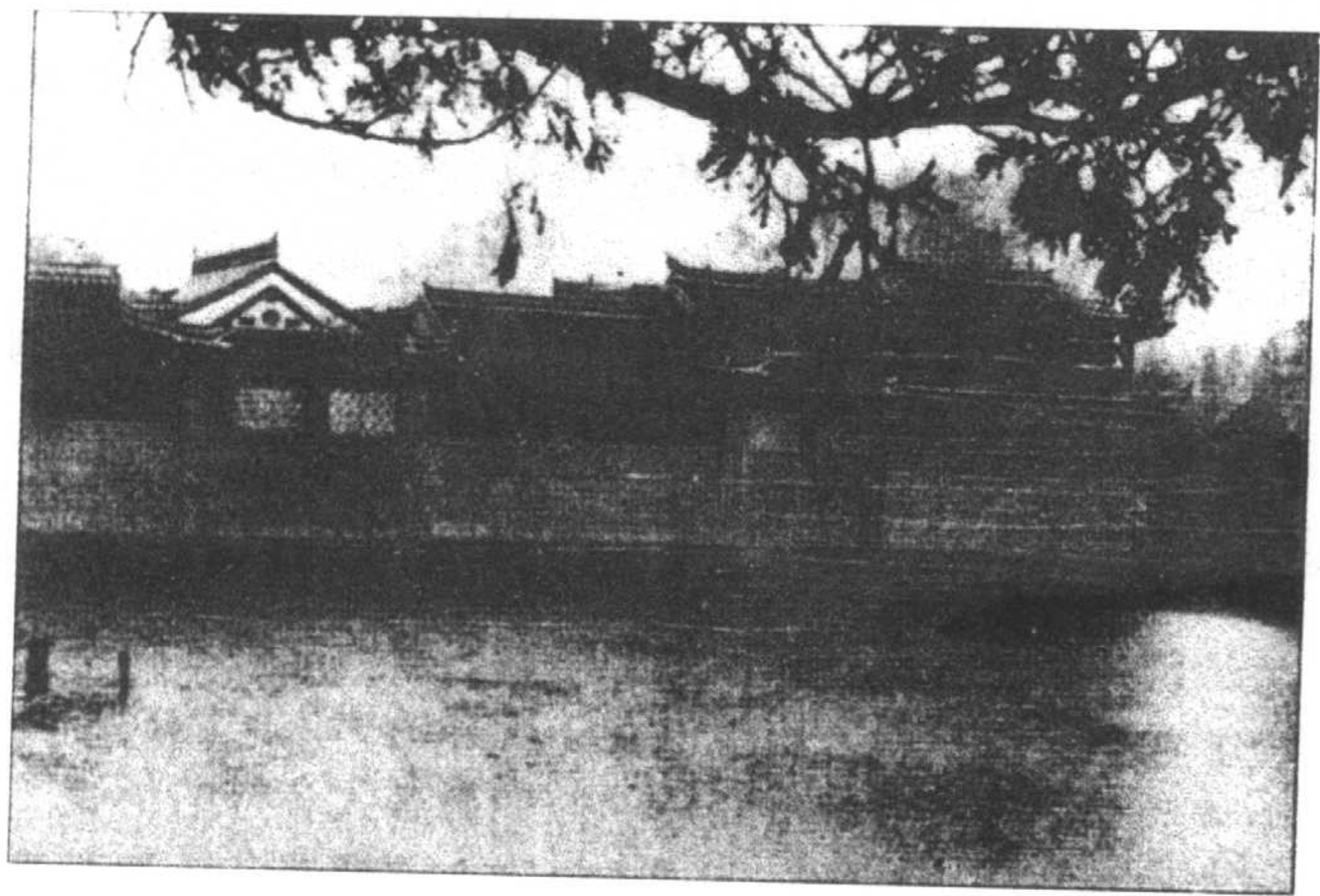
近匹，纨扇无缘得聚头。花鸟湘中馀粉墨，人琴座上亦山丘。白杨未种俱消歇，何处春风燕子楼。

## 陈维崧与水绘园

明清功令不同于宋代，严官吏士夫狎妓之风，所以京师之大，只有下等娼寮，没有供官吏士大夫游乐的高级妓院；但是掩耳盗铃，狎男妓却并不禁止，所以那时的诗词和小说都有长篇累牍关于男妓的故事。所谓男妓，并不是现在西方出现供女子玩弄的男人，因为那时中国的女子还没有那么开放。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称号，如“相公”、“像姑”、“小旦”、“变童”，甚至最难听的“兔子”，都是供官吏士大夫玩弄的男妓，狎男妓并不有玷官箴。

狎男妓之风可以一直上溯到明代。那时秦淮河房都是女间，而南京天高皇帝远，管不了许多，只不过官吏还是不敢涉足其间。冒襄的水绘园中，自然也有不少这种人物，其中色艺双绝的一个名叫云郎，而为他颠倒发魔的人则是冒襄的世侄陈维崧。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江南宜兴人，是冒襄患难之交明季四公子之一陈贞慧的儿子，此人多才多艺，是清



江苏如皋的水绘园曾是名士雅集的胜地

诗春季的重要诗人，吴伟业誉之为“江左凤凰”。于诗之外，他更擅骈体文及词，两者数多质精，时人莫与伦比。晚年膺荐应博学鸿词大科，以诸生授翰林院检讨，与朱彝尊齐名，并合刻词集《朱陈村词》。

陈维崧以世侄的身份，长时期作客水绘园，因为他的才华与文名，主人对他礼遇周到，冒襄的太夫人亦以诸孙视之，因此与冒氏所蓄的歌童云郎也时常有机会见面。维崧对他缱绻备至，冒氏也不以为忤；还遣云郎奉侍维崧砚席，使得这位短身修髯的诗人，不知为云郎写了多少发魔的诗词，也不知为云郎题过多少幅画。当时客水绘园的有名画师都为云郎作画，例如《云郎捧砚图》、《云郎出浴图》，都由陈维崧为之题咏，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在当时传为“佳话”。

据说有一次冒太夫人要试一试维崧的诗才，忽然撤回

云郎的奉侍砚席，维崧简直神魂无主，寝食不安，要求放回云郎，冒太夫人有条件地同意他的请求，须于顷刻之间赋《梅花诗》一百韵长诗。维崧欣然援笔立就，重圆他与云郎的好梦。后来云郎年长要结婚，陈维崧为之赋长调相赠，在当时是有名的词句，然而毕竟太肉麻了，故不抄录于此。倒是有一首《别紫云》的七绝，也是赠云郎的，写得回肠荡气，饶有唐音：

二度牵衣送我行，《并州》才唱泪纵横。生憎一片江南月，不是离筵不肯明。

陈维崧文名，骈骊文和词在诗之上，只有沈德潜以为“陈检讨四六及词，宇内称许，而诗品古今体皆极擅场，尤在四六与词之上”。这是于骊黄之外的诗评家对陈维崧的权威评论，应该确具真赏。这里再录陈维崧两首好诗：

周侯池畔树苍苍，遗碣岩峣屹此乡。哀诔南朝颜特进，碑铭东汉蔡中郎。千秋定论归青史，一夜悲风起白杨。此日踌躇肠欲断，漳南高冢亦昏黄。

《捧读石斋黄公所撰

先少保神道碑赋此追感》

当时彩毫撼江关，数子声名天地间。讵料文章遭贝锦，偏教冰雪炼朱颜。廿年苦语三更尽，万里流人二月还。不信蛾眉真见赎，感恩我亦泪潺湲。

《喜汉槎入关和健庵先生原韵》

## 莱阳两姜

清诗的春季诗人中,有很多崇尚气节、矢志恢复的人,他们铁骨铮铮,宁死不屈,是中华民族的菁英,百世之下,读其遗诗,犹觉虎虎有生气。如黄道周、杨廷麟、瞿式耜、陈子龙,他们捐躯殉国,当然不应该称之为清代诗人。还有些草间偷活,蹈首阳之高节,比殷之顽民,虽然在春季诗人中不能称为第一流,但诗以人传,不可不予以一席之地。

莱阳(属山东)两姜,便是其中两位代表人物。长名埰,字如农;弟名垓,字如须,时称两姜先生。莱阳是明季遭清兵侵略最惨重的地方,奸淫掳掠,子女玉帛,三番四次遭其酷毒,两姜有不少亲戚友好,罹其锋镝,如诗人宋琬一族,几乎阖族遭难。两姜幸而未逢其会,先后在崇祯朝成进士,做了京官。

姜垓在朝列见到国子监《进士题名碑》,以天启朝遭魏忠贤逼害致死的忠烈魏大中姓名与阉党崔呈秀、阮大铖同列,奏请挖去崔、阮两人姓名,大得盛名。这事在今天看来,

颇值得争议:《进士题名碑》是一种文献,不论崔、阮如何坏,进士总还是进士,不能因是阉党而涂改文献,致后人无可稽考。在清末也还有这种举动,如康有为是光绪朝进士,却在《进士题名碑》上查不到他的姓名,原来也和崔、阮一样,因为康、梁大逆而挖去了。当时风气如此,实无可如何。

姜采则是以给事中弹劾陈启新,直声震天下,但不久又因言事得罪了刚愎自用的崇祯帝,这个皇帝真有喜怒莫测的“天威”,必欲置姜采于死地,经群臣百方营救,方改为廷杖谪戍宣州。“廷杖”是明代摧残臣民士气的最大弊政,堂堂大臣,一逢人主之怒,便可褪去衣裤在殿廷受杖,不但血肉横飞,而且还有杖下致死的。清朝倒没有继承前代这种酷刑,而代之以“传旨申斥”,那当然要比廷杖好受多了。不过申斥的是太监,倘使受申斥者没有贿赂打点,则可以使长跪多时,什么下流肮脏的话都骂得出来,若是得到好处,则“混帐王八蛋”一声,便命“起去”。饶是这样,有些气节的士大夫还是吃不消的。

姜采的廷杖,更博得天下读书人的爱戴,所到之处,都受人欢迎赋诗赠送,吴伟业《东莱行》云:

君家兄弟俱承恩,感时流涕长安门。侍中叩阁数强谏,上书对仗弹平津。天颜不恚要人怨,卫尉捉头摔下殿。中旨传呼赤棒来,血裹朝衫路人看。

便是描写姜采进谏忤旨和受廷杖情况的,吴伟业和两姜交谊之笃,亦于此可见;但大节出处,姜采并不和吴伟业等一样,他的《敬亭集》中有《广陵遇嘉禾友感赋》一律云:

朝罢西华并马还，龚曹昔日此鹓班。人留天宝风尘后，客在雷塘雨雪间。连岁丧亡哀白马，几年离别惨朱颜。娄东学士三词伯，身世伤心庾子山。

嘉禾友人即是诗中的曹溶，龚则指龚鼎孳，娄东学士指吴伟业，三个诗人在那时已投降清朝，虽好友而旨趣异途，但诗中以庾信方之，有惋惜而无讥斥，堪称温柔敦厚之作。

姜埰于国变后始刻意为诗，风格一本杜甫，他自说“学诗只学杜工部”，这当然和天宝乱离有关。他于甲申明亡后本来可以不赴宣州戍所，但是他还是赴戍，竟在宣州活了三十年之久，在宣时自号敬亭山人、宣州老兵，“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敬亭山是宣州的胜境，老兵则负戈宣州，应自称戍卒。他为什么一定要赴戍宣州，因为谪戍宣州是明代皇帝的命令，他必须服从诏旨，不管这个皇帝早已缢死煤山，他还是拳拳故国故君之思，表示对清朝的赦令决不遵从，像这样贞节强毅的人，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所以他死后，友人弟子私谥为“贞毅先生”。

像姜埰的这种节操，使人想起 20 世纪初还有相类的一位清诗的冬季诗人，此人便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改革家和提倡简体字的王照。王照，字小航，直隶人，进士出身，在礼部当主事，适逢戊戌变法，他也赞成，要上书言事。按当时制度，六部主事没有上书的资格，必须通过部堂官代奏。礼部尚书是守旧的后党怀塔布，自然决不代奏，他居然直达光绪手中。光绪那时刚要大振乾纲，正好借此开刀，因王照的奏劾，一下子便罢免了礼部的六位堂官。这一举动是戊戌变法新党、旧党即帝党、后党交锋最激烈的一幕，王照因此出

了大名；在变法流产之后，却也得了个长期监禁的处分。

监禁了二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像王照这样身份，不但被释放出来，而且联军还要请他出来做事。他断然予以拒绝，隐居不出。辛丑和约告成，刑部首先交还清廷行使职权，他便自动跑到刑部狱中，要求仍行监禁。刑部司狱官员告诉他可以不必再行入狱，王照却说：“我是奉朝廷明旨监禁的，释放我的是联军统帅瓦德西，他没有释放我的权力，我也不接受他的恩惠。”这样，竟然又在狱中蹲了好几年，直到辛亥革命，才正式释放出狱。

王照和姜埰，可说是无独有偶的两个铁铮铮汉子。

## 虞山两冯

江南是中国最富庶的区域，苏、松两郡，财赋半天下，随着经济的发达，必然促使人才辈出，文化繁盛。常熟是苏州的一县，明、清以来，一直是人文荟萃之区。尤其是明清之际，钱谦益以文坛盟主地位，久居乡里，诗酒文会，更增加常熟在江南的地位。

明代的文士在京城做官的，时常要受到最高统治者和太监的逼害，虽负伉直敢言之名，所受的苦难屈辱也很多，如廷杖、厂狱即是一例。但居乡则不然，天高皇帝远，管不了许多，地方官吏以不开罪文士的缙绅士子为保位的第一要义，所以士习嚣张，和清代大不相同。文士中洁身尚义的固然不少，但鱼龙混杂、行为不检的也在在有之。那时居天下财赋之半的田赋，实际上大部分是转嫁农民身上，士绅仗势逃避徭役岁赋，逍遥自在。此风直到康熙初“奏销案”起，才使他们迫于形势，乖乖就范。当时有“探花不值半分钱”之谣，强制士习由嚣张趋于安分。终清之世，再没有发生如

明季那般的情形。

清诗的春季诗人中,有两位冯姓的弟兄,虽然不曾掇巍科,做大官,却是在常熟响当当的两名秀才,冯舒(1593—1649)字己苍,冯班(1602—1671)字定远,弟兄都以文学知名海隅,甲申之岁,两人均已入中年,仍以明季士子的故习在异族统治下讨生活。不知道鼎革的官吏,只须阿附满大人,并不要讨好缙绅士子,灭门县令的威风,重现于清初的江南。文坛怪杰金圣叹被杀于吴县令任维初,比他要早十多年的冯舒则被杀于常熟县令瞿四达,这是他俩恃才傲物得罪了县令所招致的。

冯舒之死,其实也是清代最早的文字狱,其起因是瞿四达宰常熟时苛征暴敛,贪赃枉法,常熟士绅合词呈控,瞿四达认为冯舒是幕后指使的人,一切呈控文字均出其手,便借口冯舒所作诗文悖逆,置之狱中,予以杖毙。这个事件并没有像后来“哭庙案”那么兴大狱株连多人,冯舒又不曾像金圣叹那样明正典刑,所以知者不多,实则两人的冤狱是极相类似的。

满人入关之初,汉族士人欺他们不谙文义,所以撰写诗文,初不知忌讳。冯氏兄弟既以诗名,又慷慨自负,肠直口快,遇事敢为,不知顾忌为何物,只要看冯舒著作的集名,如《浮海集》、《避人集》、《幽违集》之类,便可想像其内容,瞿四达用那些集中的诗文来杀他,并非难事。如《丙戌岁朝二首》,即顺治三年(1646)的即事云:

—

投老馀生又到春,萧萧短发尚为人。世情已觉趋

时便，天道难言与善亲。梦里山川存故国，劫餘门巷失比邻。野人忆着前年事，洒泪临风问大钧。

二

喔喔荒鸡到枕边，魂清无梦未安眠。起看历本惊新号，忽睹衣冠换昨年。华岳空闻山鬼信，缙群谁上蹇人天。年来天意浑难会，剩有残生只惘然。

又如《雪夜归林中即事》七古长篇结尾云：

……忆昨前年七月半，杀人不异屠牺牲。只今白骨竟何在，无乃冰雪相支撑。血流遍地未可洗，白雪得无今亦赭。吾闻北人耐寒冷，旃裘惯与冰霜争。天公意或骄此虏，故借深雪添狰狞。吁嗟此意良未晓，管窥自笑真硜硜。眼前有饭且饱吃，来朝看取赤日东方生。

虞山两冯

137

冯班比哥哥年纪要小十岁，他在清代生活了很长时期，比较老寿，学问及诗的成就也更成熟，他崇拜中、晚唐诗，反对宋诗。钱谦益称他“沉酣六代，出入温、李、小杜，以《玉台新咏》教人。今观其诗字字锤炼，无一浅率语，置之中、晚人集中，几无可辨，功候深纯，一时无两，盖矫七子、钟、谭之穷，而不堕宋人之直率者也。”

最倾倒于冯班的是清诗春季诗人赵执信，这位自高位置、目无馀子，连当时鼎鼎大名的诗坛盟主王士禛都要讥评的赵秋谷，却平生低首于冯班，拳拳服膺，冯班在清诗春季中之地位可想而知了。兹录其怀钱谦益《过拂水山庄》一绝：

三径荒凉草色迷，一声邻笛日平西。人间多少伤

心处,纵是庄周也不齐。

又《兵后经郡齐门故人废园有感》七律云:

雀乱鸦啼燕不回,曲池兵后劫成灰。云离巫峡知无定,地失桃源莫再来。蔓草江淹何限恨,青枫宋玉有馀哀。故人泉下如相念,白首全生赖不材。

两冯是诗人、诗论家,又是诗评家,弟兄两人和其他清诗春夏季诗人汇合评论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是清代诗评家示范之作,不独对唐、宋诗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评语趣味横生,是绝妙的评解文章。

## 谈狐说鬼的诗人

蒲松龄的诗名早已被他的杰作《聊斋志异》压得无影无踪了，人们只晓得他和曹雪芹两人是清代著名的小说家，殊不知他俩分别是清诗的春、夏两季知名的诗人。曹雪芹可惜不曾给后人留下诗集，他的诗词作品是借黛玉、宝钗、宝玉、香菱等人之口以传世；蒲松龄则不然，他于《聊斋志异》之外，还有一大部《聊斋诗集》可供人欣赏。

要谈蒲松龄的诗，先得谈他和当时诗坛盟主王士禛的关系。两人生同时代乡里，王士禛比他长七岁，是济南新城人，蒲松龄是临淄，相去不远。他们的结识恐怕是始于蒲松龄于康熙十一年（1672）起到同邑毕际有家，长期做西席夫子之时，王士禛是毕氏的亲戚，在他访问毕氏时见到这位老夫子，并读到了《聊斋志异》。那时王士禛已是卿贰大员，架子很大。蒲松龄年轻又只是个生员，但是惊才绝艳的《聊斋志异》不能不使渔洋山人钦佩不已，折节下交还与之诗文酬酢。可见得王士禛也是个爱才若渴而不是专门摆架子的人。



蒲松龄

其时《志异》已大体成书,但尚未杀青,王士禛离开毕氏时,还嘱蒲松龄每写成一篇便要送他先睹为快,除了为之顶批、旁批、总批之外,间还为之改正文字,并写信提出修改意见,足见一代诗宗对蒲松龄之倾倒。多年来有一种传说,说王士禛愿以三千金易蒲松龄《志异》全稿,这恐怕不足为信。在当时有了那么高地位的王士禛,是决不肯以小说家自居来降低身份的,何况他的诗自足千秋呢!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关于科场的创作,有人说他是反对科举制度,其实那时的士人,惟一出路便是中举中进士,蒲松龄对科举何尝不热衷,只是运气不好,屡试不第,使他满腹牢骚,所以假手鬼狐来发泄他满腔的怨恨;要是他中高科掇巍第,中国小说史上必然会少了这些好文章。而且应乡试、会试是可以自己去的,只要你具备一定的资格便可,但博学鸿词这种特科,却须由京内外大吏荐举。康熙十八年的鸿博大科,山东省宿儒名士被荐举的只有十四人,蒲松龄未必名预其列,有些蒲氏生平研究者说他荐而未取,恐怕未确。原因是康熙十七年诏令中外臣工荐举鸿博时,蒲松龄写了一篇《拟上征天下博学鸿词亲考拣用以备顾问群臣谢表》,一篇还不够,同年又恭拟了同题的第二篇,正当李因笃、严绳孙、傅山等人拼死拼活要摆脱这种牢笼时,蒲松龄却代群臣草拟谢表,这和他反抗清廷、反对科举是何等显明的矛盾!

他以一个不第的秀才,蛰居僻乡,却要关注朝廷大事,《聊斋文集》卷十一几乎全是“拟表”,这些表皇帝当然不会看到,蒲松龄只是聊以自娱而已,然则他的思想究竟属于

聊齋志異一季

考城隍

予姊丈之祖宋公諱憲邑廩生一日病卧見吏人持牒牽白頭馬來云將赴  
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教促之分病束馬往去路甚生蹙至  
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堂堂壯麗上坐十餘官却不知何人惟閉牀綰  
可織簾下設几數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儿上各有筆札俄聞  
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心無心二公文成星殿上公文中云有心為善  
雖善不當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  
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曰屏庸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

《志异》呢？还是属于《文集》中的拟表？是大可耐人思索的事。

这些拟表，不必征引内容，只要举几个题目就足够人们知道蒲松龄之为人了：《拟上谕儒臣纂修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实录〉告成群臣进表》、《拟上允辅臣请选日开馆编辑〈睿算平定三逆方略〉群臣谢表》、《拟上特简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台湾荡平群臣贺表》。被顾炎武斥为“虏主”的爱新觉罗，蒲松龄反要为他们修《实录》；连钱谦益也还暗中与之往来的明朝一点点火星，他还要歌颂特简一个叛徒去荡平，哪里有丝毫反清思想可言。当然，这里并没有谴责之意，只是实事求是还他本来面目而已。

蒲松龄不但创作的小说可以千载不朽，他的诗也是在清诗春季的百花园中占一席之地，尤其与他相处很久的孙蕙，也是清诗春季中的有名诗人，更有唱和之乐。

王士禛有题《志异》七绝一首，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蒲松龄的和作却不大为人所知，兹录如下，以结此篇：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苏轼谪官黄州时，强人说鬼；蒲松龄则备烟草茗酒请路人谈狐说鬼，充实他著述的资料。宋、清两位诗人，总都是假鬼狐来发泄一肚子牢骚为人间鸣不平吧。

## 清诗异葩金圣叹

清诗的春季百花园中，百花齐放，斗艳争妍，其中有天香国色的牡丹，有浓李夭桃，也不乏野草闲花。更有奇卉异葩，挺生其间，把春天点缀得热闹异常，像盐筴诗人吴嘉纪，谈狐说鬼的蒲松龄，他们于诗虽非正宗，但也不能说是野狐禅。在顺治末季，江南还有一位突出的人物，便是金圣叹。

此人以小说评论家的盛誉，淹没了他的诗名，其实他于诗，尤其是杜诗，工力甚深。

传说金圣叹本姓张，名采，苏州人，诸生。后来复姓金，名人瑞，字圣叹。这个字便很狂妄，连孔子都要对他兴叹，自视之高可知。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业绩，是小说批评，他继李贽（卓吾）而起，声名超卓吾老子而过之。他大胆之处便是敢把中国的正宗文学与一般人所不屑一顾的小说拌和在一起，等量齐观。《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居然与《水浒》、《西厢记》并列为才子书，但现在人们仍在传诵的是他批注的《水浒》，能看到《庄》、《骚》、《史》、《杜》的人，却似

乎不多。又因《水浒》经他评论后影响更大,过去坊本中也有托名金圣叹批评的《三国演义》。

金圣叹既然评批了六部才子书,他当然成了评批家的多面手,他既为小说评批家,又是诗论家和文论家及史评家,堪称为中国文学评论史上一个全才,但是一个人总有一个基本观点,无法因所评对象不同而改变其基本观念。从诗家看来,金圣叹是用评小说的眼光来评诗;从小说家看来,却又认为他是用评诗的尺度来评论小说。他分解杜的律诗,即用文家起承转合之法,以两句为一联,四句为一截,则不免奇僻牵强、穿凿附会之弊,于一气呵成的诗,硬生生予以肢解腰斩。有人说,金圣叹后来之被诛,是腰斩评诗之自食其报云。金圣叹之被诛,是斩首而不是腰斩,他的罪名自还不到腰斩的地步,所以他的评诗和被刑应该没有什么因果报应的关系存在。

金圣叹之被刑,由于顺治十八年五月“哭庙”一案,明季士习嚣张,往往视地方官吏如无物,时吴县令任维初苛敛钱赋,为百姓所痛愤,久欲驱之而甘心。是年清世祖驾崩,哀诏至苏,江南巡抚朱国治在文庙设幕哭临,众吏聚集,诸生倪用宾等十八人借此机会进揭帖逐任,继至者千余人,朱国治偏袒任维新,遂以苏郡诸生聚众滋事,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入告,清廷遣满大臣逮肇事者至宁严讯,不分首从,一律处决,这是继顺治十六年的丁巳科场案后又一残害文士的文字狱。从丁巳开始,清朝已杀滑了手,以后的文字狱范围株连还要更加广泛深入。

金圣叹其实并未参与其事,据说有个看相人说他日内

必得奇祸,要他事事小心,所以他深居简出,并未参与倪用宾一伙,只因他平时得罪官府的事太多,便也把他列名其间,真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竟然坐了大辟的罪名。相传他在狱中寄家中书曰:“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又有临刑寄妻子书:“字付大儿看,腌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人家以为金圣叹死犹滑稽侮人,然而写这种书信可能想避免连累妻儿,实在是可怜之至的。

上述两封书信,只是一些传说,圣叹所遗的《沉吟楼诗》有临难时作三首,那是真实可靠的:

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

《绝命词》

与汝为亲妙在疏,如形随影只于书。今朝疏到无疏地,无著天亲果宴如。

《与儿子》

东西南北海天疏,万里来寻圣叹书。圣叹只留书种在,累君青眼看何如。

《临别又口号遍谢弥天大人知我者》

金圣叹和蒲松龄一样,虽生在明朝,却并没有反抗清朝统治的思想和行动,哭庙案的牵连,是池鱼之灾。相反他对清朝最高统治者感激涕零,颇有肝脑涂地、图报无门之慨。《沉吟楼诗》有顺治十七年所作的七律八首,只要看到诗题便知道内容了。题云:《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

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具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其第一首中两联云:

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

合殿近臣闻最切,九天温语朗如神。

可惜的是头固然白叩,皇帝也决不会看到这些诗,但是过不了一个月,顺治皇帝鼎湖龙去,他却在无意中做了攀髯之臣,这恐怕比上面所述的腰斩要近乎诗谶吧!

## 岭南义士屈大均

广东在“天下十八省”时代，便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在经济、风俗、文化等等上面，它是最开放的，同时也是最封闭落后的。它既是文化的沙漠，而近代最知名的改革家和革命家却又多是广东人士。黄遵宪、梁启超之于诗文，开现代诗文革命之先河，但同时广东仍有死守古诗古文程法不变的人。

广州诗人也自成一个系统，总是活动在本省一隅，很少与外间有所往还，只有清诗春季诗人屈大均是个例外。屈大均是“岭南三大家”之一，其他二人为梁佩兰和陈恭尹。屈与陈两人都是抗清不仕的遗民，而梁则不然，把三人捆在一起，据说是避免清吏的罗织，但清统治者还是对屈大均恨得牙痒痒，逼得他变服为僧，避地四方。他原名绍隆，字翁山，释名今种。但不久又返初服，而且娶了一个外省的妻子，是一起缠绵悲欢的婚姻。

屈大均反清复明是非常坚决彻底的，从永历覆灭时起，



屈大均

联络郑成功、吴三桂反清，又监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军，及至返戈无术，乃坚持高节以至于死，可称为岭南第一的节义之士，不独以诗鸣。

屈大均削发于杭州，入雷峰为僧，假僧服游说联络各种反清力量。失败后西游秦陇，遇合顾炎武、朱彝尊等人。

岭南诗人诗名不逾庾岭，大均的作品却早已布满东南。朱彝尊是最早赏识大均诗的人，大均有《屡得朋友书札感赋》诗云：

名因锡鬯(朱彝尊)起词场，未出梅关名已香。遂使三闾长有后，美人芳草满番禺。

其自注云：“予得名自朱锡鬯始，未出岭时，锡鬯已将予诗编传吴下矣。”一到西北，顾炎武得之如逢故人，即赠以七律云：

弱冠诗名动九州，纫兰餐菊旧风流。何期绝塞千山外，幸有清樽十日留。独漉泥深苍华没，五羊天远白云秋。谁怜函谷东来后，班马萧萧一敝裘。

顾炎武对人少许可，似这样推许大均，在别人是少有的。诗中还提到陈恭尹(陈著有《独漉堂集》)，都是志同道合、声气相求的朋友。顾炎武是严正不阿、不苟言笑的人，他的诗文都是非常严肃的文字，但却有一首诙谐打趣的小诗：

六代词人竟若何？风流似比建安多。汤休旧日空门侣，情至能为《白纻歌》。

这便是戏赠屈大均的。汤休是刘宋时诗僧惠休，本姓汤，出

家又还俗，诗名侣鲍参军。大均是西北之行时返初服的，不但和尚弃了袈裟，而且还缔结了美姻良缘，携眷返粤，享了一些时的家庭唱随之乐。这桩婚事也和这位大诗人的诗才有关，据王士禛《池北偶谈》云：“南海屈介子游秦陇，与秦中名士王无异弘撰、李天生因笃辈为友，作《华岳》诗百韵。固原守将某见而慕其才，以甥妻之。翁山爱玩少室，赋诗云：‘同栖红翠三花树，对写丹青五岳图。’自固原携妻至代州上谷，再游京师归粤。”但据大均自撰《继室王孺人行略》，王士禛所述情事稍有疏误。女名华姜，榆林人，明都督王壮猷抗清殉节，孤女由侯姓抚养成人。侯夫人有弟任代州参将，友李因笃，由李作伐缔姻。这段美好姻缘可惜不能白头偕老，华姜不久即下世，大均不免泪洒相思地。据屈向邦《粤东诗话》：“华姜育于诸姑侯氏家，长而端丽幽娴，文事武功，皆所素习，闻天生言，曰：‘是隐君子也，无愧吾先将军矣（指华姜父王壮猷）。’遂嫔焉。”这样文武双全而又家世节烈的佳人，可惜的是年寿不永，且其著述不传，否则或未让柳如是、徐灿专美一时。

人均西北之行，雄心甚壮，蓄志颇坚，为了山陕之间僻处一隅，多奇行之士，而清廷防闲较疏，不如东南海滨之严密，所以有志遗民，多匿处以图恢复。大均入陕联络，与顾炎武、李因笃、朱彝尊、傅山等先后聚集太原，定计分进，为俟时恢复之图。可惜大局已定，无可奈何，事虽无成，志却可哀。大均有《送宁人先生诗》云：

雁门北接长山路，尔去登临胜概多。天外三关横朔漠，云中入水会浑河。飘零且觅藏书洞，慷慨休听出

塞歌。我欲巾箱图五岳，相从先向曲阳过。

顾炎武报以五律诗云：

一雁孤飞日，关河万里秋。云横秦塞白，水入代都流。烽火传西极，琴樽聚北州。登高欣有赋，今见屈千秋。

两人之同仇敌忾，一气相求，在清诗春季形形色色的众多诗人中，百代之后，犹令人生景仰之心，这岂是掇章摘句、呕心沥血仅从事辞藻如江左三大家者所能比拟！

## 《南山》诗狱

中国的文网史、或称笔祸史上，文士罹难最多、株连最广的，康熙年间的《南山集》一案，也可算其中之一。

戴名世(1653—1721)，字田有，号南山，又号忧庵，安徽桐城人。清代主要的古文作家桐城派，即开始诞生于此时此地，但是人们只知道桐城派的主要人物是方苞、刘大槐、姚鼐三位桐城人，却很少有人知道戴名世和桐城派的关系。原因是《南山集》文字狱发生后，一切戴氏的诗文均遭禁锢，沉沦百年，才得重见天日，但已残缺不全，尤其是诗，难窥其全貌。其实戴名世不但文为清代大家，于诗也是清诗春季的重要诗人。

戴名世之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与清初一些遗民以文字取祸有很大的不同。他出生于顺治十年，在清廷看来，他已是清朝食毛践土之臣民了。虽然他在少时应科举不得意，颇负狂名，但并未挫折他进取之心。到了五十三岁，方中了举人，五十七岁又中了进士，会试是第一名会元，殿试

南山集卷一

桐城戴褐夫著

論說

老子論上

自孔子沒而出而惑世誣民者有兩家曰老曰佛  
爲後世儒家之所訾誚顧其言誠怪誕聖人之所  
弗取而學者之於聖人之道未知果能窺見萬一  
否但能訾誚兩家卽號曰儒儒若是易耶余嘗讀  
老子之書反覆紬繹其言頗有可採而非佛氏之  
所及者佛之盛也乘中國氣虛而人其言荒唐不

一甲二名榜眼，榜下授职翰林院编修。虽然年已望六，也算是文人得意了。像这样遭遇的人，按情理是不会对当时统治者有什么不满的。他在《南山集》中所谓悖逆诗文，恐怕是他发迹前的作品，没有经过删削，全都编入《南山集》中去而刊印，这是取祸的原因。

戴名世《南山集》中最被视为狂悖的诗是《古史诗鍼》的一组咏史组诗，他在《自序》中说：“史者，有所为而作也，传愚民之统而怪诞兴，趋当时之势而阿谀作，守一家之囿而是非倒，寄隐衷之怨而曲直蒙。必也破统、离势、毁囿、销怨，而后史朕乃萌。”《自序》最后记着“时永历某年也”这样的纪年。身在康熙皇帝统治之下而写上远在西南偏促一隅的永历年号，光这一点已是以身陷大戮的。

《古史诗鍼》这组诗多至一百一十首，据光绪中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说：“康熙中罹祸时，其家以遗文置竹筒中，悬之梁上，二百年无人知者，庚申之乱，族裔得之，始传播。题‘桐城宋潜虚著’，实托名也。”《古史诗鍼》大概也是子遗仅存的作品。兹选录有关明清之际史事的七绝四首：

松山战败尚为雄，十六坛前一祭空。比节文山羞汉史，忠勤为虏负初衷。

《承畴降虏》

应是天祥一化身，维扬大节泣人神。降书七斥山河壮，懾服胡王羞汉臣。

《维扬大节》

天下兴亡一匹夫，四方奔走抗强胡。填平东海深沉愿，化作芬芳万卷书。

《天下已任》

大木独撑天一方，朱明岁月赖延长。郑家气节汉家宝，岛国孤忠耿未忘。

《郑氏抗节》

这些诗明显地指斥胡虏，表彰忠烈，清廷对此当然非兴大狱不可。

戴名世诗名被文名所掩，实则他不但长于诗，且有卓绝的诗论散见在他文字中，如《吴他山诗序》云：“余游四方，往往闻农夫细民倡情冶诗之所歌谣，虽其辞为方言鄙语，而亦时有义意之存，其体不出比、兴、赋三者，乃知诗者出于心之自然者也。世之士自号为能诗，而何其有义意者之少也。……反不若农夫细民倡情冶思之出于自然而犹有可观者矣。”能够推崇民歌谣谚而加于士大夫作品之上，这种思想和见识远远非当时一般诗人的见解所能企及。

戴名世的《南山集》文字狱，株连甚广，是康熙中安徽地区文士一大劫，尤其是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起因是方苞曾为《南山集》作序，观览现存方苞的序文，倒并没有什么触犯时忌的文字，只是参劾举发《南山集》的是赵申乔，此人是康熙朝著名的酷吏，外负清廉刚直之名，实则周纳罗织的本领是非常可怕的，经过他的锻炼，就成就了许多莫须有的罪状。方苞的族中从叔祖方孝标，在西南曾投降吴三桂，著了一部《滇黔纪闻》的书，是为伪周政权张目对清朝不利的著述，方孝标虽已死，仍被开棺戮尸，子孙均问斩。方苞不过是方孝标的族孙，有此一段关系，再加上为《南山集》作序而未曾举发，也一起问斩，只是从宽免治而

隶入旗籍。所谓入旗，原不一定是坏事，入关之初，汉大臣之降清者，往往亦命隶入旗籍，惟以罪人而入旗，则在有清一代，似只有方苞是由特旨而见于明诏的，那便不是像清初冯铨以大学士隶旗籍，而是入旗为奴的罪罚，其地位便与作为旗主的满人有主奴的关系了。清代八旗的奴隶并不妨碍仕进，但官做得再大也得对家主执奴隶之礼，而且还要供给一切需索，乾、嘉时蒙古旗人松筠官至大学士，碰到家主家有喜庆，还得回家替家主执役，不因官高而有变更，方苞是罪人入旗，当然是更为难受。幸而雍正即位后，即命他及族人一齐出旗，总算免此苛虐。雍正虽号称严刻，但在法律上亦不无宽大的善政，如废止惨无人道的腰斩、解放浙西的九姓堕民和命方苞及其族人出旗，都不失为贤明之举。

桐城派古文的三巨头中，刘大櫆和姚鼐都是知名的夏季诗人，只有方苞是出名不会做诗的，据说他本来也想学诗，但他写来的诗只以文为诗，毫无诗的气息，查慎行规劝他致力于文，不必在诗上面枉抛心力。方苞也知难而退，从此不再在诗上用功夫。

方苞虽不是清诗的春季诗人，但他的文名太大了，因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机会，附带把这位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提一笔。

## 王士禛的神韵诗说

诗人固穷,但也有例外,王士禛(1633—1711)一生便是运气总好,身名俱泰,官至一品,寿近八十,诗坛奉为盟主,生徒遍于天下。

他的仕途也是出人意外的,虽然中了顺治十五年二甲三十名进士,却没有选入庶常馆,榜下授扬州推官,这叫作“粗官”,和金马玉堂的翰林院编、检,分隔云泥,要升迁到卿贰大员,不知要爬多少年头。推官又称司理或司李,是一郡的司法官,清初尚沿明制,设置此职,但不久便废除,由知府兼理司法。本来那时有一种说法,叫作“冷官热做”、“粗官细做”之类,王士禛在扬州的时候,正是“粗官细做”,把一个“风尘俗吏”做得如玉堂神仙,后来虽官至尚书,其名声倒远不如“王扬州”的响亮,其时年不过二十四五岁。他在赠宋荦(牧仲)的诗中道:“谁识当日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他自己也不会忘记在扬州做粗官时的盛况。

做了粗官,行取入京,也不过部曹,忽然召对称旨,康熙

谕吏部说：“王士禛诗文兼优，以翰林用。”这是有清一代少有的授官，从此便一帆风顺，官至极品。

官至尚书，死后可予谥可不予谥，即所谓“易名之典”，中国从古代起一直是非常重视的，他死后并未得谥，直到乾隆三十年，由于纪昀的进言，特旨予谥“文简”。不是翰林出身的人，按例不得谥“文”字，他却又占了便宜。

还有，他的名字也很费周章，原来的名字叫“士禛”，他的胞兄叫“士禄”，是“示”字排行，恰巧和雍正帝的胤禛同名，雍正一即了位，便得避讳，称为“王士正”，从此凡是雍正朝开始直到乾隆三十九年的书，他便成为“王士正”。乾隆也真欢喜管闲事，认为“士正”与“士禛”相去太远，明诏改为“士禛”。所以他的名字一共有“士禛”、“士正”、“士禛”三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总不该再听从乾隆的诏旨了吧，可是有许多书籍，还是称为“士禛”，令人费解，笔者以为恢复原状，便应该称他为“王士禛”。

此人名高位尊，虽然有爱士之名，却架子很大，所谓“龙门高峻”，要登门拜谒，往往被饷闭门羹。所以要见到这位大人物，并不是易事。但是也有条捷径，便是他非常爱书，京师慈仁寺庙会，书摊林立，每届庙集，渔洋山人必到寺搜访故籍，到那处去找他，必可碰到，这也是书生积习，不是官高便可改变得了的。

王士禛不但是诗坛盟主，而且还是诗论家，他的诗论也是众多清代诗论家中最突出的，叫作“神韵说”。

所谓“神韵说”，王士禛从来没有一篇专章来阐述他的理论学说，也和别人一样，只是散见于他的繁多著作中，时

时提到“神韵”而已。所以“神韵”两个字,正如它的本义一般,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勉强要为其下一条定义,实在是件难事。虽然后人纷纭多端,还是没有有一个正确的定义。

他自己既没有系统的阐述,而“神韵”两字又不是他的首创,远溯六朝,早已有了“神韵”之说,历代绘画,尤多“神韵”的境界,这在诗与画是完全相通的。

中国最早的诗论家司空图的“韵外之致”,钟嵘的“滋味”以及严羽的“入神”,都是“神韵”的先河,而那些说法,也都虚无缥缈,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无迹可寻”,严沧浪虽然用这些字来释明诗的极致,但羚羊挂角、香象渡河,何以便无迹可寻,一般人实在也无法理解和明白地聆听他立论的境界。

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味在酸咸之外”;严羽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便是神韵诗说的基本根源,他对诗歌的要求是不能平铺直叙,要具有含蓄深蕴的美。所谓“诗无达诂”,不能追根到底,跟文章一样讲究起承转合、水落石出,只是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一爪已足。

神韵另一个特点是清新淡远,不要大红大绿,是水墨山水而不是小李将军的金碧楼台。所以他于唐人推崇王维和孟浩然,特撰《唐贤三昧集》来阐述其主张,当然,他还要上溯到清淡宁远的田园诗人陶渊明;而对李、杜、韩、白等大家则表示并不心折。

由于王士禛的名尊位高,他的神韵诗说主宰了当时诗坛很长一个时间,没有人可以与他抗衡,不过只有一位他的

山东同乡又是姻戚后辈的赵执信，居然与他分庭抗礼，著了一部《谈龙录》来说明与神韵诗说不同的观点。赵执信也是一位清诗春季的著名诗人，他不怕这位同乡前辈和老姻长，也正因王士禛的诗论有可乘之机，所以《谈龙录》也决不是无的放矢，成为一时文人发泄自己观点的良好示范。

所谓神韵诗说，以王士禛自己的作品论，可以《再过露筋祠》七绝为代表：

翠羽明珰尚俨然，湖云祠树碧于烟。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

此真所谓“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无迹可寻”者也。然而也不能不确认其功力之单薄，缺乏黄钟大吕的盛世元音，袁枚《学元遗山论诗绝句》云：

清才未合长依傍，雅调如何可诋议。我奉渔洋如貌执，不相菲薄不相师。

又同题云：

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

这是对神韵诗说一针见血的批评。

## 《秋柳》诗

一

秋来何处最消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晓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二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三

东风作絮糝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违。

四

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芜欲化烟。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假缠绵。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

往年。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枝相映夕阳边。

用一个总题写出若干首诗的，用现代语称之为“组诗”，组诗大抵都用近体诗写成。唐代以来，最有名的组诗，当推杜甫的七律《秋兴》八首，这是古今诗人无与伦比的作品，命题既宽，涉及面深而且广，后之诗人步其原韵而和之者，不知凡几，甚至有人专门用《秋兴》的原韵编写成一个集子，记得钱谦益就有过这样一集。

清诗春季诗人的中盟主王士禛以《秋柳》为题，写过上引的四首七律组诗，其影响之广，和者之众，在清代也是首屈一指的。

王士禛的《秋柳》，好像是咏柳之作，实则并非如此，它跟《秋兴》除了点缀一些柳的景物外，实在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命题也是很宽，涉及面也是既深且广，并不限于咏柳的范围。

王士禛是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秋柳》作于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地点在济南，他的年龄只有二十三岁，时间是八月，正是山东全省士子聚集省垣参加乡试的时候。士禛幸而是山东人，若是直隶人或是监生而应顺天乡试的话，恐怕他要遭逢极大的灾难，那便是丁酉北直乡闈的文字大狱，有许多著名诗人如吴兆骞、孙旻都远戍极边。不过他写《秋柳》的时候，北闈大狱尚未发生，他自然无法先知，有些解析《秋柳》的文章，要把此狱也牵进诗中去，显然是误会的。

乡试在八月举行，士子们总要先期到达省垣，以便结交朋友，揣摩风气，所以文酒之会，无日无之，是非常热闹的。

江南乡试的秦淮河,早已脍炙人口,而济南的大明湖,也和秦淮一样,都具楼船灯火之胜。王士禛以白衿年少,周旋于裙屐之际,命笔赋诗,一鸣惊人,《秋柳》这组诗,顿时遍传大江南北,远离山东的江浙,也纷寄和章,可谓极一时之盛。《秋柳》不但诗佳,诗前还有一篇小序,更写得优美出色,与诗同样被人讽诵流传。序云:

昔江南王子,感落叶以兴悲;金城司马,攀长条而陨涕。仆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杨柳,同《小雅》之仆夫;假托悲秋,望湘皋之远者。偶成四什,以示同人,为我和之。丁酉秋日,北渚亭书。

序中充满着华景瞬逝、迟暮倏临的感怀,如晋朝桓温重见到所手植的柳树皆已十围,慨然陨涕,说出“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伤感语。但王士禛不能和桓大司马相比,他还是一个尚未涉世的少年,何以也说出如此丧气的话来?大概这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所谓无病呻吟,古来诗人都是如此,所以也无足为怪。若是夏季诗人黄仲则写下这篇小序,一定会被人看作薄命的象征或谶语,但王士禛福命之厚,寿算之长,在清代诗人中是很少有的,所以从没有人评论过他的少作如此悲惋。

“诗无达诂”是句很有道理的名言,后人的欣赏和分析,是否真能与原作者的用意相符合,还是成问题的。三百年前早就有了不少赏析家,对《秋柳》这样名作众说纷纭。如李兆元《渔洋山人〈秋柳〉诗旧笺》,便断定《秋柳》为吊明亡之作,第一首是讲明太祖在南京奠都开国的,以后三首则是

吊福王在南京亡国的。王士禛的及门郑鸿提出更有力的证据,说是“为公吊明亡之作”,“某首指某人,某句指某事,先生口讲指画,缕析条分,言之凿凿。”似乎是王士禛自己在给《秋柳》作笺注似的。其实虽然言之凿凿,却是穿凿附会,向壁杜撰而已。

他们的赏析本领似乎还不及满族的皇帝和枢廷大臣,当文字狱初起,有人掎摭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的诗和吴绮的词中有“狂悖”字眼奏举,主要的便是《秋柳》一诗为吊明亡之作,但廷议并不听从他的讨好意图。专制时代,像这样的赏析文字,是可以杀人灭族的。倒是管世铭说句公允的话,说是“秦人屈复注王渔洋《秋柳》诗,‘白下’、‘洛阳’、‘帝子’、‘公孙’等字,妄拟为凭吊胜朝,最为穿凿”。

实则王士禛赋《秋柳》时年事尚轻,他的神韵诗说还未成熟,但已略露端倪,后人的赏析,简直是瞎子摸象,根本上把神韵诗说当作李商隐的《无题》诗了。王士禛不比宋琬,怀着破家亡国之恨,他由明入清,一直门第鼎盛,济南不比登、莱,兵革之灾较轻,偏要把他拉入遗民的行列,似乎大可不必。

正确地赏析《秋柳》诗的也不少,如宋琬《说铃》云:“王十一在大明湖北渚亭感秋柳赋诗四章。严给事沆称此诗风调凄清,如朔鸿关笛,易引羁愁,读之良然。”也有认为此名作有明显不足的,如黄培芳的《香石诗话》:“阮亭《秋柳》之作,以风神取胜,脍炙一时,然訾之者亦不少。其实细按,不免有稍空处。”朱庭珍《笈园诗话》则以为“王阮亭《秋柳》,负一时盛名,以为绝作。其实不过字句修饰研华,风调好听而

已。神骨不峻，格意不高，皆非集中出色之作，不可奉以为式”。

《秋柳》四章，可称为王士禛神韵诗说少作的代表，无怪乎和神韵持异说的肌理诗说创造者翁方纲评《渔洋菁华录》，把四首逐首批评得一无是处；而另一持异说的格调诗说创造者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竟然把《秋柳诗》摒弃不录，指为“不切题”。

无论如何，从神韵诗说和现代美学观点来欣赏《秋柳》这组诗，在艺术表现上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诗句充满感情上流转快速的美感，应该是清诗春季百花园中一朵鲜花。

## 袁枚的性灵诗说

清诗的春、夏两季的四个重要诗论中,最于当世和后来有较好影响的,是袁枚的性灵诗说。

袁枚(1716—1797),便是袁子才,号随园,和春季诗坛的王士禛一样,是夏季骚坛的盟主。袁枚确是才子,他在乾隆元年(1736)二十岁时便膺荐赴试博学鸿词大科,虽未被取中,即于三年之后考中己未科二甲五名进士,和年已近古稀的大诗人沈德潜同榜,名次还在沈前二名。以后一老一少的同年,在论诗意见上,便要成为论敌;而且,老将败在小将手里,这是后世的公论。

中进士而尚未结婚的,可以奏请给假归娶,俗语叫作“奉旨完婚”,这是人间罕逢的玉堂佳话。清诗的春、夏季诗人中,各有一位大诗人遭此荣遇。吴伟业以会试会元和殿试榜眼的高第曾有此殊荣,不过那是明代崇祯朝的事。吴伟业之后过了一百零八年,又碰到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即位不久有这种佳话点缀,当然惹得皇帝欢喜,满以为袁枚必

会青云直上,尚书、宰辅是意中的事。不料事实恰和希望相反。他在诗论的争论中占了胜筹,宦途的通达却远不及他的同年沈德潜。照例二甲五名的进士没有不入词林的,而袁枚却因在庶吉士教习中,以不识朝廷称为“国书”的满洲文字而落在末等,这样便梦断金马玉堂,出而为粗官俗吏了。进士之出为知县,叫作“榜下知县”,又叫“老虎班”知县,遇缺即可补官(就像老虎见可噬之物即吃),不必长期听补。他指省江苏,一到南京,便补缺溧阳和江宁知县,又碰上两江总督满洲才子尹继善也是少年科第,同善相济,诗酒唱和无虚日,总算也是风尘俗吏的得意之秋。那时铨例很严,纵然有“望山相国”这样一位上司,也没有办法使他升迁一官一秩,连保他署任知州也遭到部驳不准,袁枚自知仕途无望,索性辞去“七品官耳”,就在南京买地建园,终老于秦淮六朝烟水之间。他的原籍是浙江钱塘,祖籍还是浙东慈溪,从此便不再返原籍和祖籍。

由于生在升平时代,又是少年得志,所交往的都是上层人士,他的诗便无法与春季诗人的流离辛苦、国难家艰、铁马金戈的遭际相比,清代第一流诗人的位置他挨不上,而于诗的理论却可说是一代的权威,不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臻于二百六十年中高不可攀的顶峰。

“性灵”两字也非出于袁枚的首创,探本溯源,可上达《国风》,比他早一些年代的同宗袁宏道,便曾大举提倡性灵之旗来反对王李七子的模拟文风,成为公安派文学改良的理论支柱。袁枚与中郎在这一方面有一脉相承之处,便用来予以发扬光大,而且他的学问与阅历,远胜公安三袁的肤

浅空疏,成就便青出于蓝,公安派未可与之同日而语。

性灵说和神韵说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性灵说更有具体的内容,他所阐述的诗歌创作方法,具有较完整的艺术规律,在现代美学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

性灵诗说主张诗的创作必须具备三个必要的条件,首先是真实的感情,次之是从“自我”出发,最后方是才学。三者缺其一,便不能创作出好诗。和他同时的“格调说”和“肌理说”便于三者各有阙失,尤其是缺乏“真情”和“自我”,光靠才学是写不出好诗的。

他强调诗人须不失赤子之心;必须有不可解之情,而后可以有不可朽之诗;诗乃由情所生。《诗经》开宗明义便是男女之情而不是思太王、王季,所以情是源头而词藻仅是其末流,没有源头活水,则下流必成一汪死滩。所以他把才学只放在最后一位。《随园诗话》中记载很多贩夫走卒的诗,最著名的一件是随园有一担粪夫说:“着一身花矣!”他听了狂喜,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天籁”,不是摊书獭祭的读书人所苦吟得出的。人们不禁会想起《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是个不识字的妇女,在同宝玉黛玉等大诗翁一起联句时,推她首唱,居然吟出“一夜北风起”这样的名句,切题而笼罩全局,使续联者多有生发之余地。这固然是曹雪芹故弄狡狴,要使得满腹诗书的宝玉、黛玉等大诗翁自愧不如;恐怕曹雪芹生与袁枚同时,受他性灵诗说的影响,也未可知。

以真情和“自我”从事创作,便无所谓唐、宋之争,凡是尊唐崇宋的论战,其实都是依傍古人门户,其中独缺一个“我”字,所以作诗不可无“我”,便是不能泯没自己的个性,

去强凑古人的面目,所谓“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诗宜自出机杼,不可寄人篱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这些主张与袁宏道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是完全一致的。

袁枚的性灵说,具有锐利不可御的理论武器,横扫当时诗坛上的泥古拘学的诗论,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沈德潜的格调说是“蔽于古而不知今”,“诗有工拙,而无古今”,“多一分格调,必损一分性情”;翁方纲的肌理说则不过是“误把抄书当作诗”而已。

他强调“自我”精神,当然反对诗人们难返的积习“和韵”、“步韵”、“叠韵”等玩意儿,认为都是与己无关的模拟之作。他自称平生不和韵。但是在这里,他的第二性格又暴露出来,《小仓山房诗集》中保存了汗牛充栋的与尹继善唱和之作,还有“新诗和到是明年”这样肉麻当有趣之句,难道“望山相国”的和韵便不在他的禁例之内吗?伍拉纳儿子在《批本〈随园诗话〉》中所讥评的袁枚,在这里又一次暴露。

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袁枚当然有很多值得人们疵议的地方,因为他的性灵诗说,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也与他的诗论一脉相通,便是率真,不肯假道学地伪言伪行。例如他从不讳言好色,这就和假道学的偷偷摸摸完全不同。在当时他的诗名和论点,名重东南,时人莫不钦仰。夏季诗人张问陶(船山)甚至名其诗集曰《推袁集》,然而一到袁枚逝世,攻之者纷起,张氏赶忙见风落帆,把《推袁集》这个名字取消,转而对他下石了。

在袁枚生前,只有三位大名鼎鼎的诗人敢对他明评暗

讥,例如同为乾隆江左三大家的赵翼和蒋士铨,赵翼尝戏撰讨袁的檄文,说他如括苍山的老猿,蒋士铨则假借戏剧中陈继儒与王荆石的故事,说他是“可怜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讽喻袁枚和尹继善的交往。但最耐人咀嚼的却是另一大诗人黄景仁(仲则),《两当轩集》有《呈袁简斋太史》四律,其一云:

一代才豪仰大贤,天公位置却天然。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暂借玉堂留姓氏,便依勾漏作神仙。由来名士如名将,谁似汾阳福命全。

“文章草草皆千古”,一针见血地指出袁枚诗文的缺点,这是主张性灵诗说的袁枚以至他的先驱公安派及后世追随者无法掩饰的缺憾。

## 沈德潜的格调诗说

清代对当时和后世有影响的诗论，格调说是其中之一。这个诗论的产生，可以说是清代国力达到繁荣的鼎盛期（所谓康乾盛世）必然产生的点缀品。前于格调说的神韵说和同时的性灵说，总嫌虚无缥缈，清幽疏淡，难副盛世的庄重典雅，必须有一种意象刚正阔大、声调雍容铿锵的诗风，才可以与那时政治局面相配合，所以格调说便应运而生，为盛世点缀太平。

格调说其实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创造，只是拾人牙慧，死抱古人骸骨，迎合人主意图及当时诗人希图以诗幸进、恃宠沾恩而已。在四种重要诗论中，它是最卑下和不足取的，可称为诗国中的乡愿。

格调说主张尊唐，可是它并不是直接尊唐，而是继承前代前后七子的衣钵，间接地尊唐。凡是七子和他们的前辈李东阳的牙慧唾余，都拾来奉为圭臬。用规格来限制诗的自由发展，用调门来规定音腔的高低，矫揉做作，如女子之

缠足和束胸,扼杀自然与天真,而伪体乃出。

格调诗说的提倡者是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此人到了乾隆四年才中进士,其时年已六十七岁,照例这样的高龄即使在官也已到了悬车退休之年,他却受到乾隆的特殊赏识,收为文学侍从之臣,居然在短短十年功夫,官至礼部侍郎还加尚书衔。他的不次迁擢,并不是因他有特殊卓异的政绩,而是替乾隆做了捉刀诗人。因为乾隆久闻他的诗名,格调诗说又配合这位皇帝的胃口。鉴于其人年事已高,人又老实,必定谨慎小心、守口如瓶,不致像高士奇那么到处招摇营私,所以付之以捉刀的重任,有十年之久。即使沈德潜耄耋告老,也还是藕断丝连,诗筒往还不绝,称之为“江南大诗翁”、“朕之老诗友”,其老运之佳,古今历史上是罕觐的。

乾隆也能够附弄风雅,哼几句诗,在做“阿哥”的时候,循规蹈矩,诗倒也还一般,如在“潜邸”时就编定的《乐善堂集》中《题梅村诗集》一首七律,总还不能说出格。但是登了大宝之后,便不想和一般诗人同列,他自行创作一种与众不同的诗体,姑名之曰“乾隆体”。这种诗体,倒还不曾有人邯郸学步而一道同风,是归他一人专有的诗体,所以乾隆一朝的诗风,并未受“乾隆体”的影响。可是做捉刀人的,却不能不学着皇帝的作风来替他捉刀,这差使当然并不好受,但对诗的格调声律极有研究的沈德潜却心运意会,完全能凑合乾隆的意志,加上乡愿的性格,自然一拍即合,成为君臣诗的鱼水之欢。

“乾隆体”究竟是怎样的诗呢?不妨举一首在此,让大

平定伊犁受降  
乘時命將定條枝  
天佑人歸捷報馳無戰有  
征安絕域臺築單食近至  
師臣劉綎等何勝爾族仙等奉  
命大兵至伊犁即獻降羊兩  
匹請者信傳或通歸誠數呼先  
出水火自出所以未與血刃  
之善教遠播  
兩朝締構散云德百世寧  
綏有所里好雨優霑土宇  
拓教心那為慰心移  
乙亥仲夏月中游作  
張筆

乾隆御笔——“乾隆体”书法

家开开眼界，诗便是送给沈德潜的一首七律：

吴中今古老人科，比似征明定若何？书画虽输诗胜彼，功名已过寿如佗。游山有兴仍清健，处世无争只善和。明说九旬有三岁，那更年极尚嫌多。

这首御制诗既然是赐赠沈德潜的，自然不能再由沈德潜捉刀，而是十足“乾隆体”的真品。若由他的“老诗友”捉刀，恐怕还不至令人笑掉了牙齿。

至于沈德潜本人的诗，根据他平生最重要的编撰著作《说诗晬语》、《唐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古诗源》等书，他在这些编著中彻头彻尾显出格调说的主张，无非是尊唐贬宋，虽主一时坛坫，终究被有识之士所唾弃。跟随他的末流，自然产生一种不良的诗风和影响。他的诗除了歌功

颂德、鼓吹升平之外，也不无好诗，并非一无可取。最重要的是他未出仕时久处民间，深知民生疾苦，如《夏日述感》五律六首，反映乾隆盛世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黑暗的社会现实，诚为沈德潜的代表力作：

其一

旱潦频仍后，三吴风景殊。民贫轻揖让，力尽畏征输。瘠土农皆散，平田麦已芜。吾生惭俯仰，触目总艰虞。

其五

身世空搔首，茫茫总不堪。多金高甲第，无食贱丁男。救弊须良策，哀时敢戏谈。传闻鸿雁羽，肃肃去淮南。

但是这位乡愿诗人终于老悖得糊涂透了顶，他退老之后，竟由自己或他门下弟子之手，于编辑《归愚诗钞》时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作为自己的作品编了进去，并且还进呈“御览”。这可恼火了这位十全老人的皇帝，但又恨在心里，不便声张出来，从此逐步找他的老诗友的错头。开始还算客气，说他家里藏匿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和《牧斋有学集》不予销毁；继又指责他选《国朝诗别裁集》首列钱谦益作品，严令于再版时改编。终于在沈德潜死后，找到江苏东台徐述夔的《一柱楼集》兴文字狱，以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为理由，对他下了毒手，削官夺谥之外，复扑其墓碑，开棺斫尸。诗人生前之荣与死后之惨，成两个极端。

## 翁方纲的肌理诗说

所谓诗论，即诗歌的理论，是伴随着诗而来的，从《诗经》开始，沿着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以迄清代，用各种形式写下关于诗的文字，都可称诗论。但正式名为“诗论”的，却并无此名，这是后人所加的名词。它们大多是用“诗话”、“论诗绝句”、“纪事诗”、“本事诗”、“选集”等名称，至于用“诗式”、“诗品”、“诗藪”、“原诗”、“说诗”等名称的，则是已和诗论很相近的名称了。

其中最普遍使用的是“诗话”，古今诗话著作之多，真足以傲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所能企及。清朝一代，尤可称列朝之冠，连后来配享两庑的理学家和史学家王夫之，也写过一部《姜斋诗话》，则其他诗人各有或多或少的诗话著作，也不是奇怪的事。

诗话实在是关于诗的闲话，体裁自由，想到便写一段，可以无所不谈，这是最大的优点，所以有系统的全从理论着眼的就不多。例如春季诗人吴伟业就有薄薄的一本《梅村

《望罗浮》

只有蒙蒙意，人家与钓矶。  
寺门钟乍起，樵客径犹非。  
四百层泉落，三千丈翠飞。  
与谁参画理？半面画斜晖。

——翁方纲

诗话》，那就十足是一部纪事纪人的作品，在那里无从窥见他的诗歌理论。

较为自成体系有一定自我主张的清诗春夏两季诗论家，只能推举出四个代表人物，即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这四位诗人，王士禛是春季诗人，其他三位只好算是夏季诗人，其实这三位都很长寿，生活年代跨过了整个夏季，也便是清代最鼎盛繁荣的所谓“乾嘉盛世”。

翁方纲的成就并不在诗方面，他是知名的考据家、金石家，又兼书法家，诗可说是其馀事，是不能和其他三位方驾的，但是他却有他一套诗歌的理论。他以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这是乾隆年间汉学考据学风盛行的必然结果。他的所谓“理”，便是方苞、姚鼐所倡导的桐城派古文最注重的“义理”，亦即“熟精《文选》理”、“雅丽理

训诂”之理。他主张以学为诗,没有踏踏实实的学问是不足为诗的,这是完全和王士禛“神韵”、袁枚“性灵”的诗论处于对立的地位。《清史稿》本传说他:“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固然是一个诗人必备的条件,但读破的万卷,必须融合会化于“我”之胸臆,然后以我之语句吐出,这方是真真的“以学为诗”,若仅仅如翁方纲那样摭拾前人作品,阑入自己诗句,那便是优孟衣冠,毫无生气,像明代七子那样,一直为人所诟病。翁方纲似乎还死守七子的成法,抱着不放,他根本无视于诗的特殊条件,也不解“诗无达诂”的意义,所以虽和王士禛、袁枚唱反调,当时的影响远不及王、袁的诗论有着广大的追随者和重大的影响。

但他的影响却发生在身后半个世纪之后,那时宋诗盛行,无形中奉肌理说为宗旨,也只是旧体诗的回光返照,从那时崛起的黄遵宪、丘逢甲等,已举起诗界革命的旗帜,主张“我手写我口”了。

翁方纲的肌理诗论,在清诗春夏的诗论中是属于保守的、落后的理论,虽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却妨碍诗的发展与进步,而且他崇尚正学,抹煞情怀,凡是抒发情怀的风怀之作,都被他目为有乖风教,是可以不作、可以不传的作品。清代夏季诗人中最富才华的薄命诗人黄仲则是翁方纲的好友,他非常同情仲则的遭遇和伤悼他的早逝,蓄意要为仲则刊刻文人不朽之业。但是《两当轩诗集》经过翁方纲的删削,竟然去掉了一半,而这一半却是仲则诗中精华所系。

《两当轩诗集》最早的刊本便是翁氏所刻的《悔存诗钞》八卷,他选择的目光是“凡涉绮语及饮酒诸诗皆不录入”,幸而仲则诗后来有了足本行世迄今,而翁刻究未为人所知,那是幸事;否则,这位绝代风华的薄命诗人不知要被肌理诗论糟蹋到什么样子!

翁方纲的论敌袁枚给肌理说一个讥评说:“误把抄书当作诗。”这是一个谑而近虐的批评。

## 清诗夏季三大家

清诗的春、夏季各有一个“江左三大家”的集体，春季的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当然，前两人是清诗春季的领袖。夏季的袁枚、蒋士铨、赵翼三人也并不示弱，在清诗的夏季中也居卓越的地位。

夏季的江左三大家，又称“乾隆三大家”，他们单以诗论，似乎不能与钱、吴相颉抗，但他们除诗之外，还有其他专长，则又是春季的江左三大家所不能企及的。

袁枚已详前篇，蒋士铨是清代可数的戏剧家；赵翼更是多面手，既是诗文家，又是诗论家，更是知名的史学家。

赵翼(1727—1814)，字耘松、云松，号瓯北，江苏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进士。他的科第对他的一生很有关系。这一科的殿试，乾隆亲自阅卷。所谓“殿试”，名义上由皇帝主试，故进士称为“天子门生”，实际上拣有多名“读卷官”，他们便不叫“主考”或“总裁”，表示仅仅帮助主试者的皇帝读读卷。由他们决定的名次，以首十卷进呈御览，

皇帝一般当然依照他们所定的名次批准发下。于是状元、榜眼、探花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同进士出身的一榜进士就此产生。

进呈的十卷中,这一科原定的一甲一名是赵翼,一甲三名是王杰。乾隆翻阅了两人的籍贯,科举规定,乡试和会试的试卷都是弥封的,而且经过誊录,在拆封之前,主考和总裁无法知晓取中的人姓名和籍贯。但殿试却因是皇帝亲试,认为必定大公无私,不会有舞弊情事,所以省却弥封和誊录两道手续。赵翼是江苏常州人,王杰是陕西人。乾隆以为开国以来,江苏的状元已够多了,而西北的陕、甘,却还不曾有过鼎甲,而且其时正在经营西北,不可不提拔一些西北的人才,以资抚绥。这样,便将王杰的试卷和赵翼对换,王杰成为清代惟一的陕西籍状元,赵翼则屈居为探花。

状元与探花,虽只第一与第三之差,但以后仕途之通蹇,大大不同,王杰一帆风顺,官至大学士;而赵翼却成为风尘俗吏,官仅止于道员。

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赵翼若做到大学士,也不过在众多的宰辅中添了一名而已,一定不能像他悬车之后从事著述给后人留下不少传世之作。所以赵翼能够成为清代著名的诗人和学者,还得归功于乾隆皇帝。

赵翼的诗论虽然不及王士禛、袁枚有一个系统的理论,却著作繁多,《瓯北诗话》是他的主要的著作,他的观点可以“才”与“气”两字作为概括。

赵翼论诗重才而不重学,他自己就以天才自诩,所以非常推崇唐、宋的李白和苏轼,在同时的诗论流派中,与沈德

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等重学之说是格格不相入的,而和前辈诗人王士禛的神韵说与同时人袁枚的性灵说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他的《瓯北诗话》中一共有九卷论古今大诗人的专章,除了李、杜、韩、白、苏、陆之外,宋以后的大家只选了金代元好问、明代高启、清代的吴伟业和查慎行,此外纵负盛名的大家,因为不符合他的标准,便不予采取。

赵翼尚才尚气,主张创新而反对模仿,不论是尊唐或崇宋,在他看来均无足取,所谓“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而已。“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心中先存在一个模拟的对象,如何还有新鲜的别创格调,甚至李白、杜甫,他认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对于明代前后七子模拟之风直至清代还在馀风尚炽,他当然嗤之以鼻而不屑一顾的。

## 掌心雷诗人王昱

咱们谈论诗人,可不是写武侠小说,诗人会和掌心雷联系起来,岂非怪事。但清诗夏季诗人中,确有一位能作掌心雷的诗人,他便是王昱(仲瞿)。

王昱(1759—1817),浙江嘉兴人,他的诗名虽不大为一般人所知,却是清诗夏季诗人中一位怪杰,他的《烟霞万古楼诗集》有许多回肠荡气的奇作,和他同时的黄仲则一样,是清诗夏季中两颗一现即逝的彗星。

清诗春季的南方诗人中,有浙派一系,它的领袖是嘉兴的朱彝尊和海宁的查慎行,他们是表弟兄俩,在浙派诗人中,他俩平分秋色。若说朱彝尊是尊唐,查慎行则是崇宋,他们各有许多追随者,形成南方诗人强大的壁垒。王昱是嘉兴籍,当然是属于朱彝尊一系的浙派诗人。

此人曾经中过举人,屡踏春闱落第,惹得他满腹牢骚,性本疏弛不羁,于是谈兵说剑,盘马弯弓,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自负是天下才,能作掌心雷,恐怕也是他自己胡说乱道

游说公卿间搞出来的。

乾隆晚年曾宠任一个贪敛无厌的权奸和珅，趋附于他门下取得卿贰高位的有一个侍郎吴省钦，和王昙有些往来。其时已是嘉庆初年，乾隆以太上皇之尊，遥握重权。经过他多年的挥霍和和珅的聚敛，搞得民不聊生，发生了川、楚等七省教民大起义，这当然是重大的朝政，太上皇不能不管，可是八十多岁的人究竟是老悖糊涂了，他自负可以用“法术”制敌，镇日在深宫念咒打坐，以为可以制“教匪”的首领于死命。儿皇帝当然唯命是从，可是心里并不以为然。

吴省钦揣摩太上皇的心理，思欲投其所好以邀富贵，上了一疏保荐王昙能作掌心雷，以救平川楚“教匪”。可是奏疏仅达到儿皇帝手中，太上皇并未看到。嘉庆皇帝认为太荒诞不经，以大臣身份不该如此亵渎朝廷，立予罢斥驱逐回籍。

另一说以为吴省钦非常机警，看到儿皇帝即将亲握政权，和珅作恶多端，一朝失去保护伞，冰山必倒，自己势将陪和珅殉葬，想早为脱身之计。于是上了这样一道荒唐的奏疏，以期逢天怒而遭薄惩，得以脱身。果然如他的期望，此计得逞。和珅治罪后，有很多党羽牵连，吴省钦则因为斥革在前，并未予以追究，成为漏网之鱼。

吴省钦固然讨得了便宜，真真倒霉的却是王昙，从此蹭蹬终身，再也不能东山再起，只好壮志空怀，饮恨而老死牖下。他的诗充满牢骚，原因便是在此。

话说 18 世纪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隆替的一个大关键时刻。1722 年之前，康熙在位，他是清代第一位睿智开明的帝皇，虽然汉文化不高，却笃信西方文明，尤好接近东

来教士,身体力行地学习西方历算之学,他的数学在那时已达到通晓开方、微积分的程度。日本史学家尊之为“康熙大帝”,可谓毫无愧色。照他的路线走下去,恐怕以后的历史得重写。

可是他的儿子雍正和孙子乾隆,都不能继承他的遗志,两代人都摒弃父祖的信仰,转而去崇奉另一种宗教密宗,这便使国家民族沿着另一方向滑落下去,说起来是颇可痛心的事。乾隆的念咒打坐和王昙的掌心雷原是同一货色。

上有好者,下必甚矣,王昙生在那个时代,自然一道同风,也玩起能作掌心雷的把戏来。王昙也因此成就他在夏季诗人中一个怪杰的称号,且请看他著名的《住谷城之明日谨以斗酒牛膏合琵琶三十二弦侑祭于西楚霸王之墓》七律三首:

一

江东馀子老王郎,来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手竟夭亡。谁删本纪翻迁史,误读兵书负项梁。留部瓠芦《汉书》在,英雄成败太凄凉。

二

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

三

黄土心香一掬尘,英雄儿女共沾巾。生能白版为天子,死剩乌江一美人。壁里沙虫亲子弟,烹来功狗旧君臣。戚姬脂粉虞姬血,一样君恩不庇身。

## 黄景仁的盛世悲歌

清诗的夏季百花园中，群芳盛放，斗艳争妍，齐来点缀升平的盛世。正在脆管繁弦、轻歌曼舞之际，忽然天边出现一颗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熠熠的亮光照耀天空。虽然这颗彗星一瞬间即行消失，却告诉人间这盛世繁华的脆薄，不久即将有狂风暴雨袭来，百花园中的奇花异卉，会一朝零落无颜色。

这颗彗星便是夏季诗人黄仲则。社会对他的排挤，世人对他的白眼，使他尝尽人间的悲酸苦痛，迫使他在盛世中唱出了悲歌。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江苏常州人，少孤寒贫穷，依靠寡母抚养成人，虽然天才横溢，于学无所不窥，却屡次见摈于有司，始终是个穷秀才，使他不得不奔走四方为稻粱之谋，也还是到处碰壁，所逢都是逆境。甚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平定金川告成，乾隆东巡还京，黄仲则到天津去献赋，被录取在二等，像这样的召试盛典，所得的恩泽仅仅授

为武英殿书签官,官卑禄薄,难赡家室。勉强挨过二年,才算按例得到一个主簿的末秩,他加捐了县丞,而且还得在京中候选。县丞是县里的佐贰官,俗称“二老爷”,是士大夫所不屑为的微职,他实际上还是没有一天补过缺。但是上下千百年间,提到“黄二尹”,谁都知道指的是黄仲则,这个卑官末秩的别称竟和“杜工部”、“韩吏部”同样成了他的专利,官以人传,倒不一定要高官显爵才能有此。

仲则不是没有朋友和赏识他才华的大人物,可是他生性耿直古怪,与人多忤,所以谁也无法提拔和救济他的贫困。他的朋友都是当世知名的诗人文士,可他和谁都格格不相入,他曾说道:“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那么剩下的一人是谁?便是他的生死知己朋友洪亮吉(稚存),洪亮吉也同样的穷,两人只能相濡以沫,都在困境中打发日子。

赏识他的大老中,有担任安徽学政的朱筠(竹君)和陕西巡抚毕沅。朱筠延他入学政幕阅文,非常器重他,他却看不惯同事们的作为,愤然不别而去。毕沅经洪亮吉的揄扬,看到他的《都门秋思》诗“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以为此诗足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来,这也不可不谓诗的知己了。五百金不是小数,但他归还宿逋殆尽,行至山西运城,便病发逝在萧寺中,年仅三十五岁。万里归棹常州,还得靠毕沅的帮助和洪亮吉的照料,诗人遭遇之穷和赋命之薄,千古同慨。毕沅字秋帆,状元出身,久任封疆,颇有贪墨之名,身后被籍没家产,但爱才好士,对黄仲则的慷慨解囊,则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做到的,因此后世争传毕沅



黄景仁的诗作饱含自身的辛酸

有此豪举而忘却其财物之所由来了。

黄仲则处在乾隆盛世,受到委屈的待遇,从而看出这个盛世的背后,竟是一片黑暗,社会经济正在两极分化,上层阶级搜括聚敛,下面老百姓啼饥号寒,过着不可终日的日子,他当然不会参加川楚七省的教民大起义,只能在诗中暴露自己看到的周围实况,但这也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盛世的不平的诗人了。

黄仲则有天才,重性情,不屑为繁琐的笥订之学,他的诗除了暴露盛世的黑暗面之外,还有不少绮怀之作,那些作品,都是叙述他个人的恋爱故事,有着真挚的感情和真实的事迹,所以不同那些刻意虚构编造、专以词藻为工的香奁体,读之令人回肠荡气。

《两当轩集》中保存了不少那样抒泄情怀的佳作,如《感旧杂诗》之四云:

非关惜别为怜才,几度红笺手自裁。湖海有心随颖士,风情近日逼方回。多时掩幔留香住,依旧窥人有燕来。自古同心终不解,罗浮冢树至今哀。

又如《绮怀》十六首之第十五云: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

像这些诗是道学先生所不能看人眼中的,而且他的行为做事也有些放诞不经。据说在京师日时常和优伶们混在一起,甚至粉墨搬演,尤为正人君子所指摘侧目,这正和明



黄景仁手迹

时杨慎谪居在云南时一般,才人失志,借此发泄牢骚不平之气,他对当时社会已不存什么希望了。

他身后的诗,首先被刊印的《悔存诗钞》是提倡肌理诗说又工金石考据的大学者翁方纲选刻的,他把仲则所遗下和当时可以寻找到的一千多首诗中仅选录半数,“凡涉绮语及饮酒诸诗皆不录入”。翁方纲虽是仲则的朋友,但两人的观点格格不相入,由翁方纲来操选政,自然坚持他的观点,这对仲则的作品无异是一种苛待。幸而后来他的孙子黄志述妻吴氏,为了保持先人遗作的全貌,节衣缩食,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尝尽苦辛,才刊成《两当轩全集》流传至今。

## 糊涂诗人郑燮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尤善书画,皆自成风格。他存年七十三岁,经历过康、雍、乾三朝。他脍炙人口的一颗闲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正说明了他跨越清诗春夏两季的诗人。他是中了进士,成为“七品官耳”的县太爷,声名才大起来,所以和沈德潜一样,把他纳入夏季诗人的行列中。

郑燮和黄景仁一样,在众多的夏季诗人中,他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怪杰,不与人同。他不屑和他人一样,在盛世中歌颂升平,他来自民间,深识人民的疾苦,而且当了亲民之官,更觉得人民之可亲,又笃于戚友昆季子侄之爱,使他的诗富于人情味,通俗易懂,娓娓道来,如亲朋互诉衷肠,所谓“乐亲朋之情话”,确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民间诗人。

他还是一位有名的画家,他是江苏兴化人,兴化属扬州府辖,那时的扬州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繁华之区。世人所称道的“扬州八怪”便在那时聚集在扬州,他们中其他七人



郑燮



郑燮的《兰竹图》轴

是李鱣、金农、高翔、汪士慎、黄慎、李方膺、罗聘，板桥居八人之首<sup>①</sup>。他们的作品，俨然与当时正宗的江南画派相抗衡，到后世他们的声誉更超越那些正宗派画家而上之，这和他们的诗一样。

板桥擅诗、书、画，被誉为“三绝”，所以他的画格外受人推崇，举一而三美备。他虽然订了卖画的润格，而且声明不给润金便不要来讨他的画，但也决不以画和诗来取媚世俗、阿附权要，只要看他在做潍县知县时候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山东巡抚一幅墨竹图上的七绝：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那位接受板桥诗画的大官僚看了不知作何感想，想来总不大好受，而板桥的七品官终于做不下去。

他的诗歌来自民间，也为民间而歌唱，不需征引原诗，只要看看题目，如《悍吏》、《私刑恶》、《逃荒行》、《孤儿行》、《姑恶》等诗，都是当时社会普遍现象的缩影，那些诗题决不会登上盛世诗人的集子，因此可见板桥毕竟是一位具有天良的“怪人”，不与那些昧着良心、怀着追求富贵利禄想法去歌颂升平的诗人相同。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人们所不屑一提的民歌体谣谚，给后人留下丰富的俗文学遗产，比如出名的道情和竹枝词。

板桥的诗风虽如此，但他对一些诗风迥异的古代作家其实是下过苦功夫的，例如他曾经手批的朱鹤龄笺注《玉溪生诗集》，密密麻麻写满了眉批、夹批、篇批，见解既精辟，字

迹又娟好。看题跋知是板桥于四十多岁公车北上在途中披阅的。李商隐诗的作风可说和板桥的诗风丝毫不相干,但他确是对之下过一番功夫,可见“转益多师是吾师”,他是在研究唐、宋诸大家的诗之后才创造自己诗风的,决不屑人云亦云。

板桥自序其诗,以为和邻省的吴嘉纪相似,吴嘉纪是清初著名的盐筴诗人,专写徐、海一带盐民生活的痛苦,板桥说自己似吴嘉纪,“陋轩诗最善说穷苦,惜其山水不多,接交不广,华贵一无所有,所谓一家言,未可为天下才也。板桥诗如《七歌》,如《孤儿行》,如《姑恶》,如《逃荒行》、《还家行》,试取以与陋轩同读,或亦不甚相让;其他水山、禽鱼、城郭、宫室、人物之茂美,亦颇有自铸伟词者。而又有长短句及家书,皆世所脍炙,待百年而论定,正不知鹿死谁手”。他要和吴嘉纪比一高下,的确,吴的名姓已不大为人所知,而板桥的大名,不但国内妇孺咸知,即使东瀛人士,亦奉板桥诗画为瑰宝。

板桥的诗写实,抒胸臆,不主张模拟仿效,自然诗风与性灵派为近,但他和性灵诗说的创造者袁枚却从未谋面。或讹传袁枚去世,板桥为之顿首痛哭,可见两人同声相求,他们的诗风有着同一渊源。

① 一说有闵贞、高凤翰,无李方膺、高翔。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